

熊安東

# 八十五歲自述

(1-14)

## 少小离家——我的小学时代

我祖籍山东惠民，紧靠黄河堤岸的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自然村——毛家口村。一九二二年生人，十二岁以前，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至今不忘浑浊黄河上的帆影。十二岁那年，我的老奶奶（曾祖母）过世，父亲从济南回家办完丧事后，决定把我带走，带我到济南读书，把比我小三岁的弟弟留给我娘。离家时，我娘默默地送到大门口，我走远了，回头看看，她还在大门口张望着。那时她三十五岁，真没有想到，那一别，竟相隔四十年后，我才同她又见过一面，那时她已是七十五岁老人，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父亲带我离开那个老家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父亲与我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父亲是二十世纪同龄人，他青年时期受到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思潮冲击，大学毕业后，提出要解除与我娘的婚姻关系，那时我八岁。我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两代人都反对，在他们看来，休离已生育了两个儿子的正妻，是不仁不义，对不起亲戚，失去身份面子。我们是个爱面子的民族，至今，面子问题还支撑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在新旧思想互不相让的情况下，父亲单方面登报宣布与我娘离婚了，在济南另行组建家庭。在那时代，男人可以求得自由解脱，而旧制婚姻束缚下的妇女要蒙受最大不幸。被休离的女人，上吊的、跳井的、用剪刀自戕的，时有所闻。我娘在我祖父母的庇护下，没有被赶出家门，却失去了人世间的幸福和欢乐，在孤苦伶仃中无声无息地埋葬了一生。

父亲在济南是租赁的房子，五间平房北屋，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棵比屋顶高的洋槐树。南面也是五间平房，另一人家租赁，西面是两间小平房，两家的佣人分住，东面是条石砌的墙，墙外是一片菜地。

这个家庭人口少，父亲、妈（生母叫娘，后母叫妈），外婆和我，还有佣人张妈。父亲原在济南师范教书兼代教务主任，我到济南的那年，他调平原师范当校长，平原离济南一百八十里，在津浦铁路线上。妈在济南女子师范毕业后，也到平原去教书。外婆和我留在济南，外婆对我态度不好，当着我父亲的面，她对我很亲热的样子，背着我父亲时，她就用冷面孔对待我，天真的心灵，初次受伤

害，开始懂得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佣人张妈是个大老实的乡下人，她男人当兵没了音信，又没儿没女，呆在乡下日子不好过，到济南谋生，她对我很好，处处细心地照顾我。

父亲送我入读济南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大都是我父亲在济南师范教书时的学生。教务主任张子健，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曾被捕，我父亲保他出来。我在乡下私塾念过三年，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张老师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怕我算数课跟不上班，叫我插小学三年级的班，这样，我又念了四年小学，是班上年龄最大的。

学校的操场很大，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跳高跳远的沙坑、专门掷铅球和铁饼的场地等等，样样齐备。这些都是我在乡下没有见过的，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开始上体育课时，我都是怯生生的。打篮球，不是人打球，常是球打人，有的同学看到我是乡下来的，欺侮我不会打球，故意就拿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耍我、逗我，气得我到老师那里告状。教体育的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笑笑，耐心地教我各种打法和投篮动作。

学校图书馆藏书很多，光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就摆满好几只书架。我在乡下曾听人讲水浒故事，我从图书馆借了《水浒传》（记得是矛盾为青少年缩写本）带回家看，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文老师介绍我去借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与我同坐一个书桌的同学介绍我读了《苦儿努力记》，是本意大利人写的翻译小说。《水浒传》只是当故事看，而《苦儿努力记》，读着读着进入了“苦儿”的角色，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学校里星期一第一节课是总理纪念周，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由校长领着背诵“总理遗嘱”，唱国歌，向总理像行礼等仪式，然后是校长训话，最后由训育主任作时事报告。时事报告总是讲两个问题：日本军队侵犯热河、察哈尔、日本浪人在平津等地胡作非为；另一个问题是中央军在江西剿共，说“共匪”在江西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等，我初次听到共产党、朱毛等名称。

五月三日是国耻纪念日。一九二八年，日本为了阻挡北伐军向平津推进，日军出兵济南，杀害五千多市民和学生，向日方提抗议交涉的中国特派公使蔡公时

被日军割舌惨杀。张子健老师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每年“五三”纪念日，张老师作报告，常常讲着讲着哽咽地讲不下去，我和同学们都感动得心痛，涕泣满面，痛恨日本鬼。爱国心、复仇心，促使我们一群小伙伴在下课后把学校门口附近的一家商店砸了，这家商店专门卖日本货是出了名的。我们的行动，受到围观市民的赞扬，学校的老师也没有责斥我们，是我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两年里，日军继续侵扰华北，攻城略地，长城内外发生了百灵庙、喜峰口战役；日本浪人在冀东制造了汉奸自治政府，更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怒火，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小学生也卷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老师们带领我们到街上演讲、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募捐慰问绥远的抗日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我读小学六年级，已经能够看报纸，家里有我父亲常年订的《大公报》。对于西安事变，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从大人们和老师的议论中，知道国家的局势发生变化：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

每年暑假和寒假，我父亲和母亲都从平原回济南度假。他的同事或教育界的朋友们，常带着太太来我家串门。宋揖斋、高传珠、是小同乡又是中学同学，与我父亲感情至深，形同手足。宋揖斋在平原师范教书兼附小主任，他太太与我母亲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很要好的同学，他们每来我家总带些东西给我，衣服或鞋帽等。高传珠在南京中央政府作官，每因公出差济南，总来我家同我父亲下一天围棋，吃顿晚饭才走。我在乡下时没有见过官，总以为做官的要像戏台上的那副官样子，他没有官样子，平和近人，我喊他“高伯伯”。抗战时期我在重头，内战时期我在南京，都曾同他相遇。一九五二年我被捕后，在审讯中，为了说清同他的关系，还费了不少口舌。王新堂的太太也是我母亲在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他们家距我家很近，常来串门。王新堂喜欢议论时政，关于西安事变，他对我父亲讲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流亡，仍留在济南，他拒绝出任伪职，而被敌伪杀害。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他们都在平原师范教书，李清华教美术，马霄鹏教历史。李清华年轻，还没有结婚，喜欢说笑，我母亲曾

说要从济南女子师范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来我家坐不久的，常是约我同去爬千佛山或玩大明湖。他背包里带着画具，画山画水画人物速写画得活生，只几笔就把天上的云和湖水画好，看着他画画，我对画产生了羡慕。我买了十二色的画笔和画册，在念小学五、六年级时，曾热心地跟美术老师学画画，后来虽没有继续学画，但对美术作品始终有兴趣。

对马霄鹏老师有好感，起因是他没有娶新式太太。从八岁那年知道我娘被我父亲遗弃，常看到她在自己屋里暗自垂泪的样子，加上受祖父母的传统思想影响，我对父亲再结婚一事有种说清道不明的反感。十二岁到济南后，母亲虽对我好，细心地辅导我的算术课，但总是感觉不到亲切的母子情。对父亲的朋友们的新式太太，也觉得难以亲近起来。马霄鹏老师带着他的乡下夫人来串门，我就感到两样，看到马夫人我就想到我娘，对马老师和他的夫人，我都感到亲切。

马霄鹏老师曾送我一套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文库》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叶绍君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本世界科学家传记（儿童版）也是他买的。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带领他学校的师生离开山东流亡时，我才知道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没有跟着学校流亡，他们带了部分学生分别留在敌占区打游击。

在一九三八年的流亡路途中，关心国共合作抗战的时局，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兴趣，与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还有小学的张子健老师给我留下的形象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〇年我恢复公民权后，到徐州看望我父亲，他告诉我，在抗战时期，李清华化名李侏儒，在胶东同敌人战斗中牺牲。马霄鹏死得惨，一九三九年在鲁西发生“湖西事件”中被杀害，当时他是湖西区中共党委宣传部长，被杀害的罪名是“托派”。以后，我在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刊物上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西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全部平反。

## 抗日救亡——迁校入川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济中”）一年级。卢沟桥事变已经两个月，那时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大打起来，因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玩惯了对日妥协政策，不相信它会对日长期抗战。九月济中照常开学上课，十月日军攻占平津后，沿津浦铁路向南侵犯，逼近济南，济中校长孙东生决定迁校到泰安，暂借泰安中学校舍上课。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军侵占济南前夕，日军飞机对泰安进行了一整天的狂轰乱炸。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没来得及跑出城，就扑在城墙根下，只听得头上飞机响，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只听得炸弹降落时冲击空气发出的刺耳的嘶嘶声，接着是一阵震地的爆炸声和房屋倒塌声。一批飞机飞远了，又一批飞机来了，轮番炸。一直炸到天黑，飞机不来了，我们回到学校，我们接受了战争的恐怖洗礼，老师和同学们都炸怕了，也炸觉醒了。当天晚上，孙东生校长决定带领全校二百多师生离开泰安，各自背着行李，徒步经鲁西、豫东，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达河南许昌。借住许昌中学校舍，坚持继续上课。孙东生校长提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鼓舞并稳定了我们的学习情绪。孙校长的乐观精神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引导我们走进战争年代的社会大学校园里学习、成长。

在许昌过春节，除夕夜，万家爆竹声响，谁不想家，初尝离乡背井的苦滋味。有的同学用棉被蒙头躺在床上哭泣。我和隗宽、侯丙辰三人跑到屋外的院子里，放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当唱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时，我们都哽咽泪流满面地唱不下去了，远处近处的爆竹声还响个不停。

受到战争形势的影响，三月上旬我们又打起背包徒步一个星期迁移到南阳的赊旗镇（今余旗县）。行军的第四天经过叶县与方城之间的保安驿地界，是当时河南最贫困地区，传闻土匪猖獗，实际是无地耕种的农民。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的标语：“做土匪不如当兵”，“做土匪不是好人的子弟”等，在那民不聊生，生活在兵匪不分的时代，“做土匪不如当兵”竟然成了宣传标语！

赊旗镇昔日曾是个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全国有名大镇，镇内有几十条大街小巷，各行各业手工作坊分街生产和经营。建筑宏伟的山峡会馆显示商业资本曾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个萧条败落景象，生机全无了的古镇，这是清朝末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结果。

山东各地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共约二千多师生先后到达赊旗镇集中，由山东省教育厅领导成立“山东联合中学”，实际上联~~而~~而不合，仍处于各自为政状态。济中二百多学生住在山峡会馆旁边的文庙大殿里，晚上席地而卧，白天卷起铺盖，分班听老师讲课，坚持一面读书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星期日，话剧组到

街头演出活报剧。

时值国共合作抗战初期，政治思想活跃，民众抗敌情绪高涨。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会战取得大胜，捷报传来，民心振奋。除旗镇开军民联欢大会，欢送国军第四师开赴徐州前线，师长陈大庆和参军的平津大学生们走在队列最后，陈大庆回身立正，向欢送人群行军礼，然后挥手告别，情景壮怀激烈。那时，他曾是受民众拥护的抗日英雄。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警备司令官。

看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远去，远处传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的歌声，我对那些指挥唱歌的大学生们羡慕极啦。期盼国军再打几个大胜仗，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华北，赶出国境，我们好回家。

五月中旬，徐州失守，郑州告急，我们又打起背包，告别了古老的除旗镇，向湖北省西北角的郟阳迁移，离家乡越走越远。

离开除旗镇的第二天宿南阳，曾结伴到卧龙岗一游，寺院很大，碑碣很多。有个圆形亭子，传说是三顾茅庐时茅庐的位置。南阳有座玉山，街上各种玉石制品很多。南阳筷子质地细致雪白，不知用什么树木制作。过南阳后，进入镇平、内乡、浙川三县地区，据说是当时河南治安最好的地方，境内无匪患，没有人敢吸毒品。过浙川后进入武当山区，峰峦起伏，连绵不绝，山地多树林和竹林，多溪水人家，遍地野石榴，红花正开，看到南方美丽风光，思乡之情倍感凄凉。

徒步走了十天，五月底到达汉水滨的山城郟阳。“山东联中”二千多师生集中郟阳后，改名“国立湖北中学”，归教育部管理。

郟阳是座山城，城内西北部是一大片山坡，山坡上有个马王庙，校址选定马王庙。盖了若干简易教室和供教员和学生住的宿舍，都是用竹为柱为梁为椽，房顶铺稻草，竹笆涂泥为墙的房舍。天上落大雨，屋里落小雨，郟阳又是多阴雨天气，蒙在桐油布下睡觉，床上湿透。生活艰苦，痢疾，虐疾，百余同学生病。一个简易厕所，臭气熏天，遍地大粪，晚上下不去脚，结果院子里的草地上处处方便，我有两次不小心踩了一脚屎。

在河南流亡路途上成立的省立“山东联合中学”，是联而不合，各自为政。集中到湖北郟阳，把二千多人混合起来成立“国立湖北中学”，原来在山东教育界有权有势的几个人为争夺学校领导权，闹纷纷，互不相让。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拖欠教员工资，苛扣学生伙食费，弄得学校里乌烟障气，乱象丛生。

在这个二千多人混合起来的学校里，济中二百多师生是个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集体，在校园里贴出了内容丰富多彩的墙报：《紫塞》、《星火》、《狂飙》、《黑白》、《抗战》、《简明新闻》等，吸引众多同学观看。在音乐老师瞿亚先领导下，把在河南时成立的抗敌救亡演剧组改建或“狂飙”剧团，课余积极排练剧目，到

街头演出。

一九三八年八月，原济中校长孙东生的弟弟孙震南从延安到郟阳，招纳人才。数学老师宓仁甫和孙校长的儿子孙冠文以及济中学生俞新民等十数人跟孙震南去了延安。这件事在当时是半公开的，在我们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最关心的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学校当局几个领导人为争权夺利闹纷纷，顾不上管这些事，他们最关心的是趁局势混乱，多捞点“逃难”财。军训教官在军训课上，除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套话，他拿不出像样的货色吸引我们。闫子桂老师在公民课上，每次做时事报告，教室里坐满了人，窗外还站满了人。他批判盲目乐观主义，批判盲目悲观主义，批判唯武器论。他指出长期抗战取得胜利的条件是：大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改善士兵生活，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等。这些道理，使我们眼明心亮，树立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教育部命令国立湖北中学迁移到四川。这个二千多人混合的学校，情况变得更混乱，学校当局呈无政府状。济中师生遭到一股黑暗旧势力的围攻和殴打，为避免冲突扩大，孙东生被迫带领原济中的二百多师生于十二月一日先行离开郟阳，还有许多羡慕济中师生民主进步的学生自动赶来与我们同行，孙东生率领先行入川的师生共三百多人。

沿汉水西行，从郟阳到陕西安康，汉水穿行在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三间的崇山峻岭的山谷中，峰峦叠嶂，人烟稀少。两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张国焘率领的中共红四方面军，曾在这一带逗留一年多，荒山野庙里还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宣传土地革命的传单上署着“中华苏维埃”字样，在一块大石头上，他们刻上了“打到四川有盐吃”几个大字。山民的孩子把我们误认为是两年前的红军，争相喊着：“苏维埃来了，给我们唱歌”，由此可知，两年前中共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带与民众的关系很好，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说他们到处杀人放火。这一带的山民，普遍贫穷，大人小孩都衣不遮体，站在寒风里抖栗。

从安康到汉中，是陕南盆地，道路平坦，阡陌纵横，麦垄菜田，竹篱茅舍，鸡犬声相闻，暮云炊烟，牧童骑归，一派太平气象。我在安康患了疥疮，流行语：“神仙难逃陕南疥”，很多同学都感染上疥疮，痒得人难受，不得不围着柴火烘烤，不断向身上擦抹硫磺粉。

宿城固的那天，我到国立西北大学附近逛书店，买了三本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其中《共产主义基础》一书内包括《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写的二十五个问答题的《共产主义原理》。当时我买这几本书不是出于信仰，而是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共产党的共



产主义是怎么回事。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念小学时，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听校长讲了，知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还知道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等等。

出于好奇心我买了上述三本书，两年后，我竟信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社会主义。

过了汉中南行入川，有时沿刚刚用碎石铺好的川陕公路走，有时为了抄近路走古栈道。在宁羌（今宁强）过一九三九年春节，看到一排持枪的士兵在连长的率领下押送几十名被拉来的壮丁去师管区，就像押送犯人一样。想起在郟阳时的一幕，我和几位同学在城西北的棒槌河边洗衣服，眼看着一队兵押来两名企图逃跑的壮丁，在河边执行枪毙，还把整队的壮丁开到河边观看，以示警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二月初，孙东生率领的三百五十多名师生到达四川绵阳地区。随后，其他二千多师生陆续到达，成立“国立第六中学”，直辖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六中校本部设在绵阳（高中部），一分校设在梓潼（师范部），二分校设在德阳（初中部）三分校设在辛店子（初中部），四分校设在罗江（初中部）。四分校以原济中师生为主体，孙东生任四分校校长。至此，经历鲁、豫、鄂、陕、川五省，徒步行程五千里，历时一年多，到达了抗战大后方。

六中四分校只存在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勤令撤并取消，撤消的原因，是认为四分校已被“赤化”。关于四分校被“赤化”的问题，在下一节内记叙。

## 国立六中四分校

四川罗江是个美丽安静的小城，座落在纹江河畔。六中四分校借用城内的文庙、山陕会馆、城隍庙和三圣殿做校舍和学生宿舍，老师到民家租赁住房。

六中四分校从入川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开学上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并取消，共存在三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两年，我在六中四分校读完初二和初三，初中毕业后，于一九四一年初离开罗江。

略记几位对六中四分校影响大而难以忘怀的师长。

### 孙东生

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简称济南一中）校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他毅然抛下妻儿，率先领导济南一中二百多师生离开山东，历时一年多，步行五千里长途跋涉，于一九三九年初到达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罗江。他用“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豪情激励我们坚持读书学习，他吟咏陆游的诗句鼓舞我们奋发图强。一路上，几次停顿下来，借住大殿或庙宇，地铺睡觉，白天就成了读书的课堂。他说：“知识是光，无知是暗”。他把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精神洒落到我们的心田里，他反对填鸭式的呆板教学方法，他主张自由学习，自由研究，

自由阅读。他教我们自治，一切实行民主，在他的倡导下，六中四分校成了一个自治、民主、自由的园地。受到六中守旧势力的嫉恨，于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以“纵容左翼师生”罪名，被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审查。经六中四分校师生向教育部抗议交涉，孙校长终于十二月一日平安回校。他讲述在重庆所受困苦，声泪俱下，莫须有三字害人以至于此，可谓毒辣之至。四分校全校师生开欢迎大会，特定名为“孙校长受训毕业返校欢迎大会”。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在最后的余兴节目中，李广田老师即兴作歌，歌词唱出了我们学生的心音：

第四分校	一二一
永远前进	一二一
一个步伐	一二一
一个意志	一二一
向着自由	一二一
向着光明	一二一
前进前进	一二一

歌词中的“一二一”，寓意是一九三八年在湖北郟阳时，济南一中师生遭到一股守旧黑暗势力的围攻和殴打，为避免冲突扩大，孙校长被迫带领济中二百多师生于十二月一日离开了那个险恶的环境，先行入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孙校长遭受审查磨难后胜利返校，才有今日一会，十二月一日成为六中四分之纪念日，“一二一”又是前进的口令。

孙校长也曾赋诗抒发情怀：

十二月深夜里别了泰山，  
十二月深夜里又渡过了汉江。  
我们三百人一个微笑——  
对着，  
凶险的波涛，  
无情的风霜。  
十二月深夜里逃出了泰安，  
十二月深夜里离开了郟阳。  
我们五千里一个步伐——  
跋涉，  
在黑暗里挣扎，  
向着自由，  
向着光。

“别了泰山”，“逃出了泰安”，说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机大举狂轰滥炸泰安城，我们饱受残酷的战争洗礼，当天晚上，孙校长率领我们仓促逃出了泰山脚下那座还在炸弹硝烟中燃烧的泰安城，走上了抗日救国、求生存、求索自由和光的途程。

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硬是撤销了他的六中四分校校长职务，委派他做中学教育督导员，企图把他与四分校的师生剥离开来。他不屑于接受这一指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去成都四川大学教书。

他爱诵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他的一生也正是：“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他信守五四精神的一生，先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下，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都不讨好。

## 李广田

一九二八年在济南师范读书，被军阀张宗昌的特务队逮捕，遭受苦刑月余，国民革命北伐军打到济南才获释。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同系的卞之琳和不同系的何其芳结识，三人成为文友，秉承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创新风格，写诗写散文，都成了现代知名的文学家。

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到济南一中教国文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济南危机的时候随济南一中迁移到泰安，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在敌机狂炸中又离开了泰安，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在汉江左岸的郟阳住过半年，又同济中二百多师生徒步入川，在罗江六中四分校仍教国文课。他又先后引荐著名作家陈翔鹤和四川诗人方敬到四分校教国文课，一个近三百学生的初级中学，竟聚集了三位思想进步的著名文学家教语文课。

李老师选编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学名著以及反映抗日战争的好文学作品作教材，因经费限制，不可能把他编选的教材印成讲义，他就在课堂以读代授，让我们静心听讲。凡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均可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使我们对作品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他全文朗读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祥林嫂》等，

引导我们认识鲁迅精神，要像鲁迅那样地，到黑暗中去，去发掘更多的黑暗，去与黑暗作大的斗争！或者到光明处去，去学习战斗的方法，预备和黑暗作更大的斗争！他引用杜甫的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说：“屈原《离骚》，鲁迅全集是我们文学之江河。”

他讲解高尔基的作品，介绍我们阅读《母亲》、《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他在课堂上朗读瞿秋白翻译的《海燕》，最后他激情地提高朗诵的声调：“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吧！”他指出海燕、鸭、鸥、企鹅等是形象地表现了在社会革命风暴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相。李老师鼓励我们要像高尔基那样地在生活中勤奋学习，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参加一切实际生活，充实自己。

他对旧俄时期作家的作品作了介绍讲解，他用了三个多星期的课堂时间，全文朗读了鲁迅翻译的果戈里《死魂灵》和《塔拉斯布尔巴》的片断，果戈里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入微的描绘，使我感受到什么才是艺术。那时期我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处女地》、《前夜》、《门槛》等，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和《穷人》等。

他朗读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作家的作品，如《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使我们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者为理想和信念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那时我正处于叛逆性的年段，安德伦的行为在我心理上引起共鸣。李老师讲解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他指出：在这书里刻画出一个在革命中成长，被革命的

现实生活锻炼成钢一般坚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而这正是作者自己。

他把十九世纪法国、英国等国的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介绍给我们，他认为阅读著名作家的小说，可以间接获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可以扩大对人生的视野。他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是用艺术的画笔描绘了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就像马克思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那时我正读过《共产党宣言》，因此，我很有兴致地阅读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黛》等几部巴尔扎克的小说。

他从《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等文艺刊物上选好的作品朗读讲解，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高蓝的《哭亡女莎菲》，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还有柯仲平的诗等。

他主持编校刊式的文艺刊物《锻冶厂》（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共出过十期，不容于国民党统治当局而被迫停刊——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派员到六中四分校检查思想，提出“思想之纠正”）。刊名是李老师起的，借用俄国十月革命初期苏联一文学团体的名称，李老师希望我们青年人在艰苦抗战的时代，经受住锻炼，都能锻冶成有用的钢材。

他还主持编辑《在风沙中前进》，收录了十七位同学的三十篇作品，共计十多万字，是从山东到四川五千里路途上所见所闻的实录。青少年特有的敏感和正义感，对看不惯的种种社会丑恶腐败黑暗现象，毫不留情地揭发，大加口诛笔伐。因之找不到敢于出版的出版商。

他每天还要抽出很多额外的时间，甚至直到深夜，阅读和批改爱好文学的学生们的课外习作稿，化尽心血，像农民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地那样，勤奋地浇灌文学幼苗的成长。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浪潮，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恶化，受此影响，六中校本部的三青团制造事端，迫害思想进步的师生。四月，李广田老师被迫离开了四分校，先是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教书，后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九四六年秋随校复员，先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到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调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有种说法，这职务是毛泽东指定的。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八大”后补代表，列席“八大”。文革时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受迫害惨死。一九七八平反昭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李广田散文选》、《李广田文学评论选》、三集《李广田散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丛书）等。

## 方敬

在当时的报刊上，早已看到他的诗作，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四川诗人。经李广田老师的邀约，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十个月，教初中一年级两班的国文课。

一到校就写首诗《一个赞礼》作为见面礼。诗的首节和末节抄如下：



亲爱的弟妹们，  
你们年纪轻轻的  
就遇见黄海掀起  
狂涛怒浪无情的卷打  
你们的乡里，  
于是你们只得离去  
那文化灿烂的土地，  
出产苹果桃李的土地，  
有着古朴民性的土地，  
染着“五三”的血的土地。

亲爱的弟妹们，  
你们终于辗转来到了这大后方，  
来到偏僻但很温暖的土地，  
有着手足之情的土地，  
文化的新垦的土地，  
建立一个锻冶厂。  
让理论与实践配合着，  
让每门功课开着花，  
让大众壁报开着花，  
让各种集会开着花，  
让话剧公演开着花。

在真理的熔炉里  
锻炼着钢的链索，  
锻炼着民族的命运，  
而它美丽的未来  
闪烁在你们工作时的微笑里，  
休息时的歌声里。

看上去，方老师的年龄比李老师小，像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爱说：“我不是来教你们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向你们的生活学习。我将从你们那儿得到的一定多于你们从我这里学到的。”我们贴满墙上的壁报，他都一一细看，参加我们的各种集会——专题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诗歌朗诵晚会等。

一九三九年底我就听说刘守身、张继乾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也不会想到，方敬老师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事隔半个世纪后，一九九〇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德阳市中区党史资料》书上，有方敬老师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德阳市中区委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他说：“我到罗江四分校时，党组织对我是这样说的：‘抗战了，要大量地做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还要建党，发展几个党员，播下种子。罗江地方虽小，但在西北、西南交通要道上，流亡出来的国立六中的群众基础好，四分校进步力量很大，校长也还民主。很重要，你去，去工作一年。’于是我就照这个指示在罗江工作了一年。”

方敬老师在六中四分校，实际活动了五个月就完成了建党任务，

吸收了三名学生入党，组成一个党小组。他们是：与我同年级的刘守身，比我低一学期的张继乾，低两学期的石仁厚。在同本《党史资料》书上，载有刘守身于一九八四五月二十五日在郑州的访谈记录，他说：“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中共成都市委派方敬同志来到四分校，他与李广田老师熟悉，通过李广田老师的介绍掌握了一批进步同学的情况，其中对我、张继乾、石仁厚三人又作了近两个月的考察，前后同我们谈了三次话，最后一次他才公开了他的身份，问我们想不想加入共产党，我说：‘我们早就找党了’，我们三人都写了申请书，批准后，十一月份由方敬领导我们宣誓。”刘守身还说：“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成都市委调走了方敬，方敬走的时候对我们说：‘今后你们几个在这里坚持工作，上级党会经常派人与你们联系，既要大胆，又要注意隐蔽。’方敬走后由张继乾和我交替着与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定期接头。”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方敬老师离开了六中四分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政治形势紧张，学校里有捕人的传闻，三名共产党同学离开了学校。刘守身去了北方，张继乾回到被日军占领的山东老家，后被敌伪杀害。石仁厚是四川人，去成都转校。

新中国建立后，方敬一直任西南师范学院院长。

陈翔鹤

由李广田老师邀约引荐，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到六中四分校教初

中三年级一班的国文课。李老师告诉我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陈翔鹤在北平组建“沉钟社”，鲁迅说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文学团体。”

到四分校之前，陈老师在成都几所中学教国文课。据陈老师讲：成都共有七十多所中学，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几乎都是以《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抄》、《古文辞类纂》等为国文课教材，不准教白话文。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迫青年人读经复古，禁锢青年人的思想。

在四分校，陈老师看到学生们自由组织各种社团，出壁报，看到学生们的救亡歌咏队和抗敌话剧团到街头或下乡宣传活动，他高兴地说：“在这里听不到也看不见在成都中学校里的那种‘之乎者也’，‘咿咿呀呀，天下太平，懿舆盛哉，主子万年’的怪声怪现象了。”

他协助李广田编辑《在风沙中前进》的三十篇稿件，并写了《序言》。

序言里写道：“在他们的流亡中，他们看见了沿途的破产荒凉的农村，胼手胝足，劳苦终日不得一饱的大众，以及兵匪、烟毒、疫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将国家弄得极端贫乏的每一个中国角落里，都使得他们大大地睁开了眼睛。”“近二年来，他们每个人都几乎从这里而成长了起来：起初是敌人的炮火、飞机和炸弹，其次是他们在饥渴劳顿中所跨越过的鲁、豫、鄂、陕等省区已行破产而且落后，一座座大小城镇和农村。”“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准实在降落到悲惨得无可再悲惨的境地——这些都是从这些青年的忠实叙诉可以

看得出来。”“虽然他们所描写的几乎全部属于黑暗和悲惨方面，不过在本质上，他们却仍旧那样的结实而乐观——不怕省破家亡，不怕挨冻受饿，劳顿疾苦，也不怕四周一切充满阴暗的景象，跌倒了马上就会起来，经过一宿之后，又会充满元气地向前行进。这种强健的精神，是只有在一般富有生命力的顽皮孩子的身上，才能以找寻得到的。而且，或许也即是我们的时代之所以快要成为一个真正‘新时代’的主要原因了。”他还写道：“他们太年青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种种‘玩意’，和人世的一切都是何等的艰难而且复杂，他们似乎还不懂得，所以有时，就连对于他们直接负责的人，也不免毫不客气地要加以‘口诛笔伐’，略有微辞。自然，他们都是富于向上性的，因此才有如此的事事力求‘完美’的要求。”

面对眼前这群从抗敌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陈老师在序言里感喟自问：“他们的前途，将来又会变成怎样的呢？”陈老师自己作答：“从事实上看来，恐怕以后要使他们再行闭上眼睛，那一定是颇为困难的了。”

在序言的最后，陈老师写道：“所以，在这里，我即想‘借花献佛’，将这本小书，谨献给一般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一切人的眼前。”“而同时，我更不曾忘记，想借本书的力量，聊当作一个耳光，来重重地打在一切冀借盲目‘复古’之力，打算将中国全体青年闷杀，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之道的猪狗们肥胖的脸上！”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三青团控制了六中四分校；三月，陈老师被辞退，他在六中四分校工

作了整整两年。

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主编《文学遗产》，专门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学。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

陈老师是五四时期民主思潮中睁开了眼睛的一代人，半个世纪后，却因他终生渴求民主自由不再闭上的眼睛，受到反五四精神的造神，偶像崇拜恶浪的冲击，而遭厄运。

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

### 闫子桂

在北平读大学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三六年回到济南在私立齐光中学教书，一九三七年秋季开学转到济南一中教书。“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济南一中流亡到四川。一路上给学生讲解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形势的变化，指出抗战速胜论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抗战必败论是盲目的悲观主义，批判唯武器论，宣传陈独秀在《我对抗战的意见》中的十项主张。

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〇年十月，他在六中四分校担任公民课教员。他不用正中书局的公民课本，上课时带着《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在课堂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日本的侵略是反动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一样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世界控制权的非正义战争。

他在课堂上公开讲“雇佣劳动与资本”，揭示资本积累和资本家获取利润的秘密——剩余价值。他讲解“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地发展中前进，新社会将取代旧社会。

从湖北郟阳到四川罗江的二年多的时间，直接或间接受闫老师思想影响的学生共约五十多人，他们成立了“真理读书会”，他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书。在罗江，他们利用星期日，到城外的山林里或纹江河岸的石滩上，听闫子桂讲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认为以国民党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的民族解放任务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和民主革命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又不可避免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一切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连续性）。

闫子桂鼓励读书会员到工厂去，到工人中间去，从事工人运动，求索和实践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闫子桂和梁贻（他们都是抗日战争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代托派）的策划和安排下，一九三九年十月，“真理读书会”员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等十多名同学离开罗江去了重庆，他们是第一批走向工人的读书会员，都进工厂当工人做工，只孙鸿智一个人退却又回到学校读书。一九四〇年夏，

国立六中绵阳校本部(高中部)的三青团迫害进步老师和进步学生(在当时被通称“左倾分子”或被疑为异党分子),读书会员傅国良被捕,又有第二批“真理读书会”员范文华、苏学常、康至全、刘志超、陈汝林、任玉玺等十多人离开绵阳(读高中的)和罗江(读初中的)去了重庆,多数进工厂当工人。闫子桂也于一九四〇年暑假后秋季开学时离开罗江四分校去重庆。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交恶,政治形势紧张,六中校本部和各分校都严禁学生读课外书和进步报刊,监控和迫害思想进步的师生,一九四一年暑假又有第三批真理读书会员离校去重庆,他们是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读高中的李雨亭、隗宽、王学诚、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 、蒋复学等十人,多数进工厂做工。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庆托派组织遭受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逮捕了杨寿元、曹庆华、张洪仁、任玉玺、杜文林、赵凤田等十人,组织领导人梁贻、王振华也先后被捕。

闫子桂和妻杜锐逃离重庆去西安避难,由大学时的同学白某人推荐到中央军校王曲分校当经济学教官。

一九四七年,闫子桂考取公费去美国留学,以后流落海外,不知所终。

瞿亚先 音乐老师。抗日战争前,“济中”在济南时,校园里同时悬挂一面国旗和一面紫色的校旗。校歌是李广田老师作词,瞿亚



先老师作曲的。歌词：“我们是紫色的一群 / 我们是早晨的太阳 / 我们是迎日的朝云 / 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 / …… / 看佛山常碧 / 明湖常清 / 趵突水常喷 / …… / 日新 / 又日新 / 日日新 / 我们的精神长存 / ”。为什么把紫色定为校色，我没有听到任何解说，当时，我知道距“济中”近的正谊中学的校旗是绿色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济中”被迫撤离济南，开始流亡，李广田老师和瞿亚先老师又合作了一首歌曲，歌词：“咚咚咚咚咚 / 战鼓 / 哒哒哒哒 / 军号 / 全国同胞 / 时候到了 / …… / 听信号 / 听信号 / …… / 抗日的时候到了 / 抗日的时候到了 / 。”那时我们最爱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是抗日战争前，田汉为一部电影作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同法国“马赛曲”相似，都表述了为独立、为自由，战敌必胜的决心。流亡到泰安，听到平津大学生们唱那首感人泪下的“松花江上”，瞿老师领唱了一遍，我就会唱了。流亡到河南许昌，瞿老师教我们唱“大刀进行曲”，曲词：“大刀向 /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 抗战的时候来到了 / 抗战的时候来到了 /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 看准了敌人 / 杀一 / 大刀向 /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杀一 / 。”这首粗狂勇猛的歌曲，据说是驻防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首先唱起来的。自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得寸进尺，又企图侵占华北，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驻守华北的中国军队最受气，经常遭受日本驻屯军的挑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卢沟桥驻军吉星文团的士兵抗击日军侵略挑衅，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大刀进行曲”中的两声喊“杀”，象征性地释放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愤怒，这首歌曲成了抗战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我在这里走笔多写几句：揭开了八年抗日战争序幕的吉星文团长，没有捐躯抗日战场，却在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死在金门岛。

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济中流亡到河南南阳地区的赊旗镇（今余旗县）住了四个月。瞿老师组织“济中抗敌救亡工作团”，分歌咏组和话剧组，上街宣传，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兵去”等。教我们唱黄自的一支抗战歌曲，歌词有：“旗正飘飘 / 马正萧萧 / 好男儿 / 好男儿 / 报国 / 报国 / 在今朝 / 国亡家破 / 祸在眉梢 / 要生存 / ……”，高年级的好几位同学，投笔从戎，去了武汉中央军校。

徐州和郑州先后失守后，流亡到河南各地区的山东学生，集中迁移到湖北的郟阳，成立国立湖北中学。瞿老师把“济中抗敌救亡工作团”改组为“狂飙剧团”，又增加排练了“荒漠笳声”，“盲哑恨”，“沦亡之后”等十多幕话剧轮番演出，活跃了山城的抗战气氛。在郟阳的半年里，瞿老师教会我们许多新歌，其中我最喜欢唱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和两支旧俄时期的歌曲：“工人歌”和“伏尔加河船夫曲”。

“在太行山上”的歌词有：“红日照遍了东方 / 自由之神纵情歌唱 / 看吧 / 千山万壑 / 铜壁铁墙 /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气焰千万丈 / 听吧 / 母亲呼儿打东洋 / 妻子送郎上战场 / 我们在太行

山上 / 山高林又密 / 兵强马又壮 / ……敌人从哪里来 / 我们就打到哪里去 / 敌人从哪里进攻 / 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亡 / ……”。一派民众蜂起抗战的景象，令人神往。我在国民党抗战的大后方看到的是保甲长抽拉壮丁现象，壮丁逃跑，抓回被枪毙。看不惯丑恶的社会现实，神往自由民主的新天地，在郟阳时期，数学老师宓仁甫和济中校长的儿子孙冠文及他的同学刘桂华、刘振赢、俞新民等多人去了延安。俞新民比我高一年级，我与他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本党史资料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某高校的党委书记。国共合作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前后，社会政治生活尚活跃，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气氛。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才又祭起了防共反共的法宝，以维护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

“工人歌”的歌词：“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 / 机器吃我们的肉 /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 / 火沺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 沺后引起心中烦愁 / 无处泄恨无奈何 / 常见父亲打儿子 / 丈夫打老婆 / 全世界的工作兄弟 / 我们处处受痛苦 /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 这是最大的耻辱 / 各地朋友拉起手来 / 团结联合一条心 /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 / 快把斗争来展开 / ”。在我们学生中，一些信仰了马恩列托学说的同学，进工厂当工人，从事工人运动，用这支歌很快就与青年工人唱到一块。

武汉失守后，我们的学校又奉教育部命，迁移到四川绵阳地区，成立国立第六中学。瞿亚先老师率领二十四人的“狂飙剧团”经陕南到四川一路上每到达一个城镇都演出三天，有伤兵医院的地方，还要到医院慰问演出。

一九三九年二月，到达四川绵阳地区的罗江县，以“济中”师生为主体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设在罗江，是六中的一个初中部。瞿老师在四分校仍任音乐教师。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把一些喜欢唱歌又唱得好的同学集到一块，利用星期日排练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学校里举行过一次演唱会。女声独唱“黄河怨”的是高一一年级的陈懿为同学，他的长相和声调都像女性，在“狂飙剧团”专门扮演女角色。当他唱到“……丈夫哇 / 在天边 / 地下呀 / 再团圆 / ……”时，四十多岁的胡干卿老师竟激动得哭倒了，瞿老师赶快跑来扶了胡老师离开演出场。两天前，胡老师收到山东寄来的家信，他的老妻病逝。流亡在数千里之外，谁都有思乡之情，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陈懿为演唱得又是那么进入角色，低沉的哀怨倾诉，“地下呀 / 再团圆 / ”，听了，我心里也感到很不好受。

瞿亚先老师除了教音乐，他还喜欢画油画，他不吸烟，不吃酒，他唯一的消遣是找人搓几圈麻将牌。一九四〇年暑假，他主动辞职，学生们都不明白什么原因，要求他不要走，他还是离开了。他去四川省立重庆中学教音乐课。

孟浪少年时，唱着瞿亚先老师教会的歌曲，走进了抗日战争的时代大潮中。如今已是垂垂暮年，低声哼哼几句那时会唱的歌词，仿佛又回到了往事并非如烟的青少年时代。

## 孟浪少年时——我的中学时代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济南一中二百多师生迁移到河南南阳赊旗镇，与从山东各地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成立省立“山东联合中学”。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山东联合中学”迁移到湖北郟阳，改成“国立湖北中学”。我在郟阳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

学生的伙食，由各班选出一名伙食委员组成伙食团管理。一天，我偶然走过伙房，看见几个伙食委员围着一箩筐藕啃食，这些藕是做菜用的。我回到班上，气忿地对我班伙食委员傅迺昭说了一句：“你们真该挨揍！”午饭后，几个人找到我宿舍来，“你要揍俺！”是个操鲁西口音的高中学生，随着语音一个上来推搡我一把，接着一个打我一拳。同住一室的成德茂、李芸生、张锡缙等快速把我拉开，一位姓沙的鲁西同学跑来，连推带拉地把那几个人劝走。我初次遭受这样的屈辱，又气又恨，从此，我同傅迺昭永远不再讲话。从那时起我同成德茂、李芸生等几个格外亲近起来。

一九三九年初，到达四川罗江后，在学校所在的文庙附近有个篮球场，我们立即成立了取名“平平”的篮球队。买了个篮球，定制了印有“平平”字样的球队背心。“平平”字型像双翼飞机，我们挨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对飞机的印象太深了，我们的球队也应像飞机那样威猛。球队成员：成德茂、李芸生、李玉才、信法钧、李克成、李毓林、张锡缙、张洪仁、张同祥、王连辉、熊安东等十二人。

一九三九年，六中四分校真是个自由民主的园地，学生自由结社，组织读书会，举办各类讨论会之风盛行。壁报贴满山西会馆的东墙。还能记住的刊名：《老百姓》、《思潮》、《突击队》、《射击手》、《路灯》、《白火》、《新地》、《战旗》、《火炬》、《喇叭》、《十月》、《暴风雨》，等等。各类性质的都有，政治的，综合的，最多的是文艺的——散文、随笔、诗歌、漫画等等。方敬老师评论：“你们各种各样的壁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抓住现实，认识真理，都希望自己的笔能跟争取民族解放的刀枪灵活地配合起来，表达了与时代相呼应的感情和思想。”

“平平”队员们不甘心只玩球锻炼身体，我们也出了一份壁报《白火》，物理课上听老师讲过，火焰的白色部位温度最高。球队的名称和壁报的刊名，显示了我这伙青少年的心态。

我们没有正式成立读书会，只商定把每人手中的书刊集中起来，存放在成德茂的一只竹箱子里，谁要看书，随便去取。竹箱子里多是文艺书：肖红《生死场》，肖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集》，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斯诺《西行漫记》，巴金《家》，矛盾《子夜》，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曹禺的几部戏剧等。社会科学书有艾思奇《大众哲学》，张仲实《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昂吉耶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等。矛盾主编《文艺阵地》和胡风主编《七月》两份月刊不定期地购买。

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文庙和城隍庙里用竹笆木板拼凑起来的寝室，潮湿，阴暗，散发着霉腐的气息，睡在硬硬的铺板上，仅只有

一条棉被的同学，一半铺在床板上压在身下，一半裹在身上。米价飞涨，伙食费只够维持吃不饱饿不死。李广田老师在作文课上曾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我们在饥饿中成长”。

我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读课外书，写壁报稿，开读书讨论会，歌咏会，上街下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等。

方敬老师离开六中四分校两年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六中四分校被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异时）写了篇六千多字的文章，题为《苦难——给一群在苦难中奋斗在奋斗中成长的孩子》，发表在当时成都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详实地记叙了他在六中四分校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感受。如今读此文，尘封了近七十年的如烟往事，仿佛又历历在目。他曾参加了我们班的一次生活批评会，也简要地记录在他的文章里：

.....

我又坐在你们的批评会上了。

——近来我们的生活与学习都很松懈，督促不严，班长先得负起责任来。一个同学“发难”了。

——我的能力不够，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很对不起同学，希望大家想个好办法。

——我看每个人都应该向自己，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一种难耐的沉默，全都低着头，好像责备自己，真是孩子，犯了过错，怕见大人似的，畏怯的不宁的情绪塞满了你们的心。

你们的表情是自疚而难过的，你们，有过错的或无过错的，都在默默地忏悔。

——这几天都欠紧张，比如早晨该早起不早起，上午该上课不上课，也不能只怨谁，大家都有关系，我想也不会是出于有意。过去的不说了，以后要能够积极地做到自觉自治，制裁还是消极的。

——自然能够做到积极方面最好，不过我觉得还应该举出几个人来负责监察的责任。

大家都赞成这个建议。监察人数决定四人。接着就选举了，你们不约而同地选出了四个近来懒惰的。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用手蒙着脸，这好像给了他们最有力的惩罚，自己在痛心地悔改。忽然一个被选者发言了：

——这是我的错，对不起同学，对不起自己，我发誓从明天……

他颤抖而羞赧地自白着。落后忽然坐下，靠在桌边，哭了起来。话好像被什么东西哽塞住了。这孩子至诚的猛省使你们都感动。你们都原谅了他，而且还劝慰他：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你们是好孩子，你们知道怎样把错误的小坑填平，错误的石子踢开，你们走着，随时提防着失足。

……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养成了自学自治的习惯，并且能在集体生活中教育自己。



一九三九年暑假后，九月间，童子军老师邹绍夷组织三级一班的学生去南山举行露营活动，三级二班的学生决定偷营，我参加了偷营活动。晚饭后等到太阳落山天黑，我们出城，先隐蔽在山下一农家的院子里。半夜时分落起了蒙蒙小雨，我们分成三个组出发。第一组是几个身体最棒的，负责突击山顶偷营；第二组埋伏在半山腰接应；第三组安置在山脚下掩护，我被分派在第三组。第一组摸爬到山顶后，发现营地竟没有站岗放哨的。拔掉营地的旗杆，把放在帐篷外的锅灶等工具搬了家散弃于山腰，偷营成功。三组人马在农家小院集齐后回城，虽然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胜利凯归，心情兴奋，虚拟的冒险活动，也够刺激。

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我和尹继文商量着写偷营胜利捷报，我执笔写稿，尹继文誊抄，赶在早饭前就贴到文庙门口的墙上。捷报的用语用词，都是从报纸上战地记者报导中学来的，抄来的。词句极尽吹虚并表彰自己，矮化加丑化对方。惹恼了三级一班的同学，连带队的童子军老师生了气，因为他没有安排我们偷营，说我们“太自由了”！这位老师思想旧派，他把自由理解成任意妄为。

童子军老师的生气，使我们三级二班的同学都感受到了压力，因而产生了意见分歧。邵延仪是第一组的突击手，干得最热火，旗杆是他拔的，他看到老师生气了，胆怯了，他抱怨我和尹继文，不应该写那张捷报，他认为是那张捷报闯的祸。我和尹继文又加了一层精神压力，不知如何是好，没了方向。

李广田老师教我们两个班的国文课，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和尊敬。想不到他出面召集两班同学开了个和解会，并为我们草拟了份和解公告，他还征求我们对公告内容有无不同意见。李老师的一纸和解公告竟使两个班争吵得面红耳赤的问题一笑了之，冰释了。

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李老师在文革时期惨遭迫害致死也已四十年了。在《李广田散文集》第三册里，我发现收有他写的那篇和解公告的草拟稿：

“有露营者则必有偷营者，有防守者则必有攻取者，否则守营者独居荒野而问津无人，当复有何趣味？况成败乃兵家之常事，战胜者不骄，而败者勿自馁也。此次三级一班露营，三级二班偷营之后，又复夸大其词，其用意原在引起偷营之兴趣，言词虽未尽属实，而对三级一班同学，实未存丝毫侮慢之意，况我三级一、二两班原属兄弟之国，今乃互为假想之敌，聊作阅墙之戏，孰长孰短，何足道哉！而今而后，仍当亲爱精诚之精神，共相扶持，互为砥砺，有敢侮我者，共先外御之。”

李广田老师写此稿时三十三岁，我时年十七年。如今八十五岁，重读并抄录老师此稿，反躬自问，深感当时老师用心良苦，措词婉转，“夸大其词”，“未尽属实”，“未存丝毫侮慢之意”，像是孩子犯了过错后得到父母的原谅，又得到抚慰，心境惭愧又自责，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朴实做人。

一九三九年暑假前，教育部派了位叫孔敬庵的督学到六中四分校查思想，来做“思想之纠正”，怎么纠正不得而知，只听到李广田

老师在课堂上说：“他是来装猫变狗的”。暑假后，又派了一位督学由校本部校长陪同来四分校视察，召开老师座谈会，指责李广田老师在课堂上不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材讲课而专门教授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等等。召集几名初三学生谈话，向一位学生：“你信仰资本主义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我信仰三民主义”。“为什么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这位思想进步的初三同学巧妙地套用了国民党官方的宣传口号，使这位视察官员缄口。

教育部先后两次派员视察之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调六中四分校孙校长到重庆，以“纵容左翼师生”为借口扣留，要他接受检查。经四分校师生向教育部严正抗议，十一月底孙校长平安返校，全校师生开了个盛大庆祝会，特定名为“孙校长受训毕业返校欢迎大会”，孙校长在大会上讲述了他在重庆遭受到那些无理由的控告和莫须有的指责，“左倾”、“赤化”帽子一大堆。我们听了，感到无比愤慨。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北郟阳时，就听说那未一股守旧势力，用“左倾”、“赤化”等流言蜚语攻击和诬诋济南一中的师生。腐败无能又想保住既得到利益的各层官员们看来，自由民主就等同“左倾”、“赤化”，像幽灵一样地使他们感到恐怖。

一九四〇年初，教育部撤销了孙校长的职务，由教英语的丁老师当校长，他是位死抓住学生课业不放手的老师。跟他学英语，只有死记硬背，勤读勤写，不然，在课堂上只有挨训挨罚站的份，我就挨过一次，一个词的音节念错了，“你站在那里吧！”一直站到下课为止。

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同学是受闫子桂老师思想影响的，

同学们中很多人都知道。在课堂上，他们和同学们一样地听闫老师讲解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在课堂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从闫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思想指导。他们成立“真理读书会”作为外围组织，在初二、初三和初中毕业后升入绵阳六中校本部读高中的各班级中都有会员，共约五十多人，两地都出壁报，罗江是《思潮》，绵阳是《黑白》。

一九三九年底，四分校学生中有了共产党小组，当时，我不知道是方敬老师发展的，只知道与我同年级的刘守身，低我一年级的张继乾、石仁厚三位共产党同学活动很积极，他们在初一和本地四川学生班中成立“野火读书会”作为外围组织。初二和初三的刘公宽、李存业、蔺善达、杨镇畿、姜渭微等受共产党同学的影响，成立了“十月社”，出壁报《十月》。

受托派同学及共产党同学活动的影响，一九三九年底我认真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的著作，为的是弄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读之前，我曾以为马列理论书一定是深奥难懂，读之后，才知道马列的书不难理解。读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书，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资本制度把人异化成了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动物。在那战争的年代，容易接受他们的学说，相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除战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我信仰了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九四〇年初，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常到我住的寝室来，找李玉才、成德茂、李芸生、信法钧等谈话，他知道我们“平平”球队的几

个人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我们几个人对他也表示好感。有一次，他送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本书很重要，很全面，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这本书，才能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他说：“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确的，在苏联不是都实现了吗。托派们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们懂个屁！他们只会反马列、反苏反共，他们就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等成德茂、李芸生几个人都读过之后，我读了刘守身介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读了他拿来的一本康生写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闫老师和托派同学会是匪徒，我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么回事。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我在罗江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随便查看图书卡片时，无意间发现有《托洛茨基自传》，我借了出来。信法钧、李芸生知道了，责备我，“怎么看这种书，不要看！”语气是认真的。“不看怎么知道他的不对呢”，我讲的也是实在话。

与我同年级不同班的杜文林知道我读《托洛茨基自传》是想了解托洛茨基是不是反马列，他主动把托洛茨基著作介绍给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读书会”的会员。他性格内向，待人态度和善诚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个人办了一份壁报，不贴在校内，而是贴在街头的墙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他勤奋认真，星期日，他一个人自写自编自画，忙一个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坚持了很长时期。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后的两个多月里，我读了托洛茨基的《儿子、

朋友、战士》，《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革命论》，《十月的教训》，《苏联现状与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几本书。杜文林还给我看了抄在练习簿上的几篇文章：《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苏芬战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等，都是闫子桂老师的笔迹。

读了托洛茨基的书和文章后，知道了一个过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讲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叛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传统，败坏了列宁的苏维埃民主制，背叛了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使命，使第三国际名存实亡，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蜕变出斯大林官僚独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了解了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界定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而反对斯大林特权体制。斯大林体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败坏社会主义信誉，而有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

读托洛茨基书的同时，我读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他写的《刚果旅行记》，我早已读过了，他记述了在殖民主义者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下，刚果人民的悲惨灾难生活。纪德同情受压迫的穷苦人民，认识了现代社会制度而痛恨资本主义，痛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而转向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怀有崇敬心情，一九三六年他应邀参加高尔基葬礼的机会，到苏联旅游参观访问，到处都受到热情周到的接待。他亲眼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苏联现实，与亲苏人士

宣传和吹捧的苏联，完全是两样的。回国后，他写了《从苏联归来》，如实地记述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没有盲目地歌颂和唱赞美的诗，使亲苏人士感到失望，他们原来打算借用纪德的名人效应，捞点宣传苏联的本钱。纪德又写了《从苏联归来答客问》，回答亲苏人士对他的指责。纪德明确地告诉人们，斯大林的苏联没有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他看到旧世界的特权在苏联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还魂。因之，纪德遭到法共和亲苏人士的阴险毁谤。我相信纪德是正直的人，他对苏联社会实况的考察和描述，实证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现状的分析和判断。

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一九四〇年暑假后，我同“平平”球队的李芸生、成德茂、信法钧等分了手。他们坚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信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他们跟共产党走，为实现苏联那种社会制度而奋斗。仅仅一年前的一九三九年，我还是懵懵懂懂地和他们一样地相信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把斯大林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敬仰和崇拜，只因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书，我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我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原理，信仰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成了托派。

当时的思想进步同学，都是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把谋求个人的生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而睁开了眼睛的青少年。国民党屡遭军事失败，政治黑暗，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通货膨胀，米价飞涨，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思想早熟，对现实不满，为追求真理，为实现信仰而选择了各自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回

到敌伪占领的山东家乡去打游击，有的到重庆进入工厂，当工人，在那里经受锻炼，投身工人运动，求索中国革命的新路。

一九三九年冬，托派真理读书会的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等十多名同学离开学校去重庆时，我还不是托派，是事后知道他们去进工厂当工人。孙鸿智因吃不消苦一个人又回到学校读书。

一九四〇年暑假，六中校本部三青团放火烧房，嫁祸于人，迫害进步师生，又有第二批托派真理读书会员离校去重庆，他们有范文华、苏学常、康至泉、刘志超、陈汝霖、任玉玺等十多位同学，大都进工厂当工人。他们离校时，我正在读托洛茨基的书，对托洛茨基派的活动，稍有所了解，他们弃学走向社会的实践活动，对我的思想影响不小。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罗江有捕人的传闻，三位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张继乾、石仁厚迅速撤离学校，受他们影响的刘化生被逮捕。蔺善达、肖力山、信法钧、成德茂、李芸生、杨镇畿、吕登州、朱静英等十五名思想进步学生被迫离开四分校。三月，从一分校调来三十多名三青团学生，四分校建立了三青团区队。教育部派来一位年轻的女音乐老师指导三青团活动。这位女音乐老师不教唱抗战歌曲，专门教唱些迎合青少年萌动心情的情歌民歌，例如：“千尽流水 / 万里长江 / 烟波一片茫茫 / 离情别意随波流去 / 不知流到何方”。自从这位女音乐老师来校后，只要有人高吭：“……呵，姑娘 / 你是天上的月 / 我是那月边的寒星 / 你是池中的水 /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 你是……”，《夜丰歌声》立即变成多人



的大合唱。自从这位女音乐教师来校后，抗战歌曲不时尚了，仿佛这位女老师的音域承受不住那雄壮、悲愤的《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承受不了那粗狂勇猛的《大刀进行曲》。以后我在六中读高中部时，一位男音乐老师也是教育部派来的，他也不教唱抗战歌曲，教唱些修身养性的歌曲，例如：“坐卧广厦中 / 不愁炎热风 / 行立大树下 / 不怕烈日烘 / 广厦大树荫蔽吾 / 吾心感谢伊 / 如何感谢伊 / 立志图奋起”。尽教唱些忘却战争，好像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歌曲。陈翔鹤老师曾说过，成都的中学里，国文课念文言文不教白话文，音乐课不唱抗战歌曲。

一九四一年五月，国民党罗江县党部派军警包围了四分校，逮捕了韩梅村、田裕恒、张洁民、南成美、张锡缙、隋超、刘宏让、王守先、胥正华、张宗武等二十多名进步学生，关押了四个多月，杳无证据，由四分校新校长丁用宾老师做保获释后，大都离开了学校，多数人去了北方。他们中的几个人欲去延安，行经宝鸡时被扣留，关在当地警察局看守所里，他们自称是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学生，宝鸡方面曾有公函寄到学校求证，我听教地理课的万禹疏老师讲，他建议学校出公函保他们出来。这几名学生中的刘宏让是万老师在山东时的学生，“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京溃败后，他在浦口只身扶着一块木板渡过长江，他辗转到徐州，打听到山东流亡学校的去向，他又追赶到河南找到了他原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到了四川分配到四分校读书。他平时总是少言寡语，有时他讲起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事，他总是说：“当局没有抗战决心，一会说

与城共存亡，一会又说保存实力，撤退，能不溃败！”我不知道他读过什么进步书刊，我认为他同共产党同学少来往，同托派同学也少来往。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同许多思想进步同学同时被逮捕，大概促使他思想激变，决定投奔共产党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重庆托派组织——中共同盟四川地委会，逮捕了两名主要领导人梁贻、王振华和在工厂里做工，从事工人运动的六中学生杨寿元、曹庆华、张洪仁、杜文林、任玉玺、赵凤田等十人，他们在六中四分校读书时，都是真理读书会员。

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并了六中四分校。在校师生被并入六中二、三分校。

××      ××      ××      ××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读高一，在绵阳六中校本部读高二和高三。高中毕业后，一九四四年初离开绵阳去重庆。

梓潼一分校，是国立六中的师范部，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里有严密的控制力量。为了甄别和监控四分校和二、三分校的初中毕业生，特开设了高中部。训育主任宋东甫是个国民党党棍，他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物，不准学生组织社团，班会和学生自治会也不许成立。他明查暗访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还布置三青团学生采取盯人战术。他对学生训话时，除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外，他讲不出什么货色。在训话中一旦提到蒋介石的

官衔（“委员长”或“总裁”）时，规定学生们都要肃立立正。再次提到，学生们要再次肃立立正。他的训话就成了领袖崇拜驯猴戏。

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叫到他的办公室，轻则警告，重则离校，否则有被拘捕的危险。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后，一些在初中读书时与共产党刘守身、张继乾有交往的同学悄声地离开了学校，其中有与我很友好的张同祥，走前，他告诉我，他被宋东甫叫去，受到了警告。

托派真理读书会的李雨亭、隗宽、王学诚、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蒋复学等十名学生被迫离开了学校，他们大都去重庆进入工厂当工人。留在学校里的真理读书会员有王元勋、曹玉林、李安民、姜桂林、刁长尧、刘锡佑、王春禄等十人，表面上我们停止了相互间的交往。为了保护我们手头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书，主要是马恩列托的书，我们把一部分藏在肺病隔离疗养室的病床下，王元勋患肺病，住在那里疗养。另一部分，由曹玉林和李安民设法携带到城外，用桐油纸包好，藏在山庙的神座下，埋在古坟的砖缝里，塞进南山塔的墙洞里，为此，损坏和丢失了一部分。

在梓潼被甄别，整训了一年，一九四二年初，教育部把一分校从国立六中独立出去，成立国立梓潼师范，为川北地区培养师资，高中部的学生归并到绵阳六中校本部。一听说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像获释的囚犯，不等学校正式宣布，我们就立即打好背包，迅速离开梓潼，徒步直奔绵阳，两地相距一百一十华里。蔡校长立在校门口，看着我们毫无留恋之情的离校而去，一副无可奈何的苦笑样子。我走过他面前时，还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在山东时，他是

济南第一师范校长，我父亲在他那里教书还曾兼任过教务主任。我就在他们师范学校的附属实验小学读书，小学老师都是他们学校的毕业生。蔡校长是我小学老师的老师，又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向他鞠躬告别，出自敬仰之情。我们对梓潼一分校没有好感，主要是对训育主任宋东甫没有好感，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一个官僚。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相信教简易师范的老师能教高中，而绵阳六中校本部是正规高中部，那里聚集了在山东时就有名望的高中老师，学生总是崇敬名校名师。

国立六中校本部的校址位于绵阳城外西北部，是利用一家停办的针织厂房改建和扩建的，大部分是砖瓦平房，新建的房子都是土墙草屋顶。校园围墙外是农田和为农田灌水的小溪。初春，学校就座落在金灿灿的油菜花的海洋中。校门朝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刚刚修建好的川陕公路在校门前经过，川陕公路联结西北公路通到新疆，是抗日战争时期两条国际通道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军用物资，经这条通道源源运来。另一条国际通道是一九三九年才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无力援华，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军用物资，即从滇缅公路运进。

我们到绵阳后，校本部的葛校长即把我们召集起来，在训话中讲到：“……我是教育部派来的，你们要听我的话，要好好念书就行，不好好念书，开除！……”我们都是流亡学生，都以学校为家，被开除，首先就没有了饭吃。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两方的交战区和敌占区，有许多中学生流离失所，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的西南地区，先后

成立了二十三所国立中学收容这些学生，为抗战建国培植人材。我早就听说，这位葛校长在国民党政府里有后台，才捞到了国立六中校长一职。他治校的方针是校党团一元化，他样样都要抓，样样抓而不紧。他知道禁止学生看进步书刊是难于办到的，因此，他提出“要引导学生思想走上正规”，“要进行心理建设”，“要思想之纠正”，他的具体办法是命令各课老师增加学生的课外作业和多举行不定期的抽考。繁重的作业，天天备考，把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捆牢。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庆的托派组织遭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后，我们与重庆暂时失去了联系，我们决定读完高中考大学成了一股动力，我们做到了好好念书，上课时专心听老师讲课，勤记笔记，课后及时把作业做好，从容不迫应对抽考。星期日和暑假寒假，我仍有时间读想阅读的课外书刊。

我读高二和高三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战争，都演变到了转折点。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消极地应战四年之后，才跟在美英屁股后头正式对日宣战。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并入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控制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德军打败英法联军，法国投降，英军撤出西欧大陆后，希特勒抛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德苏战争爆发，斯大林祭起了反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主义统一战线，苏联同英国签订了对德战争协定，一九四三年宣布解散第三国际，与美英结盟，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召开了占胜德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德里兰会议。

一九四二年初，重庆《大公报》发表了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未登完待续），立即遭到中共《新华日报》的毁谤，连在国共两党之间持中立姿态的《大公报》也受到了指责，因此没有再发表未登完的续篇。五月陈独秀病逝。他没有看到苏联军民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又续在南方战场几次大决战中，全面击溃德国侵犯军，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结局改观，战后出现了美苏两个集团的冷战对持局面，人类被推进了核战毁灭的威胁中，是当时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

第三国际解散，重庆国民党报纸上掀起了一阵反共喧嚣：“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等等。在川陕公路上跑汽车的司机带来消息：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局势很紧张。

我们不知道上海托派对中日战争的性质和对苏联的性质的看法，有了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分裂。我们仍然按照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观点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质，按照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列宁的书在重庆、桂林、成都等大城市的《新华日报》门市部或生活书店能买到，托洛茨基的书已无处可买，我们手头的几本经多人阅读和藏放保管不善等原因，都已破损，曹玉林决定手抄一份出来。

在学校教室里抄不方便，怕引起三青团他们的注意。沿公路走十多里路，路边有一家供过客歇脚吃茶的小店铺，每逢星期日，我陪他去那里，他抄书，我做功课，同时留心公路上的动静。我们陆续抄了好多个星期日，初去时老板娘喂养的一群毛绒绒的鸡雏在我脚边跑

来跑去，我还特意带点吃的撒地上看它们争食。曹玉林抄完《苏联现状与前途》和《不断革命论》两书时，那群鸡雏已经是羽毛齐全的童子鸡，散养在屋后的竹林里，看小公鸡跟小公鸡争斗很有趣。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们得到好消息，一九四一年重庆托派组织遭国民党特务破坏，被捕的同学有部分人获得释放，并安排他们到指定的学校读书。张洪仁去三台国立十八中，杨寿元去阆中国立四中，张圣时去江津国立九中，杜文林去沙坪坝中大附中。同时也知道经历了那两次破坏未被捕仍坚持下来的同学，又重新组建了重庆托派组织。

一九四三年底高中毕业后，我、曹玉林、刁长尧、王春禄决定去重庆，姜桂林、杨承志、王元勋、刘锡佑去成都。

5

## 重庆托派组织略记

“抗战爆发后，闫子桂曾把一大批流亡内地的山东学生拉到托派组织。”（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14页）

“四川的托派组织也有相当的发展，复刊了机关报〈电光〉。”（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14页）

一九八六年，梁贻在香港出版〈回顾〉一书中，记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西安沿川陕公路步行进四川，走到罗江，“见了闫子桂”，“和子桂盘桓了一天”（当时闫子桂是国立六中四分校的教员），“他在学生中有了信仰，已经谨慎地建立了（托派）组织。”“我俩有同一观点：学生一定要进工厂，不经过锻炼是靠不住的。”（梁贻〈回顾〉62页）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产生了托派组织，可以说是梁贻和闫子桂两个人做起来的。闫子桂在国立六中四分校影响发展了五十多名托派思想的学生，梁贻先到重庆进工厂，然后把陆续到重庆的托派学生引进工厂做工，实践他同闫子桂的“同一观点”。

梁贻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了重庆，经熟人介绍，到距市区四十多里的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电灯房干了三个多月后，又考取了金陵大学电机系开办的电气训练班，校址在曾家岩，对面是重庆电力公司。梁贻在制呢厂时结识的青年工人师傅刘振基已转到了电力公司，



两人朝夕相处，受他影响，刘振基成了托派成员。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十二月，第一批托派学生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尹纯德、张圣时、杨承章等先后到了重庆，他们大多数进入工厂当工人。杨寿元先进益世报印刷厂学排字，后进二十一兵工厂技术学校；孟宪章进二十一兵工厂步枪厂学徒工；孙鸿智进二十一兵工厂当锻工，因不能适应锻工工人生活，又回到了学校读书。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后，第二批真理读书会员到了重庆。他们是刘志超、苏学常、范文华、任玉玺、康至全、刘广恩、赵盛文、曹庆华、刘恒新、郭桓参、陈汝霖、牟家义等十多人。刘志超进南方印书厂排字工；苏学常南岸织布厂工人；刘恒新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刘广恩军政部制呢厂；康至全公共汽车司机；曹庆华公共汽车售票员；赵盛文郭家沱五十兵工厂勤杂工；任玉玺南岸沱精厂。

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后，第三批会员到了重庆，他们是单才、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隗宽、赵凤田、王学诚、李广智、蒋复学、李雨亭等十多人。单才江北铁厂抡大锤；单松岑江北铁厂锻冶工；王香臣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工；张洪仁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工；杜文林南方印刷厂学徒工；王学诚、李广智、蒋复学三位会员因没有及时找到工作，流落街头，夜宿嘉陵江岸边的废弃船上，都死于霍乱。

大批托派学生进工厂当工人，梁贻策划着要成立个核心领导小

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重庆两地通航通邮，经上海托派组织介绍，梁贻与在重庆的张维良取到联系。张维良在施复亮开的南方书店当伙计，帮施复亮主持南方书店业务。由于张维良的关系，刘志超和杜文林先后进入南方印刷厂。一九四〇年底，梁贻与在部队上当排长的赵芳举取得联系后，赵芳举脱离部队，考入重庆电力公司当职员。赵芳举，山东青州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读师范学校时参加入托派，与梁贻是同一时代的一代托派，他们参加托派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指令下，执行左倾冒险政策时。

一九四〇年九月，梁贻离开金大电训班到五十兵工厂电气间当电灯工。五十兵工厂位于长江边的郭家沱。轮船从朝天门码头下行一小时的路程。每逢星期日，梁贻都到重庆与刘振基、张维良及六中学生范文华等聚会。

范文华是受闫子桂影响较早的学生之一，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与同班同学孟宪章发起组织“真理读书会”。他曾被选为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因向校方交涉解决学生的生活福利问题，他脾气躁，与总务主任发生争吵，被校方开除，后改为记大过一次。一九四〇年暑假他离校去了重庆。梁贻在〈回顾〉中写到“罗江来了个首座学生，老范（范文华），长清人，大脸盘，大眼睛，能读书，能讲话，能打架，便由他担任联络安排六中来的学生，他暂不进厂。”（〈回顾〉72页），三个“能”字把范文华的特点说齐了。在五十多名真理读书会员的心目中，他是最信得过的，都敬重他，他熟读列宁

选集（共十二卷，只买到九卷）。他到重庆后，就成了梁贻的副手，专职跑组织联络工作。他也是后期重庆托派组织领导人之一，化名艾夫。在重庆托派组织中，只有他一个人始终是脱产的，他的生活费用和有限的活动费用，全靠在职的同学支持。

一九四一年初，王振华到了重庆。王振华又名王叔本，据说他崇敬叔本华而取此名，“树本”是他人误听传说。东北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在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托派临委员屡遭破坏，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的托派大学生王叔本、刘家良、斯朝生、扈文焕到了上海，夺了上海托派临委会的权，成立托派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一月，他们将陈独秀领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表示托派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而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关押南京军人监狱。他们定名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却一直延用了下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同时获释，王叔本回到上海，以后又去了香港，一九四〇年，他回到上海，在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组织原则问题上，他同当时上海托派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编委们发生意见分歧，争执过程中，编委们借他犯了组织性的过错而将其开除（关于他被开除事，在下一节中再谈）。他被开除后，回到香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内地广西，暂住女友黎洁霜家，他的女友在香港做工

时受他影响而参加了托派。一九四一年初，他从广西到了重庆，由他大学同学介绍进<益世报>社做夜班校对工作。同时与梁贻接上了头，他们在北平时就相识。梁贻知道他理论水平高，会写文章，就让他主编机关报 <工人呼声>，并让他负责指导二十一兵工厂的工作，那里有十多名托派学生在厂里做工，是重庆托派组织活动的重点。他被上海托派中央革出教门，到了抗日战争的首都重庆，意想不到地又被拉进托派组织，主编机关刊物 <工人呼声>又直接指导一群热情有余，政治经验不足的托派学生，他的兴奋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到一九四一年春节为止，在重庆由梁贻聚拢起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老人”有梁贻、张维良、王振华、赵芳举、闫子桂等人。

梁贻——是六中托派学生在重庆的组织者。

王振华——<工人呼声>的主编和各种传单的编写者。

赵芳举——<工人呼声>的刻印和发行。

张维良——经济支援和介绍会员进厂。

闫子桂——是六中托派学生的启蒙老师。

刘振基——是梁贻到重庆后首先影响发展的一位工人师傅，负责财务保管工作。

以上这些人都有工作，星期日他们才能有时间聚会。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前期的重庆托派组织最活跃时期。有了组织刊物 <工人呼声>，分散在十多家工厂里做工的托派学生可以

用来扩散托派思想进行宣传活动。由于米价暴涨，各工厂里的工人，常为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而举行罢工，王振华根据各厂反映来的情况，及时印发传单，为工人写出心中的诉求。在工厂里的工人中发展了托派成员，如刘毅原是江北铁厂工人，他在工人罢工中很积极，他把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思想告诉了在那厂里的托派学生，然后由王振华整理成宣传文字写成传单散发，刘毅受到了思想影响而成了托派成员。抗战结束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彭述之的建党大会。在电力公司的刘振基影响发展了黎昌堃和刘有绶成为托派成员；孟宪章在二十一兵工厂影响发展了技工白玉玺成为托派。只有二百多工人的磁器口制呢厂的托派学生刘广恩等领导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米贴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工人们给他披红绸，戴红花，共同庆贺。

曾在二十一兵工厂做工的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和二十九日写给李雨亭的信中回忆说：“王振华定时到二十一兵工厂来，给我们讲革命理论，布置工作，……多数是在临江门对面的嘉陵江岸边的沙滩上，边走边谈。”“有一次天黑了，王振华就在陈家馆街我租的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机放在我的住处。”

王振华初到重庆与梁贻接上头时，梁贻尚不知王振华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的事。大概五月前后，梁贻和张维良才得到上海托派中央和香港托派组织的通知，虽没有言明开除的内情，但他们绝对相信中央的决定。他们已经把王振华拉进组织，主编机关报。“我们正需要一个这样角色（指王振华理论水平高，能写文章），只要他讲的是革

命的语言，就不必信什么叛徒了。”（〈回顾〉74页）这话表明他们处于两难的心理矛盾中。

王振华主编〈工人呼声〉后，继续宣传陈独秀的十项抗战主张，又加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力度。在各工厂里的托派学生们，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大，政治经验差，不知如何掩护自己。梁贻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已预感到隐藏着的危机。他向托派学生们提议：“我们的（宣传）印刷品暂停散发”（〈回顾〉73页），还说：“话说冒失了，可以不认账，白纸黑字落到特务手里，就要麻烦了！”（〈回顾〉73页）这群为了信仰、追求真理而进入工厂当工人的孟浪少年人，像初生牛犊不惧虎，对梁贻的意见听不进，还责怪梁贻是“取消主义”。

“面对组织的危机，却无法唤醒他们的注意，李申（赵盛文，与梁贻同在五十兵工厂的六中托派学生）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却也难说服他”（〈回顾〉75页）。

“记得大概是从六月末起，碰头会只有梁贻、张维良、刘振基三人在另处召开，不让王振华和我两人参加。”（赵芳举〈夕阳忆语〉68页）“〈工人呼声〉第四期记得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这一期王振华的文章，被梁贻和刘振基扣留不予刊登的”（〈夕阳忆语〉61页）“这种情况，我向王振华谈过，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夕阳忆语〉75页）“王振华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话，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之间确有一定的分歧，当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夕阳忆语〉69页）。赵芳举还有一种说法：“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

中旬，从这时候起，王振华被剥夺了〈工人呼声〉的主笔、主编任务，我也同时被免除了对〈工人呼声〉的刻印、发行工作。从此，把王振华和我排除在组织之外，成了‘编外人员’。”（〈夕阳忆语〉114页）。

从赵芳举的这些回忆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判断，一九四一年五月，梁贻和张维良得知上海托派中央开除了王振华的通知后，梁贻开始做了些疏远王振华的举措。而王振华明白梁贻只能相信托派中央的，不会听他的任何辩解，正如赵芳举回忆的：“他不愿多谈，似有难言之隐”。

梁贻也明白，王振华的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都比自己强，且已取得了众多托派学生的信任，而这群学生都是读了马恩列托的理论书，信仰了马恩列托的学说是真理，才走进工厂当工人的，他们都能独立思考，不会盲目崇信任何个人。

“我得离开这里，到那里去呢？”（〈回顾〉75页），梁贻遇到困难产生这种想法是符合他的性格、脾气和一贯作风的，他曾多次在一个地方活动一阵子，呆不下去了，挪一个窝，一走了之。立即写信给在江苏乌江私立为群小学的张立民，他们是在山东时相知的老朋友。得到张立民的回信后，梁贻决定离开重庆去乌江。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蒋党特务先走了一步，梁贻在五十兵工厂被逮捕。

在逮捕梁贻的同时，蒋党特务对散布在各工厂里的托派学生进行了大搜捕，杨寿元、张洪仁、任玉玺、杜文林、曹庆华等十多人

先后被捕。这些托派学生大都被送到巴县大兴厂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团级以下的部分干部也送到那里。

梁贻被捕后，在重庆兵工署督察处关押了一个月，逃出后去了云南。上世纪90年代看到他写的<回顾>，才知道了他逃跑的详细经过。

范文华、苏学常、王香臣、工人刘毅等人先后逃到贵州遵义。

李雨亭、郭桓参、刘恒新等逃离重庆，去了成都。

二十一兵工厂制图室的老工程师沈正功，大学毕业，机械专家，他同情工人，痛恨胡作非为的驻厂特务，知道特务要到工厂捕人，他马上通知王香臣走人，并脱下自己的西装给王香臣化装出走。

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给李雨亭的信中回忆说：那天他不在工厂里，没有捕到他，过了两天，王振华特地到他租住的地方。约定好第二天把他送到长江南岸弹子石织布厂，暂时躲避了些日子，以后跟一位工人老师傅去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做木模工。

一九四二年二月，蒋党特务又对重庆托派组织进行第二次破坏，逮捕了重庆托派另一主要领导人王振华。他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次搜捕后离开<益世报>社转移到华岩高等农校教书的。他的女友黎洁霜在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同时也被捕。

同一时期被捕的有电力公司工人刘振基和王坤荣，在南川飞机修配厂做杂务工的赵凤田（赵金声），他的被捕是因他身边有两本<列宁选集>引起驻厂特务注意而发生的。



经过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两次搜捕破坏后，重庆托派初期组织五个核心人员中的梁贻、王振华、刘振基三人被逮捕，张维良躲藏起来，替梁贻跑组织联络工作的范文华也受到通缉而不得不逃到贵州。核心人员中只有赵芳举一人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供职于电力公司。在他写的《夕阳忆语》中，没有记叙在两次大搜捕时期，他做了那些相应的对策活动。

我在重庆时与赵芳举始终没有见过面，我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后到重庆的。遭受蒋党特务两次搜捕破坏后，于一九四三年重新组建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领导核心中只有张维良是一位“老人”，其他都是托派学生。范文华和隗宽都曾与赵芳举联系过，希望他继续参与领导工作，他表示不干了。上世纪80年代，中共四川组织部门公布被蒋党特务杀害的王振华一家四口人的悲壮事迹，并追认王振华夫妇为革命烈士后，赵芳举根据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材料，结合他所知道的王振华情况，写了综合报导发表在《陈独秀研究动态》上，我才开始与他通信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看到梁贻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回顾》，梁贻写到：“文昇（赵芳举）经由王平一给他办了投降，保住了职业”（见《回顾》一03页），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赵芳举写封长信寄我，对梁贻的说法进行分析和辩驳。我曾将赵芳举的信念给郑超麟听，问如何回信。郑老说：梁贻已经去世了，无法由他本人来更正事实，赵芳举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说明，附在《回顾》后做为一个附录处理。我回信后，赵芳举始终未按郑老的要求写个简单的说明寄来。二〇〇五年五月，收到他那本在香港出版的

<夕阳忆语>，才知道赵芳举参加重庆托派组织活动，仅仅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事。他写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夕阳忆语>一一四页）或“一九四一年六月末”（<夕阳忆语>一七五页），他就被“倾轧排挤”出重庆托派组织而成了“编外人员”。一九四一年十月蒋党特务大搜捕前三个月，他就离开重庆托派组织。<工人呼声>的三个主要负责人，梁贻和王振华先后被捕，赵芳举不干了，未被捕。二〇〇四年十月，曹玉林编写<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夕阳忆语>，还不知道<夕阳忆语>中所说的那么多勾心斗角的复杂情况。至于“消极不干了”和“怕死不干了”的说法，我还是看了<夕阳忆语>才知道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逃到贵州避难的范文华、苏学常、刘毅、王香臣和他在贵州新婚的妻子杨大媛等五人回到重庆，找到了未被捕仍然坚持下来的单松岑、隗宽、刘志超、康至全、尹纯德以及被捕半年后释放的刘振基等，他们联系了托派“老人”张维良和同情者史逸民。范文华和隗宽先后去联系赵芳举，希望他参与领导工作，他表示不干了。

一九四三年恢复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首先打听、联系走散人员和被捕人员的下落和情况，继之，出了内部油印刊物<电光>，由范文华负责刻印。

一九四三年后，在成都也有好几个人在那里活动，他们是：考取四川大学的杨承志，在一家教会办的医院养肺病的王元勋，一九四一年十月遭蒋党特务破坏时从重庆逃到成都的李雨亭、郭桓参、

刘恒新等，赵凤田于一九四三年获释后也去了成都。他们几个人在四川大学贴出墙报，散发传单等活动。

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我和曹玉林、王春禄、刁长尧等到重庆时，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四川地委会已恢复得初具规模，主要成员是：范文华、隗宽、苏学常、刘毅、刘振基、刘志超，“老人”张维良作财务供应，不出面做具体工作，由刘志超与之联系。一九五四年法院判决书称张维良是：“渝地托匪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幕后指挥者”云云。我在重庆时，对于他们几个人的具体分工情况是不知道的，也不便多问，经常与我联系的是范文华和隗宽。

隗宽于一九四一年秋到重庆时，他找到了在济南读小学时的美术老师张宁宇，是位会绘画、会吹笙、会吹笛、会拉胡琴的人，在战地服务团的巡回演出队工作。经张宁宇的介绍，隗宽到中法大药房当职工站柜台。他与组织还没正式联系上，组织遭到破坏，他躲过了十月那次大搜捕。一九四三年组织恢复后，他离开中法大药房到南岸弹子石军政部纺织厂的附属碾米车间当磨工，这个碾米车间一方面碾米供应本厂职工食用还磨面粉主要供应纺织工业用。

另一个主要负责人范文华仍然脱职专门做组织联络工作，他住在两路口到菜园坝的复兴街，是一条沿着山坡盖的贫民区，很多房屋都是吊脚楼式竹木茅棚。范文华住的那间屋子我曾去看过，不远处就是个大粪坑。

我和曹毓林、刁长尧、王春禄等到重庆后，曹毓林住到范文华那里，帮助范文华编写和刻印《电光》。刁长尧由他的一位小同乡

介绍到中华书局做文书，王春禄考取邮电局在南岸邮局工作。我由我父亲的好友介绍到较场口社会部工人福利社管理文娱室。这个工人福利社是美国产联——劳联两个工会出钱委托国民党政府社会部代办的，表示它们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帮助国民党政府做点社会福利事业。文娱室里主要有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重庆全市各报社的报纸各两份，是附近市民的阅报室，还有象棋、围棋、扑克牌等，没有麻将牌，因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禁止打麻将赌钱。

一九四四年暑假，曹毓林考取了浙江大学，由于重庆组织工作需要，他休学一年，留在重庆协助范文华编写和刻印<电光>和传单。我曾陪同曹毓林到离市区二十多里路的沙坪坝散发过一次传单，那里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高职、中央剧专、美专等，还有几所中学。他做事老到，向墙上贴传单不是把浆糊刷在墙上，而是先把传单平铺在我的背上，用手把浆糊涂在传单上，让我后退，背紧靠上墙，趁无人注意，我们迅速离开，传单就被我用背挤贴在那里了。我们走进中央大学的学生分信室，他很熟敏地把宣传品投入有报刊的信箱里。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节过后，重庆发生了“胡世合事件”。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拜把兄弟田凯（田土兴）是军统特务，他们一伙人开的一家餐厅私搭电线偷电被人检举，重庆电力公司派用户股领班刘振基和电工胡世合等人前去查看，索赔罚款，特务恃势不认账，电工们按规定要剪断其供电线路，受到餐厅方面的阻拦，在混乱中，田凯开枪打死胡世合。震怒了电力公司及其三个发电厂的一千多职

工，数百工人手持工具到苍坪街（今邹容路），把餐厅门窗和厅内的物品统统砸掉。警察局长唐毅包庇田凯，指责工人聚众闹事，下令警察捉捕工人。刘振基和电力公司职工把胡世合的遗体安置在餐厅的正堂，从事件发生第二天的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初七）至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十）的三天里，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市民和各工厂送的挽联。《新华日报》全体职工也送了挽联：“特务横行何处去，自由光明几时来”。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米价不断暴涨，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工厂工人要求加工资和米贴，常遭受驻厂特务的镇压迫害，特务的横行霸道，积压在民众心头的不满和愤怒像一堆干柴，特务枪杀工人胡世合，又像是一根引火棒，重庆市全市工人酝酿着一场总罢工。市长贺耀组由于职务工作关系，常与中共人士和民主人士接触，思想不太顽固，头脑清醒，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二十三日（正月十一）向上汇报请示，蒋介石是个政治老手，立即做出“处决田凯，平息民愤”的决定。二十五日（正月十三）处决田凯后，重庆市政府也送了挽联。刘振基和电力公司职工在市民的支持下，把胡世合的遗体从餐厅移到通往朝天门的古刹长安寺内，设灵堂公祭三天，有数万人前往吊唁。

胡世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江津白沙镇大学先修班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从胡世合被杀害的二月十九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公祭结束的十天里，重庆的《新民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对事件的进展情况，都逐日报导。暑假我回到重庆后，才知道重庆托派组织积极参与了这一事件，范文华和曹毓林多次到现场与刘振基联系，瞭

解情况，编印隗宽写的传单，刘志超及时散发，把反对偷电的斗争引向反特斗争，起了重要酵母作用。刘振基是重庆托派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始终处于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上。

为形势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处决田凯，特务的拜把兄弟们，兔死狐悲，无可奈何。整整过了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重庆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里，特务杨进兴（绰号猩猩）枪杀托派王振华一家四口，连一个两岁和一个一岁不到的两名幼儿（被难友称为“狱中之花”）也不放过，残忍凶狠，为其拜把兄弟报仇泄恨！（杨进兴于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五八年处决）。

一九四三年恢复起来的重庆托派组织调整了部署，坚持城市产业工人工作之外，为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作准备，部分人员考进高等院校。杨承志四川大学，刘恒新武汉大学，张圣时和熊安东中央大学，尹纯德和牟家义西南联大，张洪仁东北大学，曹毓林浙江大学，杨寿元山东大学，杜文林复旦大学，王香臣重庆教育学院。以上九所高等院校，除四川大学和重庆教育学院，其他高校于一九四六年复员，分别迁回到南京、上海、北平、杭州、沈阳和青岛。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们分别参加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手里都握住枪杆子的国共两党和平建国谈判开场。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也影响到中央大学的校园里，我旋进了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另一章节讲）。寒假我回到市区，见到了范文华、隗宽和苏学常，

从他们那里知道，张维良已与上海托派中央联系上了，上海托派中央分裂成了两个派别，先收到少数派意因（郑超麟）的亲笔信，问重庆组织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又收多数派欧伯（彭述之）的亲笔信，也是问重庆组织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隗宽执笔回信：四川组织不分派别，希望知道上海中央两派的政治思想主张。分别收到了上海两派的机关刊物《新旗》与《青年与妇女》（后改称《新声》），仅从两份刊物上看不出分裂成两个派别的原因。当时，四川的一批托派学生都很敬仰上海的几位托派老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直接领导。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大学提前停课放假，准备六月复员南京。离开重庆前，我到市区，只见到隗宽一人，苏学常、范文华和刘毅三个人都已去上海。苏学常有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大哥，上海邮政局工人，苏学常由大哥抚养长大，他一定要去看望大哥。范文华是想亲自瞭解上海托派中央为啥要分成两派。刘毅想回徐州老家看看，与范文华同行。他们三人都是四川地委会的主要成员，隗宽不同意他们三个人一齐离开，特别对范文华说：你到上海，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用四川组织的名义。他们三个到上海后，苏学常与刘毅就被多数派“争取”，范文华被少数派“争取”。人容易受宗派观念支配，参加了多数派的说多数派好，参加了少数派的说少数派好，重庆的隗宽还是不能明白上海分裂成两派的原因。叫我复员南京后，一定要到上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写信告诉他。

与隗宽同在南岸碾米车间的李绩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后，到化龙

桥一家工厂当技工，在那里影响发展了一个姓刘的和一個姓田的技工，姓刘的认识了豫丰纱厂一个姓高的女工，隗宽定时去同他们联系。姓高的女工是四川人，原来在成都读中学，初三时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在学生中被视为新派人物。校长要她们解散读书会，要她们不要读进步文艺书，她反驳了几句，要求校长讲明白为什么不准成立读书会，为什么不准看进步文艺书？她闯祸了！学生竟敢反驳校长！有损师道尊严，勒令退学。她幼年时，父母包办婚姻，给她与一个粮绅的儿子定了婚约。读中学后，为这婚约她常同父母争吵。父亲威胁她，只供她哥哥和弟弟念书，不再供她念书。学校不要她了，她决定离家出走。她读过高尔基的书，她要学高尔基那样地到社会上去闯。她给《新华日报》社写信，诉说自己的遭遇，想到延安去学习，她没有得到《新华日报》社的回信，那时正是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反共喧嚣时。在几个要好的同学资助下，她到了重庆，考进了豫丰纱厂当工人。在厂里她看到了些支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呼吁工人组织起来的传单，知道这些传单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散发的，她以为找到共产党了。她向隗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宣传要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呢？隗宽回答她：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明的。先要懂得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还要知道中国革命史，这个问题就会自然弄明白。她表示愿意读到这些方面的书，隗宽首先介绍她读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隗宽认为她对理论问题的理解能力很强。



隗宽告诉我，李绩等人都是参加朱学范“劳动协会”的会员，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型的青年工人，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倾向共产党的，李绩因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引起怀疑和失望，接受了托派思想影响。朱学范是当时一位有名的社会活动人士，他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重庆的“工人之家”是他开办的，从事工人福利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王坤荣也是“劳动协会”会员。隗宽没有向我提到王坤荣的名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新蜀报》上有隗宽以记者身份写的“王坤荣小传”，从这一小传的文字中，我推断王坤荣和李绩是同一时期接受托派思想影响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随校复员南京后，七月到了上海，住苏学常大哥苏学志的家中。苏大哥是位善良敦厚的老邮政工人，基本是文盲，一辈子就是在火车站接送邮件。我们从四川回来的托派学生就把他的家当成了联络站。因此，共产党说他被托派利用了，始终没有给他升级，他也不在乎。我被关管二十七年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看望他，他说：“你们是托拉机派还是托拉斯派，我也不明白”！他对我们这些人的遭遇不胜叹息。

苏学常和刘毅参加了彭述之的多数派，范文华参加了郑超麟的少数派，他们三人在苏大哥家常争论不休。我请他们把一九四一年发生争论导致分裂的文件要来给我看。冒着酷暑，我在苏大哥家的阁楼上，整整一个星期看完了《校内生活》。

上海的几位托派老人——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等，我虽未

与三位见过面，但早已读他们写的文章和翻译的书，思想受他们启蒙，视他们为老前辈，尊重敬仰。《校内生活》中，他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中日战争性质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中日战争性质问题实际是探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校内生活》看完后，感到困惑不解，我总觉得争论的双方是在打抽象概念仗，同时夹杂些人身攻击。作为晚辈，我不好理解。想不到事隔整整四十年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几位老人还在争吵打架，我感到无奈！

一九四七年暑假过后，范文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把他妻子和儿子从种的几亩棉花地里拾的棉花卖掉当盘缠回到南京，乘民生公司江轮去四川，他想去争取些人参加少数派。唐宝林《中国托派史》377页“附录”《电光》上“艾夫”即范文华，他争取了那几个人，我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春节我来上海时，刘毅告诉我，隗宽已表示参加多数派。彭述之召开建党会时，刘毅代表隗宽出席，彭述之打算把隗宽调上海工作。建党会后，割断了我与隗宽横的关系，由刘毅代表中央与他联系，一九五〇年刘毅去香港后，大概一直联系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为止。

四川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的，解放前后，重庆的托派组织活动情况，刘志超于一九九四年给李雨亭的信中说托派组织与中共地下组织是联合行动对敌斗争的。如何联合行动？根据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对反革命犯张维良的判决”书中，有一段反说

的文字记述：“临解放时与隗匪宽等积极策谋应变计划，伪装积极，争取群众，假借护厂为名，欺骗工人，组织工人，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如何“策谋应变计划”的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四川《新蜀报》上有隗宽以记者名义写的被蒋党杀害的赵金声（小传），其中一段文字：“他曾组织‘劳动者社’，主编‘劳动者’，为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去年底筹组‘重庆工人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工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保护机器’的宣传和鼓动，以迄被蒋党西南公署第二处逮捕为止。”在为被杀害的王坤荣《小传》中，隗宽写道：“王君为扩大无产阶级的团结，去年冬季组‘重庆三八联合会’，创办‘工联报’，展开讨论工人如何‘应变’和‘保护工厂’‘保护机器’的问题，不幸于六月间第二次被捕……”

隗宽以记者身份只能把托派组织的“应变计划”写成个人的主张和行为加以宣传报导。

人民解放军攻克重庆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党特务在歌乐山下，对三百多名中共人士和其他革命人士进行了大屠杀。托派领导人王振华夫妇及两个幼儿，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杀害，是蒋党特务杀害政治犯暴行之最。同时遇害的还有托派工人王坤荣和托派学生赵金生。

苏学常于一九四六年离开重庆到上海，参加了彭述之的多数派，一九四八年彭述之建党后，苏学常改名苏涛，奉派去台湾开拓托派

组织活动，一九五〇年被蒋党逮捕，判处无期徒刑。

范文华于一九四六年离开重庆去上海，参加了郑超麟的少数派，后回四川又去北方活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网打尽”，在山东被捕，判处无期徒刑，疯瘫于劳改农场。

张维良的判决书上，定性为“渝地托派组织的幕后首领和指挥者”，判刑十二年，押送西昌以西某矿山劳改工地，死于工地。四十年后，他的儿子曾去工地查找，档案材料中只查询到姓名，遗骨遗物无处寻觅。

隗宽被定性为“渝地托匪首要分子”。与他同时被捕的刘志超和康至全等人回忆说，隗宽在看守所里给其他犯人教唱革命歌曲，由此说明隗宽在狱中的心情和生活态度都达观，不消沉。曾在松山劳改农场劳改。上世纪90年代，他的侄儿从济南给我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之前，家人曾知道他关押在重庆，曾寄去衣物，一九六二年后，音信全无。

关于赵芳举，我还要多讲几句。重庆托派组织从一九三九年底算起，到一九五二年底为止，共存在过十三年整。赵芳举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组织核心小组中干过半年，负责<工人呼声>的刻印工作，他的字迹工整。一九四一年十月，组织遭蒋党特务第一次破坏前，他不干了。在蒋党政权下，他未受逮捕之苦，但在中共政权下，他未躲过“一网打尽”之劫，幸好他有不干了的的历史，只网了一下，经年余的“学习教育”，无罪释放。一个不干托派的托派，又不是右派的右派，在无情的历史浪涛中苦挣扎了二十多年，晚年把

“我的托派生涯”写成<夕阳忆语>一书，文如其人，从<夕阳忆语>看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几分像鲁迅笔下的阿Q，又有几分像鲁迅笔下介绍浙江地方戏中的二丑。

我还要写一写闫子桂和梁贻的下落，做为记叙重庆托派组织始末的结束语。

闫子桂是三十多名到重庆进工厂当工人的托派学生的启蒙老师，一九四一年十月，重庆托派组织遭蒋党特务破坏后，他离开重庆去西安军校执教，他的学生们很不理解，认为避难也不应去蒋党军校执教，一九四六年，曹玉林随校复员路经西安时，曾当面向他讲述学生们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去美国攻读经济学，以后流落海外。上世纪80年代初，从梁贻那里闻知闫子桂晚年困居台湾，受当局监视。

梁贻，是托派学生进工厂当工人的组织者，一九四一年十月被蒋党特务逮捕，逃脱后远去云南西双版纳与老挝交界的勐腊，呆到抗战结束，回到上海，参加郑超麟和王凡西的少数派，自称“做一粒铺路的石子”，上世纪80年代末，因车祸死于香港。

##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

王振华又名王叔本（树本），东北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北京大学读经济系，在反日反国民党的左倾学生运动中，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捕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陷于散漫分裂状态，三次组成临委会又三次遭破坏。一九三四年六月，四个北平激进托派学生到了上海，他们是斯朝生、刘家良、王叔本、扈文章、他们推开“老人”陈其昌、尹宽，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又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以示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而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三月，斯、刘、王、扈被逮捕，判刑后关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刘七年，其余三人各五年。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他们与其他政治犯同时提前释放，扈文章去了东北，斯朝生去了武汉，刘家良和王振华回到上海后，王振华去了香港，他们俩人分别在沪港两地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一九四〇年，沪港两地因对组织原则发生意见分歧，王振华回沪与<斗争>编委（编委代行中共同盟中央职位）彭述之、陈其昌、王文元、刘家良、楼国华、郑超麟等人争论，一时争论不出结果。久住，王振华生活无法解决，因为编委们都是靠卖稿维持个人生活。王振华要求组织给他买张船票回香港，编委们没人答理。因此，他向蒋振东讲：特务盯上他，与特务周旋甩不掉。<斗争>编委们恐惶起来，令蒋振东速买张船票给他送去，他又向蒋

振东讲了实话。《斗争》编委们很气愤，一致认为王振华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决定开除。上世纪80年代，郑超麟向我讲述这段故事时，曾表示说：当时做出开除的决定是有点过分了。同时也告诉我，当时王振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是倾向陈独秀的观点，而《斗争》编委们没有人同意陈独秀的观点。

王振华回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广西，暂住女友黎洁霜家。一九四一年初，王振华到了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由大学时的同学介绍到《益世报》做校对工作，解决了生活问题。同时与已在重庆开展托派组织活动的梁贻接上了头，梁贻为筹划出一份宣传刊物《工人呼声》，正愁着缺一位有理论功底、有写作水平的人手，王振华正是他需要的人，在北平时，梁贻就同王振华相识，且知王振华的组织活动能力强，立即拉王振华负责主编《工人呼声》，同时把在21兵工厂当工人的十多名托派学生交王振华去联系。

王振华接手主编《工人呼声》后，除了宣传陈独秀的十项抗战主张，加大了对蒋党政府的批评力度，批判蒋党政府对日消极应战错误政策，反对蒋党借口抗战任意剥削工人，使之不能维持最低的悲惨生活。

王振华勤于到各工厂去联系做工的托派学生们。曾在21兵工厂做工的孟宪章，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写的信中回忆说：“王振华定时到21兵工厂来，给我讲革命理论，布置工作，……多数是在临江门对面嘉陵江的沙滩上，边走边谈。”“有一次天黑了，王振华就在陈家馆街我租的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机放在我的住处。”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重庆地区托派初期组织最活跃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夏，国立六中托派思想的学生，先后分三批到重庆进入工厂当工人，共约三十多人。都是为了信仰，为了真理而走向社会实践的孟浪青年人，活动热情有余，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王振华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后来抗战的大后方，遇到这么一群有思想有抱负青年，精神为之一振，何尝不想好好干一番事业。一九四一年初，他刚到重庆时，梁贻尚不知他被上海托派中央开除的事就把他拉进自己的组织中，而他又无法向梁贻说明被开除的底细。大约五月间，梁贻得到沪港方面的通知，梁贻既要听托派中央的，又无法一下子把王振华推出去，同时，对这群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也失去了掌控信心，从他写的<回顾>中可知他感到组织危机，打算离开重庆。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蒋党特务对重庆托派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大搜捕，在五十兵工厂的梁贻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十多名托派学生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没有被捕，一九四四年四月，孟宪章的信上回忆：那天他不在工厂里，没有捕到他，过了两天，王振华特地到他住的地方通知他，次日把他送到长江南岸弹子石织布厂暂住，以后跟一位工人老师傅去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当木模工。

第一次大搜捕后，王振华离开<益世报>社转到华岩高级农校教书。一九四二年二月，蒋党特务又对重庆托派组织进行了第二次搜捕，王振华在华岩农校被捕，他的女友黎洁霜在江津白沙镇国



立女子师范被捕。同一时期被捕的有电力公司的刘振基和王坤荣，南川飞机修配厂的赵凤田（赵金生）。

一九四三年，王振华和黎洁霜由重庆押到贵州息烽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监禁。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和新四军被俘军长叶挺等人都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抗战结束后，息烽集中营撤销，王振华又被押回重庆关押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与黎洁霜结婚。

一九四七年黎洁霜生下一子，取名王小华。

一九四九年初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幼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山城重庆，蒋党特务在磁器口集中营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王振华一家四口全被杀害，连两岁的王小华和一岁不到的王幼华也不放过！同时遇难的还有王坤荣和赵金生。月底，重庆解放后，托派王振华一家四口悲壮牺牲的事迹，被幸存的难友们纷纷传遍山城。

重庆托派组织的领导人隗宽和刘志超、李绩到磁器口查找王振华等人的遗体，隗宽写了王振华、黎洁霜、王坤荣和赵金生四烈士的小传，刊登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新蜀报》上。一九四九年底，重庆地区政府在大同路小学展出王振华、黎洁霜和他们的两个幼儿一家四口被杀害的事迹，作为对蒋党残酷的典型来宣传、控诉。一九五〇年初，隗宽和李绩专程到南温泉访问在那里疗养的罗广斌，他与王振华曾同时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罗广斌详细谈了王振华在狱中的情况，称赞王振华意志坚定。

<红岩>有江姐抱起“狱中之花”的一段描写，说明罗广斌在创作他的革命典型人物时，他的意识中没有忘记王振华、黎洁霜的事迹，反托宣传使他不能讲出“监狱之花”的父母是谁。

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口人虽被敌人杀害，但在烈士总名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一一、二七”大屠杀 <被害人登记表>注明：“王振华、黎洁霜，托派，不列名”。

他们终因托派而不列名，长眠于歌乐山下。

反托宣传，或反托运动，不是国产，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进口货，它影响我国政治生活半个世纪之久。因为王振华、黎洁霜是托派，他们牺牲时的英勇悲壮的事迹，被反托的历史尘埃埋没了三十多年。

直到上世纪8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的精神，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了“一一、二七”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三百多名政治犯中尚未被承认为烈士的九十多名政治犯的事迹，复查结果，这九十多名政治犯中有六十多人被追认为烈士，其中有王振华和黎洁霜。

其实，王振华和黎洁霜的事迹无须复查，早在三十三年前，重庆一解放，那些幸存的难友们就已传播他们英勇的事迹。王振华一家四口遭灭门杀害的事迹是悲壮感人的，而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俩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是意志坚定的，更使幸存难友们感动不忘。从“托派，不列名”到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历史性的一大进步。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国有四家报纸分头报导了王振华、黎洁霜的事迹：八月十三日 <光明日报>，八月十六日 <文汇报>，八月二十八日 <四川日报>，八月三十一日 <重庆日报>。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上海 <文汇报>

<‘监狱之花’的托派父母>一文的摘要如下：

（黎洁霜）“的同狱难友任××同志回忆道：‘黎洁霜没有乳汁就舂米羹，以仅有的一点简单坎具为狱中受刑的、生病的难友服务。车跃先同志牺牲前管图书馆时补破旧书用的浆糊，也是她夫妇搞的。白公馆为抗议十月二十八日在大坪公开枪杀同志，绝食两天，她夫妇断了火种，娃娃饿得大哭’。”

“国民党特务对王振华的经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曾要求他配合反共，但是，王振华坚决拒绝了。”

“据韩子栋同志回忆：王振华对我们同志的忠贞不渝表示出敬佩同情。”

“王振华的同狱难友毛××同志回忆说：王振华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十月一日成立，<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他曾跑到窗口悄悄向罗广斌、陈然他们，告诉了这个喜讯。”

“从难友们的回忆材料和刽子手杨进兴（绰号猩猩）的交待材料看，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大屠杀开始，白公馆楼上的难友被屠杀后，从楼下最先押出的是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妇俩都铐上手铐，一人抱一个孩子。王振华身体非常虚弱，但是还是尽量挺起胸，抱好小华向前走，脸上毫无惧色。黎

洁霜身体极度虚弱，吃力地抱着不满周岁的‘狱中之花’幼华，跟在丈夫身后。”“当他们经过四号、三号牢房时，难友们清楚地看见黎洁霜脸上没有一滴眼泪，神态异常严峻，象一座晶莹的大理石雕象。”“他们夫妇俩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用目光向拥在铁窗前的难友告别。”

“两岁的小华，看见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吓得大哭起来，他尖声呼叫：妈妈，我怕，我怕！”

“黎洁霜回头对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杨进兴瞪着血红的眼睛，大声吼道：把孩子一齐打，斩草除根。”“王振华……对黎洁霜喝道：一起就一齐，你同这群狗们讲什么！”

“枪声响了，全家四口一齐倒在血泊里！”

一九八四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下两册），在上册中有一篇：《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王振华、黎洁霜》。

摘要如下：[ ]号内是我写的按语。

“九、一八事变后……年青的王振华，眼看着故乡被敌人占领，只好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仇恨，胸中燃烧着抗日救国的怒火”。

“一九三四年，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的北大学生联合会中有喊着抗

日口号、打着革命招牌、装得十分激进的托派学生。由于王振华年轻幼稚，思想偏激，不识托派的真面目，被介绍参加了托派，误入歧途。”[一九八四年，写这番反托套话，不足为奇，是以 <毛选> 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页那个对托派定性的注为基调的]……“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抗日有罪，他被北大开除了学籍。此后他又转到了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触怒了反动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他到上海积极参与了托派组织，他参与了把陈独秀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党，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他才被释放出来，在上海从事托派的组织工作。由于他公开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在政治上背离了托派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纲领，与托派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被勒令离开上海，出走香港。”[这番反托套话，是依据 <毛选> 第一版第一卷一六八页那条给托派定性为汉奸反革命的注为基调的]……“不久，他和黎洁霜一道到了广西梧州，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只身到重庆……参与和领导重庆的托派组织四川地委会的工作，负责编辑油印的内部刊物 <工人呼声> 报。这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托派思想体系，但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坚决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和揭露国民党的腐化与无能。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欢迎。上海的托派中央对王振华恨之入骨，立即解除了他

在重庆托派地委会中的职务”。[最后两句是反托谎言加反托呓语]

“他再次受到打击后，写了〈我们组织工作应有的方向〉和〈我们的任务提纲〉两文，……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国民党随时都有妥协投降的时候……也只有我们在各工厂内能够发动改良生活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斗争及暴露国民党腐化与无能’，并指出我们‘和国民党统治是不可调和的’‘转变国民党的（消极）应战为民众革命抗战’，‘中国的主要敌人，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战争中我们要尽一切方法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精神表明，他在思想上基本已脱离了托派的思想体系。”[这一大段文章是以中国共产党抗日、中国托派破坏抗日为基调，企图改造王振华的面目。王振华主张抗日，‘在政治上背离了托派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纲领’，‘因此被托派中央开除，他仍然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基本已脱离了托派的思想体系。因此被托派中央‘恨之入骨’、‘解除他在重庆地委会的职务’‘他再次受到打击’云云。

一九九一年，〈毛选〉第二版修改了〈毛选〉第一版对托派的定性。〈毛选〉第一版的定性是：‘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从事各种有利日本侵略的活动’（〈毛选〉第一卷一六八页）。〈毛选〉第二版的定性是：‘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错误论断而造成的’（〈毛选〉第二版第一卷二七〇页和第二卷五一六页）。一九八四年，引用王振华主编的〈工人呼声〉上发表的抗

战言论，从一九九一年 <毛选> 第二版对托派定性看，恰恰说明了重庆托派组织活动真象：‘只有我们在各工厂内能够发动改良生活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斗争及暴露国民党腐化与无能’。]

“他办的 <工人呼声> 报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一九四二年二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为重犯，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关于黎洁霜，<一对宁死不屈的夫妇> 有如下的记叙：“黎洁霜，原名黎琦清，祖籍广西苍梧，父亲黎庆裕，清末梧州经商，家业富厚。黎洁霜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生在梧州。父亲早死，由母亲黄衍文将兄弟姐妹数人抚养长大。”“黎琦清少年时代就同情封建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对家中婢女不但平等相待，而且很尊重。一九三二年，她从广西省梧州女中附小升入女中，后转学到梧州一中读书。她文静持重，学习勤奋，语文很好，深得老师喜爱。她从初中起，一直订阅<中学生>杂志，从中学习到不少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她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深怀不满，逐步树立起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解放自立的思想。”……“黎洁清初中毕业后，于一九三六年春到南宁集训，夏天，她参加了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在学生军中，她追求进步，不倦地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苏联文学，扩大了视野。”……“黎琦清从广西学生军复员后，升入广西大学附中读高中，受进步同学影响，参加了广西大学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她常和一些进步同学一起，热烈探讨抗日救亡，争取中国

革命胜利等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就在学校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一反过去文静持重的性格，成了广西大学附中女生中活跃分子之一。虽然她才十七岁，才华出众，能歌善舞，喜欢演剧。梧州爱国话剧社每次演出，都邀广西大学学生会出节目，黎琦清常去参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黎琦清的胞兄黎超贤是中山大学学生，广州沦陷后，他与中山大学教授高承元等人先后来到梧州。”……“以后，他们去香港筹办日报，黎琦清随他们前往。去港后，黎琦清发现高承元等人只是口头抗日，不作实际抗日工作，就离开了他们，自己停留香港，继续寻求抗日救国门径。她在留港期间，与正在香港宣传抗日的王振华相识。” [没有记叙黎琦清在留港期间，进工厂做工，并参加了托派组织活动的事迹] “她仰慕王振华抗日坚决，学识渊博，才华洋溢，品格纯朴，就发生了爱慕之情，和王振华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结伴回到广西梧州家里。……不久，王振华赴重庆。……为了大学深造，赵重庆和王振华相会，黎琦清改名黎洁霜，一九四一年秋以广州私立南京中学文凭考入重庆（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

“王振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敌人立即搜查其住处，发现了黎洁霜写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这时，黎洁霜也在打听王振华被捕后的下落，准备去探亲。结果，反动派把她也抓起来。她被捕，想尽快与王振华见面，就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以后，她同王振华一起被押解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集中营的敌人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想软化拉拢他们……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

“敌人用尽了各种威胁和利诱手段，都无法使王振华、黎洁霜屈服，只好无可奈何地以精神折磨来惩罚他们。他俩同关在一个监狱，虽然近在咫尺，却长期不让他们见面，妄想动摇他们的意志，从精神上拖垮他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撤销了（贵州）息烽集中营。但是敌人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并没有被释放。王振华、黎洁霜等人，被转押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在王振华、黎洁霜一再抗议和难友们的呼吁下，敌人把他们同关在白公馆楼下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里。他们终于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婚礼。”

“一九四七年，黎洁霜生了第一个儿子取名为王小华。由于狱中生活艰苦，黎洁霜同其他难友们一样，伙食没有营养，吃的是有霉味的‘平价米’，菜又没有油水，常常是白水煮豆芽，生活很凄苦，还要给孩子喂奶。她身体极度虚弱，脸色苍白。……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企图以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但当场遭到了黎洁霜的拒绝，王振华称赞妻子有骨气。”……

“他们夫妻俩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以外，还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为抗议敌人在大坪公开杀害许建业等革命同志的绝食斗争。当年的难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参加绝

食斗争时，全家灭掉火种两天，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的情景。”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当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震撼山城，美蒋反动派即将最后崩溃的时候，盘踞在‘中美合作所’的国民党的特务们，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对（三百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集体大屠杀。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妻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着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铁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难友们看不出他们夫妇俩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神态严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地向难友们告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小孩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妈妈，我怕！’黎洁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夫妇俩身上的两个儿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和惊叫声，……她转过身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

杨进兴……大声吼：“把孩子一齐打，斩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

“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的眼前把孩残杀了。”

“黎洁霜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王振华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定势，想像一九四九年的王振华，应该是“大义凛然地高呼”这两个口号才能算得上是革命烈士。可是，当时幸存的难友们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两个口号，<红岩> 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也只是说王振华意志坚定，没有提到这两个口号]。

在 <光明日报> 、 <文汇报> 、 <四川日报> 和 <重庆日报>，四篇报导文章的煞尾都同样加上一段喊两个口号的“特写”。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重庆日报> 的报导中最后的“特写”是：“他被捕前两年还是托派思想……尤其最近一年，他已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接受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一一、二七临刑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可以证明，长眠歌乐山下的王振华不会改变他对马恩列托共产主义的坚强信仰，而去接受无何有之乡的“真正的共产主义”！

## 蓦然回首大学时光

熊安东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重庆考取中央大学历史系，中央大学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南京搬迁到重庆的，校本部在距市区三十多里的沙坪坝，分校在距沙坪坝二十多里的柏溪，两地都濒临嘉陵江。

一九四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年，四月苏军和美军相继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欧战收场。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军尚占据半个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区。在太平洋各岛上，美军和日军进行着猛烈惨酷的争夺战，美军猛攻，日军死守。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迅速消灭了日本劲旅关东军，十四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投降，美苏中英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艰苦的八年抗战结束。

手里都握着抢杆子的国共两党分别向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调兵遣将，国民党说是收复失地，共产党说是扩大解放区。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利益，曾企图“调处”国共两党关系，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于八月二十七日飞到延安，二十八日陪同毛泽东飞到重庆，于是国共两党进行了四十三天谈判，签订了一份《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谈判环绕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各说各的，讨价还价。中共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双方约定谈而未决的问题，留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继续磋商。

毛泽东到重庆后，同蒋介石合拍了一张并肩而立的全身照。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到沙坪坝看望老朋友柳亚子和中央大学教授吕组湘。应柳亚子索句，毛泽东抄录旧作《沁园春·雪》奉赠。词的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步韵和词，下阕未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史实札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一百五十万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令八路军、新四军大反攻，控制日伪占领区。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制止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

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中苏共管中长铁路三十年，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不予理睬。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莫斯科三封电报，再三劝说毛泽东必须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飞到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国共两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

——摘自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21 时中央台纪实频道。

由此可知，重庆谈判是美苏幕后牵线的皮影戏。

日本投降后，川江上的船舶都被国民党政府征调，抢运军粮和军用物资。战时移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学校，拿不到运输工具，无法复员，被迫滞留云贵川一年。九月，中央大学仍在重庆开学上课。

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打口水仗。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地区冲突越来越频繁，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统治区民众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高涨，学校里的自由、民主气氛浓厚，各种社团办的墙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张锡缙是我在国立六中四分校读初中时的同学，那时我们一群小伙伴曾在一块读进步书刊，办过壁报。张锡缙是我们之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一九四〇年读初三时他同其他几个人受到警告，被迫离校。分手时，他知道我正在读马列原著，那时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书。分手后，听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帮他转到其他学校读高中，学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因此失去了联系。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大学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们仍然是孟浪少年时的感情相处。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都壮大了，并且正在同国民党谈判和平建国问题，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信仰更成熟了。他崇信苏联和苏联的宣传，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大学一年级时，他不知道我信仰了托洛茨基，但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中，他同我有共同的语言。

《海涛》是众多壁报中编排不错的墙报，是张纯文艺性质言情的墙报，在介绍臧克家诗的一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臧克家的诗句：“开在你腮边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间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从里边我捞到了失去的青春/爱情总伴着恨/时间会暗中偷换了人心/我要放出感情的野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这段诗句引起我对臧克家的兴趣，想找臧克家的诗集，知道张锡缙喜欢新诗，他也能写新诗，我向他讲《海涛》上这篇文章，没想到他告诉我，《海涛》是他和几位朋友办的，他约我写稿，我就写了一篇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书评给他，《海涛》采用了。他带我到他们编写《海涛》的地方去，在那里我认识了赵宏才等人，知道赵宏才是《海涛》主编。听张锡缙讲，赵宏才曾在西安一家报社编辑过文艺副刊。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校舍建造在一条山沟的两面山坡上，学校周围是茂密的竹林，一家农户在竹林深处盖了几间简陋的竹木结构草顶房，在那里磨制豆腐供应学校食堂，有豆渣又有食堂的泔水，还养了几口猪。《海涛》就在那里租了一间草房，屋里放一张竹制桌，桌上撒放着几本文艺刊物和准备编写壁报的稿件和纸张。我立即意识到他们几个人肯定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一个社团，办一份纯文学言情性质的墙报作掩护，争取公开存在的一个活动空间。后来知道，那时已在中央大学组建了新青社（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的地下青年组织）。张锡缙没有盲然把我拉进海涛社，他介绍我去参加政治系学生杜一飞发起组织的追求社，说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社团。

追求社办的壁报刊名《追求》，它的头一期我浏览过，是版面整洁又誊写得漂亮的一张墙报，内容有散文、诗歌、读书心得、时事评论等。在刊头下面标注办社宗旨：“追求友谊，追求进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这样亮出办社宗旨，我一看就断定办社的人不是三青团的，三青团拥有权势就拥有了一切，他们不会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这类字汇；也断定他们不是新青社的，新青社的人当然认为进步和真理在他们手中，他们不会挂出这些字汇暴露自己。

我参加时，追求社已是二十多人的社团。杜一飞是召集员（不称社长），历

史系的李炳均是组织员，外文系的李平济是宣传员。二十多名社员来自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教育系、艺术系、政治系、社会系等八个系。原来是群互不相识的男女大学生，被四个“追求”吸引在一块，亲如兄弟姐妹，真是不亦乐乎。现在还记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杜一飞、李炳均、李平济、王纪志、罗成义、叶公亮、李方、李芳、曹先志、曹惠白、胡润如、乔象钟、谷风、袁家祺、张君若、杭英、张维明、高兴农、程纪平、戴伯宏、柏兴翰等。

杜一飞是个凭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活动的广东人，他的活动能量大，交际广泛，能应对各色人物。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大操场西北角弄到一间小屋，弄来一张长方型桌，几条凳子，小屋成了《追求》社员的活动室。星期日，我们大都聚拢在小屋里围桌而坐，读书看报，编写《追求》，开读书讨论会，时事座谈会等等。

读书讨论会上曾讨论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讨论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等。时事座谈会上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四十多天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和谈些什么，报纸上无所披露，我们就根据一些流传的小道新闻漫谈，总的印象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在那里划地盘，争夺势力范围和分配政府委员名额。

十月间，杜一飞和李平济从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借来世界名曲唱片和留声机，以追求社的名义在柏溪分校举办一次世界名曲欣赏晚会，丰富了一年级八百多同学的精神生活，追求社获得好评和好名声。接着又从中苏文化协会借来图片，举办一次苏联图片展览，我第一次看到大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照片，那时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完全是靠畜力和人工操作。

### 云南昆明“一二·一”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搬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一直保持着北大的自由民主传统精神。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的红人，又是蒋介石的连襟，炙手可热，抗战期间，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一九四三年，西南联大学生曾发起反孔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反孔运动实际是发泄不满情绪，反对腐败而又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

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国共谈判，昆明争取和平、民主的浪潮首先高涨起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举办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冲击破坏，二十六日，联大、云大等校罢课，二十九日全市学生五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冲进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对着集会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开枪，**投手榴弹，死四人，重伤六十多人。**“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首先封锁消息，报纸不得报导，像《新华日报》有所报导，也开了“天窗”（报纸清样送检，被检查官划掉的字句，纸版上就挖掉，印出的报纸，有许多空白地方，戏称“天窗”，是国民党控制新闻自由而造成的丑陋景观）。

《追求》社获得西南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油印小册子《匕首》详细记叙了“一二·一”惨案真象，我们全文抄录出了一期《追求》特刊。观看的同学络绎不绝，议论纷纷，用各种方式声援昆明学生，有人提议罢课示威。训导长把杜一飞召唤去，受到训斥：“你们好大的胆子，把墙报撕掉！”追求社员表示不予理睬。接着，学校布告栏贴出一张训导处的布告，大意是：奉教育部训令，学生结组社团必须登记，墙报稿件必须送训导处审查等语。“登记”，“审查”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追求社和我所知道的几个社团，都表示拒绝登记和审查，与训导处的通告形成了

僵持局面。这已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一月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中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权。青年人的思想反应快，我注意到贴在布告栏里的那张通告上不知被谁划上了一个很大的“×”。

### “一·二五”请愿游行示威活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发布停战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现在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开到一月三十一日结束。据史料记载，当时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八人（国民党八、共产党七、民主同盟九、青年党五，无党派人士九）。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许下四项诺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权。

国共两党四十三天的谈判，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又一再修改的提案，把问题推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谈解决。协商会议桌上，国民党方面占不到绝对优势，只有青年党站在国民党一边。国民党反共派就企图利用中央大学三青团发动学生游行干扰和分散会议进程，结果引发了中央大学中进步力量与三青团势力的一场较量。当时中央大学学生会有双重机构：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是由各系科按规定的人数比例产生代表组成，它是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罢课、游行以及各种公共事件表态，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做出决定。而学生自治会是执行系科代表决定的机构。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主席）是通过竞选由全校学生投票产生，候选人须先组成十人的理事会参加竞选。一般只有两个竞选人竞选，他们分别代表学生中的两种政治思想倾向，有点像美国总统选举。我不知道中央大学学生会这两套选举制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只知道这两套选举办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后截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刚刚选举换届的系科代表大会，进步思想倾向的代表占多数，但尚未换届的学生自治会掌握在三青团手中，要发动游行必须由系科代表大会开会讨论和做出决定才行。系科代表大会上代表经过认真激烈的争辩、磨合，决定游行请愿，制定了“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总口号，通过了向政协提交的七项要求和游行时用的二十多条标语口号。七项要求是：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党派私见；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③国民大会代表必须合理产生；④严格执行停战命令，永远停止内战；⑤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⑥党派一律退出学校，实行讲学自由；⑦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成功之前不许闭幕。二十多条口号有：①任何党派不许拥有军队；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③要求国内团结、统一、和平、民主；④彻底执行停战令；⑤学校讲学自由；⑥一切党派退出学校；⑦立刻严惩汉奸；⑧双方释放政治犯；⑨严惩贪污；⑩反对官僚资本；⑪经济民主化；⑫我们要变不要乱；⑬拥护蒋主席和平建国；⑭彻底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⑮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等。系科代表们经过争辩、磨合，制定的要求和标语口号，使得三青团方面也无法反对。系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临时决定，成立十九人组成游行委员会主持这次游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中央工职、戏专、音专等十多所院校一万多学生和几十位教授步行三十多里到市区游行请愿，中大吴有训校长和重庆大学马寅初教授也都参加了游行。一路上贴标语、喊口号。

“国民政府”的墙上也贴满了要求和平民主的标语，这是抗战八年期间向未有过的事情，是国民党（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高

压政策以来，首次出现的民主运动。我还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亲身感受到群众运动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出它自身运动的力量，意志不坚决的勇敢起来；胆小怕事的在群体行动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认识模糊的思想提高了；仿佛有一种使命感把参加运动的人互相团结友爱起来了。

游行委员会推出三名代表把七项要求送交上去以后，各党派代表出来与全体学生见面。孙科代表国民党首先讲话，他的话很长很罗索，我还记住的几句是：“抗战胜利来之不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建国大好机会”，“你们应该好好安心读书，前途大有希望”等等。官腔官调，加上他那叫人听起来很吃力的口音，听众有点不耐烦的骚动声响。接着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讲话，他的普通话讲得简捷，“同学们来政协提出的七项要求，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这七项要求，并且愿为之实现而奋斗”，最后他振臂高呼：“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周恩来的风度，博得了学生们的好感和好评。之后邵力子、张君勱、莫德惠等人也向学生讲了话。

游行的次日，《新华日报》以“民主大进军”为标题，详尽报导了“一·二五”游行实况，评论“一·二五”游行是五四精神的继续。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后，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

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问题上，国共两党相持不让。《和平建国纲领》成了仅是纸上的东西，半年后，中国的命运还是靠武力解决。

那天游行结束后，我没有随游行队伍步行回校，我到“五十年代出版社”苏学常住的地方，重庆托派组织的领导成员范文华和隗宽正好在观看学生游行后回到那里。他们告诉我，已经与上海托派中央取得联系，中央分成了两派，还在打派仗。他们赞同我与中共同学携手参加反独裁专制、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他们认为不反对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但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我们坚信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深入推进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我同他们见面后，傍晚就乘嘉陵江上的小轮船回学校。

二月初，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换届选举，两派力量经过一场热闹非凡的激烈搏斗，产生了新的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和两个副常务理事都是校内知名的进步同学。他们都热心公众活动。中共处于非法地位，新青社的骨干在公众活动中大多不做太出头露面的工作，他们总是把进步学生中自发冒出来的活跃分子推到第一线，经过一段考察，这些活跃分子，有的成了新青社员。从这一届自治会开始，三青团势力没有再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系科代表大会中，进步力量一直处于多数地位。

## “二·二二”反苏大游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万余学生，又到重庆市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这就是“二·二二”反苏大游行。发生游行的原因，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雅尔达举行会议，决定欧战收场以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本作战，为此，他们背着中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规定了苏联参战的条件，其中有关中国的是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取某些特权，如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辟为国际自由港、中苏共管从满州里到大连的中长铁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八日，苏联对日宣



战，九日，百万苏军开进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正式接受了雅尔达秘密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但在当时没有即时公布。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雅尔达秘密协定公布后，引发各界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愤怒和不满，反对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同时期，苏军在东北拆搬机器、用军用票抢购物资、苏军大兵强奸妇女等等，亦时有传闻。这时又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党政府派到东北接收煤矿的工程师，惨遭杀害），许多事件汇集起来，更激发了中国民众和青年学生们强烈反应。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学教授发表《致苏联政府电》，学生们更是主张举行示威游行。民族主义的爱国心，再加上反动派的鼓噪，突如其来的、又像是水到成渠地爆发了二月二十二日的反苏大游行。没有经过系科代表大会讨论，推开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三青团和复员青年军主导了仓猝爆发的“二·二二”反苏游行活动。自从雅尔达秘密协定公布后，中共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方面显得被动，国民党的《和平日报》振振有词地大做爱国主义文章。

二十一日上午，张锡缙、赵宏才等人对即将举行的游行持抵制态度，表示不参加。追求社的许多人认为游行是三青团鼓动起来的，表示不去参加。到了傍晚，张锡缙等人又忙着分头劝说进步同学，都要去参加游行。

二十二日，追求社的二十多位同学，除我一人，他们都去参加了游行。我决定不去游行，在嘉陵江边一家小茶馆里闲坐了一天，看江水欢快地向东流去，运煤船上的船工们，踏着整齐的脚步摇浆划船，听他们喊唱着苍凉的号子声。

“二·二二”游行后不久，我听说，新青社社员劝说进步同学都去参加游行，是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说游行是普遍自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如果都不参加，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中间势力是占多数的；还要组织一些人保护《新华日报》馆，预防反动分子冲击破坏，等语。

关于“二·二二”反苏游行，我走笔多罗索凡句：现在我能看到的有关解放前学生运动的官方史料中，“二·二二”游行是不写的，仿佛没有发生过。我看到有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二·二二”游行的事，有人就因参加了那次游行，在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倒了楣，划分右派六条标准之一是“反苏”，反对斯大林的苏联那还了得！虽然斯大林的圣光被赫鲁晓夫折腾得差不多了，那时在我们的国度，斯大林还被荣尊为伟大革命导师。也有人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抵制了“二·二二”反苏游行，“并且引以为荣”。

在《李慎之文集》中，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那次游行的事，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抱着满腔革命热情，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现摘录李文的有关一段叙述：“一九四六年年初，由于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并且杀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生进行抗议游行。说实在的，其规模之大可能在中国是空前的。我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路上都有中小学生在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当时苏军在东北抢掠奸淫的恶行，虽然我们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国人知道的是多的，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动，也就没有引起大的风波。相对比之下，与仅仅一个月前昆明的”一二·一“和一年以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五十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势头之猛简直不能相提并论”。（《文集》一五三页）【笔者按：从叙文可以推算出李慎之是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到重庆的，他是没有亲眼目睹二十二日重庆的大游行的，而《新华日报》的那篇社论恰恰是针对二十二日大学生游行而写，刊登于二十三日报纸上。据我所知，二十二日以后，在许多中小城市的

中学生，在老师的率领下纷纷举行了游行，这与李慎之在路看到的情况相符。】

## 从重庆复员南京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大学学期考试完毕，提前放暑假，准备复员。一放假，能回家的如川云贵等省的同学，各自回家去了，杜一飞也回广东家乡去了。曹先志和我把留校待船的“追求社”社员组织起来，成立“ABC读书会”，参加的有李炳均、李方、罗成义、曹惠白、乔象钟、胡润如、谷风、张仲逸、常建宇等十多人。原计划围绕某一本书某一个专题进行学习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讨论会，因被一年级同学选为代表之一，参加协助学校复员工作，提前离开柏溪到沙坪坝与高年级的代表会合，于五月初乘江轮回到南京。壮美的三峡风光，留下深刻印象，一生不忘。

离开重庆前，到市区见到隗宽，他是重庆托派重要成员之一。他告诉我，范文华、苏学常和刘毅三人已经去上海，他们到了上海后，范文华参加了少数派，苏学常和刘毅参加了多数派，根据他们的来信，隗宽还是弄不明白，上海托派中央为什么分裂成两派。隗宽嘱托我，回到南京后，一定要先到上海，把分裂的原因弄清楚，写信告诉他。这是同他最后一次见面。

南京中央大学校址，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改建成军事医院，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野战伤兵医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接收大员，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这所医院占为己有改为陆军医院。几经周折交涉，中央大学才从国防部手里要回了原来的校舍。国防部把能够搬动的物资，都当作敌伪财产，搬走了，留下来的是空荡荡的校舍。我们把所有的楼房和平房都清扫干净，给将要分批复员回来的同学住宿。

协助工作结束后，我于六月中旬到了上海，住苏学常的大哥家，苏大哥比我和苏学常大二十岁，是位不识字的老邮政工人，从十九岁就在火车站干接送邮件的活。从此，我每从南京来上海，都是住苏大哥家，他的家成了我们从四川复员回来的托派学生们的联络点。他对我们的事情不闻不问，他只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住，可能他暗想我们是共产党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网打尽”后，他仍在火车站干接送邮件的活，一直默默无闻地干到退休，像他同样的邮政工人，早就提干或成了劳动模范。一九八〇年，我被释放回到上海定居后，我试着去找找看，他竟还住在老地方，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还很健壮，每天早晨要到公园里做健身活动。他对我说：“我不懂什么‘拖拉机派’、‘托拉斯派’，我只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我向审查干部就是这样讲的”。他的弟弟苏学常于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五〇年在台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判无期徒刑。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苏大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大哥在世时，他时刻期盼他弟弟的消息。

我设法弄到了托派分裂时双方争论的若干油印小册子，就呆在苏大哥家的阁楼上看了一个星期。看完后，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双方。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赞成多数派的主张：保持政治独立，支持抗战；不赞成少数派的主张：抗战变质论和革命失败主义。

苏学常介绍我与华贝（藉云龙）见面，华贝又领我去和耀如（刘家良）见面，我就算作多数派成员了。同时，梁贻也带我去与连根（王凡西）见面，连根善谈，很投合青年人的心理。我留的印象是，他们双方，对我们这些在四川经历战争成长起来的托派思想学生，都是表示期待和信任。而我们对他们几位托派老人都很崇敬。一九四七年初，我第二次来上海时才分别认识了彭述之和郑超麟。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次来上海最大的收获是，从多少数双方拿到了我所需

要的书和小册子——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著作。那时上海来了一批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列宁选集》上下两巨册装，市面上很难买到，不知彭述之通过什么关系，拿到若干卷，他叫苏学常带给我两卷。我在四马路（福州路）一家进步书店，买到了几本马恩重要著作的中译本。

### 扩散思想

我手上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就在学校扩散他们的思想。在我的判决书上有一条“罪行”是“积极在学生中散布托匪谬论，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为首组织托匪‘支部’。”

金万林是第一个受我影响接受了托派思想的，他是地质系的学生，比我高一年级。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复员回南京的轮船上认识的，我们的舱位紧靠着，船上生活单调，除了看看风景，就是与人闲聊或看看书。我注意到他聚精会神地在看何干之的一本社会性质的书，我觉得奇怪，一个学地质的人喜欢这样的书。因此，我就同他聊起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何干之那本书是论战性质的，略论到托派的观点。金万林表示，不知托派是怎么讲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受到的思想训练首先是谨慎认真和求真。严灵峰的一本社会性质论战的书正好带在身边，就借给他看，他看后，赞成严灵峰的观点，他说：现在无论城市或农村，到处都是洋布、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洋袜子，四川人称自行车为洋马……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霸占了中国的市场。闲聊中，知道他参加过“一·二五”游行，他对国共和谈不抱乐观；他参加过“二·二二”游行，他说那是一场无组织的乱哄哄的游行，青年军分子呼喊反苏口号，进步同学就用更高的声音喊：“一切外国军队都撤出中国”等。他对国民党专政独裁不满，思想要求进步又无明确目标。我开始同他谈社会性质问题，他说他看过《新民主主义论》。我忙完了协助学校的工作后，到上海住了半个月，回到南京后，我把《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介绍给他看后，又继续同他谈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接着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本书介绍给他看。美国宣布“调处”完全失败，国共全面内战，抱和平主义思想的大多数同学都陷于苦闷，金万林接受托派思想。

杜一飞是第二个受我影响接受托派思想的。因为复员，那年暑假放了四个月，到十月才宣布开学。杜一飞回到广东阳江，见到了他在中学时的许多同学（已是中共或倾向中共），约他到农村去看看，有意要他留下来，在农村干一番事业，他想留下来，但对农村干革命没有信心，结果，他还是回到学校来了。他对我讲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那里已经有了一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所谓武装力量，就是有几支步枪和手枪。我介绍他读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和《德国农民战争》，还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几本著作。他聪明，是个笔尖子快，勤于写作的人，看完几本书后，就写了两篇文章给大家传看，他在文章中明确论证在民主革命中，农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只能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跟着无产阶级走。我把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和《不断革命论》介绍给他看。他接受了思想后，不组织社团不办墙报，他在学校里办起了一个民众夜校，报名参加的都是中大的校工和校警，每天晚饭后在教育系的一间教室上课。原来参加追求社的两位教育系的女同学，还有曹惠白担任教课。那时曹惠白不知道杜一飞已经接受托派思想，他把杜一飞当作新青社员，她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她曾在地下党（中共）领导的民众夜校教过课。民众夜校从一九四六年底一直办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为止。八月，国民党特务在中大逮捕进步学生，杜一飞逃走离校。

曹先志是第三个受我影响而接受托派思想的。同读历史系，在重庆时同参加过追求社，又同组织过“ABC读书会”。回南京后同住一寝室（一室八人），星期日，闲暇时就结伴逛书店或去玄武湖和中山陵游玩。读中学时，他就喜欢写作，深得国文老师的好评。一九四六年六月复员回到南京后，在那个漫长的暑假期间，他开始写电影评论，寄《新民报》发表，有稿费，又可买电影票，我沾光不少。以后他写的书评不是发表在《和平日报》副刊上就是在《文汇报》副刊上，储安平编的《观察》上还多次刊登他的散文式的通讯。在校内他参加新青社员王国庆主持的《太公报》，是校内唯一的新闻性手抄壁报，他担任过抄写、采访、编辑和写社论等工作。我知道他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也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书，我介绍他多读马列的著作。他在自传体的《我这一辈子》书中写道：“他先介绍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为此，我先后读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等著作，脑子里装进了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接着他又介绍我看《托洛茨基自传》、《中国革命问题》等书，还把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介绍给我，这部书记实性地报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十天内的情况，曾得到列宁的推介。”“……使我知道，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经历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背叛了国际主义原则，一切政策以苏联的利益为出发点，我国大革命失败就是由于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所致。”“……使我开始探索历史真象的愿望。”（《我这一辈子》十九——二十页）。曹先志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很强，法国文学家安德列·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同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都是纪实性的报导，曹先志读了纪德的两本小册子后，完全相信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现状与前途》（《被背叛的革命》）对苏联的分析和批判，接受了托派思想和观点，成了我在南京活动的有力助手。

曹惠白读中国文学系，在重庆读一年级时，参加“追求社”和“ABC读书会”。她为人朴实大方，热情豪爽。她的父亲曹亚伯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是位民主主义革命元老。北伐战争后，不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篡改辛亥革命史，退出政界，隐居江苏昆山，著《武昌起义真史》。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时期，曾遭禁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华书局曾再版发行）。认识曹惠白后，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使我想到旧俄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诗《门槛》中所塑造的那位为争取自由而挨苦难的俄罗斯少女形象，而曹惠白一生一世，遭受的苦难，大大超过了屠格涅夫的想像力。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历次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她都积极参加，在学生运动中，她很活跃，她感召力很强。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大三千多学生因伙食费问题，到教育部向部长朱家骅请愿（后节详叙），回校后，我对她讲“朱家骅是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中兴起的人物，现在成了学生运动的对头”，她说了一句：“历史是一代人踏着一代人的尸骨前进”，语气深沉，我受到震感，记住了，至今不忘，当时我回她一句：“你这话讲得很有哲理”。我同她交谈的次数多了起来，知道了她父亲的经历，她把《武昌起义真史》借给我看后，同她谈的议题更多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正在进行的国共内战等问题。一九四七年暑假，她到上海住在她父亲的一位王姓朋友家里，我介绍她去参加彭述之主讲的哲学班，告诉她参加听讲的都是上海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青年工人，她同意了。暑假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开始同她谈马恩列托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革命问题，介绍她看《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即托写的《过渡纲领》)等书和小册子。她求索真理的精神很强,她读理论书的理解能力和吸收能力也很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初的寒假期间,她仍到上海住王家度假,我介绍她去参加“社会科学讲座”,听彭述之讲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和刘家良主讲国际工人运动史。从此她确立了思想信仰。回学校后,积极地扩散马恩列托的理论观点,把她看过的书,传给她周围的所有认识的同学看,这引起了(中共)新青社的注意,因为在她周围的人,大多是新青社的或思想倾向中共的进步同学。在她还没有把托派宣传小册子传给人看之前,(中共)新青社可能把她看作是发展可吸收的对象,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后,托案承办人曾向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曹惠白如果不是受到你的影响,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第二次大逮捕学生(另节记叙),曹惠白被捕,男友郑显芝早已在上海被特务逮捕(上海解放前夕遇害)。她被释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南京政局混乱,学校已呈停课状态,曹惠白无处安身,离开南京到上海,又去香港进工厂当工人,懂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一九五〇年四月,从香港回到上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国肃托“一网打尽”时被逮捕。经过一年管制,未判刑释放,安置就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安然无事。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大论战,双方互相把托洛茨基派这顶帽子硬向对方头上扣,当时,许多中共高级干部如“堕入冰窖”,“不敢多讲一句话”(《李慎之文集》语)。不知曹惠白主动还是奉命写思想汇报,在汇报中,一条思想的大意是说《九评》中的某些论点与托洛茨基的论点一样。这还了得,她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给她戴上“托匪”帽子,送政法机关审查,判刑坐牢,延至“文革”,横遭文斗武斗,肢体严重受伤。她意志坚强,思想信仰未被击溃。

以上四人,是直接受我影响接受托派思想的,以下简述南京其他托派思想的人:

罗成文是中央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与曹先志同时参加中共同学王国庆办的“太公报”。一九四八年初,他一度去苏北解放区,不久,他回来后,受曹先志影响接受了托派思想。

杨同春是金陵大学学生,受金万林影响。

熊人望在金陵大学半工半读,靖江人,抗日战争时期,彭述之曾一度在靖江避难,不知是住在他家还是住在他父亲的朋友家,他那时还在中学读书,认识彭述之而受到影响。

范月秋是江宁师范学生,也是靖江人,也是受彭述之思想影响的,抗战结束后,她一度在上海进工厂做工,后来考取南京江宁师范。在江宁师范她影响了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组成一个读书会。曹先志负责定期与她联系。

邱季龙和胡振东都是温州人,在温州读书时参加了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考南京金陵大学代办的工商学院读书。上海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周仁生把他们介绍给我,他们是气质优秀,信仰坚定的两个青年人。

赵慎也是温州人,在温州读中学时受到托派思想影响,抗战后期去了重庆曾进工厂做工,抗战结束后,他借亲戚关系,回到南京,在国防部充当一小职工。他在温州读中学的女同学陈秀兰在中央大学读书,倾向中共,他俩很要好,但思想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赵慎能弄到军用火车票,不用花钱,使我来去上海,非常方便。

李修梅,安徽人,在重庆兵工厂当工人,受范文华影响接受托派思想。抗战

结束后，也是借亲戚关系，回到南京，在后勤部充当一名职员。在中央大学附近一条小巷子里租借了一间民房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溃败，中共又发起了淮海战役，局势越来越紧张，学校里有捕人的传闻，我把许多有关的书籍、小册子，都送到他住的地方存放，他是一位很忠诚的人。

张圣时是我的中学同学，年级比我高，是最早受托派老师闫子桂思想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到重庆先进工厂做工，后又准备回到被敌伪占领的山东家乡进行抗敌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折磨后释放，到江津国立九中读完高中，与我同时考取中央大学，读艺术系，专心致志于学画油画，与我保持个人联系。

江□□，名字记不清了，一九三五年前后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与刘家良、王振华等同一时代，已脱离组织，仍与刘家良个人联系，刘家良把他介绍给我，与我保持个人联系。

我现在再回头记叙一九四六年底以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活动。

### 抗议美军暴行的两次游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生“沈崇事件”，中央大学校园各种壁报立即贴出抗暴专刊，《太公报》更以剪报形式揭露美军暴行。（中共）新青社发动同学，要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游行示威，商定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游行，受到三青团势力反对，他们认为强奸是法律问题，不必发动游行示威，不要被“另有作用”者所鼓动利用等语。他们胁迫中间分子退出会场，使系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不足法定的半数，使决定不能成立。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下午，中央大学只有不足千人的学生以“自由参加”身份与金陵大学、剧专、音专、药专、东方言专等学校的学生共三千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走到国民政府门前，高呼口号“美国兵，滚出中国！”“请政府保障人权”等等。学生代表呈上三点要求：①请美军立即撤出中国；②请政府向全世界控诉美军暴行；③请政府保障人权。

剧专学生在宣传卡车上扮演美军暴行的活报剧，激发起围观市民们的愤怒，跟着学生呼口号。游行队伍行至美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口号夹杂着英文口号此起彼伏。五名代表进入大使馆要求见大使，提出四点要求，由参赞接见，参赞宣称：司徒雷登大使整个下午都在等待游行的同学们，直到五点钟才因公出门去了，留下一纸书面信。内容：“关于北平不幸事件，正由北平美军海军当局彻底侦查中，如犯法属实，自当以军法从事。我们对于这次事件当然根据事实如何，以民主原则为依归，现正等待北平侦查的结果。”拿了这个回答信，代表只好辞出，向同学们报告了经过情况，游行队伍撤离大使馆回校。

得知二日游行情况后，中大未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提出三日再举行一次游行。二日晚上，系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各自回到所在院系，听取同学们的讨论意见。三青团势力看到无法阻拦游行，提议加上要求苏军撤出东北，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等口号。在历史系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反对这一意见，认为这次是针对美军暴行的游行，不应再提“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口号。在讨论中，我提出：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行，但应该再加上“要求收回九龙、香港和澳门”的口号，我说：这样一来，就使这次游行有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性质了。历史系多数同学同意我的意见，其他院系也接受了历史系通过的意见。二日深夜，系科代表大会上经过争论通过了三项游行口号：美军立即

撤出中国；一切外国军队都要撤出中国；严惩暴行罪犯，等等。

一月三日下午，中央大学三千多学生又走上街头，只有少数极端亲美分子没有参加。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剧专、音专等院校的学生又都来加入组成近六千人的游行队伍。仍沿二日的路线，先到国民政府，呈交请愿书，经过《和平日报》馆时，有人喊“《和平日报》拿出良心来，不要造谣”，经过外交部时，有人喊“中国不是美国殖民地，不做美国人的尾巴”，“外交部要维护国格，不要媚外！”一路上没有受到军警的阻拦。最后，仍到美国大使馆，我注意到在大使馆外，增加了军警防护。司徒大使接见学生代表，他首先表示，他要讲的话，都写在昨日的书面信上了。他彬彬有礼的学者风度和言词回答代表们的提问，最后表示：还没有收到北平最新信息，对你们提的要求，无法回答得更具体。

天色转暗，游行队伍再一次撤离美国大使馆区，各自回校。

经历这次反美暴行游行最大的收获是成立了全市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其次是使安于现状的中间群众（他们在学生中占大多数）摆脱了三青团分子的影响和控制。

反美暴行游行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改选换届，王世德任常务理事（主席），朱成学和王安民任副常务理事组成十人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参加竞选获胜，我是十名理事之一，负责文艺和宣传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两党内战全面展开。

### “五·二〇”学生运动始末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为应付内战，大量印制钞票，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在国统区各地，不断发生抢米风潮。中央大学教授会于三月二十七日，五十多位教授开会，推举历史系主任贺昌群教授起草了《中央大学教授宣言》，于五月六日公开发表。教授们提出了六项“郑重决议”：

- 一、请政府决定并施行全国教育经费最低不得少于国家预算百分之十五。
- 二、各党派、青年团训练经费，不得由国家文化教育项内开支。
- 三、请政府直接指拨充足外汇，交各校订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并简化上项各物向国外订购之各种手续。
- 四、教员薪津应明文规定，依照物价指数支付。
- 五、教授最高薪酬，应由六百元提高至八百元。
- 六、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之有效贯彻。

中大教授发表《宣言》之后，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于五月十日贴出布告：“近来物价猛涨，伙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即日召开桌长（八人一桌）会议，共商办法。”布告一出，群情激愤。系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按照物价指数调整伙食费（解放前国立大专院校学生伙食是全部公费的），并决议自五月十三日罢课。

五月十三日，中央大学学生为提高伙食费，到教育部请愿，教育部长朱家骅拒不接见，由总务司长用“搪塞”、“推托”和“官腔”三件法宝对付学生，同学们气愤异常，一位情绪过于激动的同学，举起双拳砸碎传达室的玻璃窗，双手和手腕都是鲜血。请愿未得到结果。

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联合剧专、音专等校共三千多名学生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提高伙食费。行政院长张群不知去向，由副院长王云五出面接见学生代表，

双方辩论好久。王云五说：“政府没有钱”，学生问：“打内战为什么有钱？”学生们根据教授《宣言》，要求教育经费提高至国家预算百分之十五，王云五说：“改变预算须经立法院通过”，学生就问：“打内战是那次立法会议通过的？”王云五最后表示：“伙食费可以提高一些”，但拒绝按物价指数支付。学生说：“请你不要用社会上商务买卖来讨价还价”（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大老板）。

中大系科代表大会决议，五月二十日，趁“国民参政会”开幕时，再次举行游行请愿，同时与上海、杭州、苏州各高等院校学生取得联系，希望采取共同行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学生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为要求增加伙食费派出代表赴南京，参加请愿活动。

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评，大大挖苦为伙食费请愿的学生们，它说：“五四运动是为国家主权，何等伟大！”《中央日报》的暗台词是讥笑我们为吃饱肚皮，兴师动众，游行请愿向政府要钱。《中央日报》的挖苦，却激发了学生们的思想升华提高，系科代表大会又作出补充决议，在“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两口号后面加“反内战”口号，使游行请愿有了政治色彩。

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召开国务会议，针对连日来“学生闹事”，发表的谈话中恶狠狠的两句话：“国家何贵乎有此毁法乱纪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暴戾恣肆之青年！”国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违者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等等。这没有吓倒学生们，反而激怒了学生们。

五月二十日一早，宪兵警察就把守住中大校门，并要学校交出学生自治会主要领导人，吴有训校长当即拒绝。宪兵警察把守中大校门，学生们知道冲不出去，就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校园里走动，待到快中午时，中大学生和上海各校学生代表分组从学校后门突击，与金陵大学等校学生会合，五千多名学生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行进到珠江路口时，受到警察的阻拦，走在前面的队伍冒着高压水龙喷射冲了过去，剩到最后的几百名中大學生（多数是女同学），遭受了警察用粗棍横打，被打倒在地的女学生又遭脚蹬和踢。我已冲到前面去了，没有看到那阵暴行的场面。据事后统计，轻伤近百人，重伤十九人，被捕二十八人。冲过水龙头封锁线的队伍，行进到国府路（今长江路），又被五道防线阻拦：骑兵、宪兵、步兵、青年军、防护团。第一道防线是一字横排的骑兵，高头大马紧紧靠拢。无法向前冲，游行队伍困在那里。下午二点钟，狂风大作，接着暴雨，学生们坚持原地不动，最后，学生代表到国民参政会会见秘书长邵力子，邵力子出面调解，学生代表与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达成协议，协议之一是军队撤防，让学生队伍回校。

南京“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全国有六十多座大小城市的学生举行游行、罢课等活动，表示支援。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包围中》一文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侵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斗争。”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平学生提出以六月二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罢课、罢工、罢市。那时，中大學生从十三日已经罢课。五月二十日游行挨打后，学生们很气愤，要求再举行游行，系科代表大会开会通过决议，六月二日，再举行一次命名为“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游行，响应北平学生五月十九日的号召。过了两天，系科代表大会又开会，通过了撤销“六二”游行的决



定，并通过决议，六月三日复课。游行为啥又撤销呢？“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我们取消‘六二’游行，以免遭受打击。”（《南京党史资料》第二期六十七页）。当时，新青社员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在进步同学中进行了劝说活动。系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六二”游行，与三青团方面反对举行游行，两相巧合。

## 一九四八年“五四”纪念和“五·二〇”周年纪念活动

“五四”二十九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大、金大、金女大，分别举行了一星期。内容有：歌咏大会、戏剧晚会、诗歌朗诵会、营火晚会、学术讲演会、“五四”史料展览等。我和中共同学蒋毅辛负责主办“五四”史料展览，我把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都翻开放在展览桌上显著位置，我还写了简略说明贴在墙上。那时，还没有经历后来半个世纪的反托陈宣传影响，共产党同学也没有表示异议和反对。现在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受到承认和尊重，看到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陈独秀，既感到兴奋，又自愧无力参与。

“五·二〇”周年活动内容是在南京各大学举行巡回史料展、漫画展、座谈会、纪念晚会等。二十一日，南京万余学生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纪念晚会，有著名教授讲演，有去年游行示威受伤同学的控诉等，最后是晚会文艺节目，曹惠白演唱陕北民歌《兄妹开荒》，音专三百人大合唱后，剧专演出活报剧《典型犹在》，演的是袁世凯坐皇帝前后的史实，全剧共三场，演至第二场时，以顾崇实为首的三青团特务分子近百人冲进会场捣乱，断电线灭灯，乱打人等骚动了一阵，群众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安静下来，打手们在黑暗中遁出。纠察队在混乱中抓住了两名行凶打手，一查，是高中学生，三青团员。晚会无法继续进行，各校学生整队集体离开中大。在路上，有四位同学被埋伏的特务抓捕，当晚送到三民主义青年部关押。引发了第二天中大学生包围青年部要人，青年部大门紧闭，愤怒的学生们在大门顶中央用沥清写上“特务部”三个大字，又把青年部的招牌改写成“中国刮民党中央暴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部长陈雪屏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们冲击青年部大门。僵持到中午，金陵女大学生们来支援，她们带来一千多个烧饼和其他食品慰问中大学生。后来，中央大学训导处的生活指导员和青运处长来了，他们都是与青年部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俩出面调处，被捕的同学获释。

## 大逮捕

一九四八年暑假，学校里就有黑名单要捕人的传闻。有些共产党同学和在历次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都不见面了，他们有的撤退去了解放区，有的躲藏起来。我就听说张锡缙和赵宏才住进麻疯病院去，那里有位医生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成学等几个人企图北去解放区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回来，朱成学被判十年。他是“五·二〇”游行时那届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是位积极肯干的人，就是他把我拉进那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的，十个理事都是能为他们竞选增加选票的人。那时他是不是已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我是托派，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常找赵宏才商量事情，当时赵宏才已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重要负责人，已经知道我是托派。朱成学于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总统时期，由中大教授保释。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南京地委副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第一次大逮捕学生九十三人，被捕都是学运的积极分子。杜一飞住一楼，特务们敲他寝室门时，在同室同学们帮助他后窗逃走。后来知道，他逃到上海，参加托派少数派活动了三个月后，回

广东他的家乡去了，与我失去联系。曹先志被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那批学生，都押送到南京城外孝陵卫一处破旧的庙里，那里成了特种刑事法庭的看守所。由于学校的营救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批被捕的学生先后经过形式上的审讯程序，都被判无罪释放，于十一月五日获释回校。曹先志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大逮捕的次日，逃离南京，在上海《观察》周刊社住了个把月，决定回湖南家乡。一九五〇年回到南京时，中央大学已与金陵大学合并，改组成南京大学。

一九四八年底，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崩溃，中共又发起了淮海战役。战役开局，国民党军就处于劣势，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全部被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对中大、金大的学生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当晚逮捕数十人，其中有些是第一次被捕被判无罪释放的。中大曹惠白和金大杨同春被捕。曹惠白被捕的次日，和她同寝室一位教育系的女同学把书桌抽屉里曹惠白的东西放在书包里送到我手里。书包里除了日记和若干信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在第一次大逮捕前，我已把我身边的和别人手头的重要书刊、小册子等，都收集起来，送到校外藏放。

淮海战役，国民党又输得精光。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出台，准备再度与中共和平谈判游戏前夕，第二次被捕的学生才获得释放。

第一次大逮捕时，我正在上海出席彭述之建党大会。大会后我回到南京，学校已呈半停课状态，教授照常上课，但有的教室里空无一人。如果有一个学生坐在教室里，教授照旧正式上课，教授有教授的苦处，学生罢课是一会事，如果教授不上课授课，就是罢教，不得不存戒心。第二次大逮捕后，我躲住在天主堂办的孤儿院的后院两个月。一九四九年初，到上海参加革共的党团临委会工作，从此，我的大学生生活结束。

## “四一”游行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发生“四一”游行血案，第二天看报知道后，我曾回南京一趟。对这次游行血案的起因与后果，简略记叙如下：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蒋介石输光了打内战的本钱，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文告，声明“只要共党一有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共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基本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名列首位。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下台“引退”，原属桂系势力的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出台执政，仍玩和平谈判游戏，发表声明，要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并于四月一日派出代表飞赴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就在和平谈判代表起飞的当天，四月一日，南京数千名学生举行了“反假和平”游行示威。与以往游行情况稍有不同的有两点：①遭受两次大逮捕之后，南京各校中，进步积极学生留在学校里的已经不多了；②这次游行示威是以中央政治大学（简称“政大”）学生起头。“政大”系国民党政府培训县级政工人员的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前几次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大”学生概不参加。学生们在全市游行快要结束时，遭到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军官收容大队”数百名凶手的袭击，“收容大队”收容的都是败退逃回的军官，他们殴打学生的凶器是木棍、铁尺和砖头。当场打死四人，轻重伤二百多人（“政大”伤七十三，死二；剧专伤六十多人；中大伤四十七人，死一人；建国法商学院伤十四；边疆建校伤三），

卫戍司令部竟推说学生伤亡是与军官发生互殴造成。这竟与上一年“五二〇”游行示威时时警察局的谎言一样，为镇压学生，一辆运送警官学校学员的卡车，在鼓楼附近翻车，受伤者送到中央医院，他们受命报称是被学生打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生存，除了镇压手段，还要兼用谎言、欺骗和蒙蔽。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四月二十日，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二十一日，中共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万里长江横渡，二十三日攻克蒋介石政权盘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毛泽东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龙踞虎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同时期，蒋介石密发《剿匪手册》，准备再次大打内战。毛泽东针锋相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九四七年，两党宣告决裂，全面大打内战，中共首先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实施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战争，只经过三年征战，中共领导的翻身做了土地主人的农民子弟兵，彻底打败了蒋介石“拉壮丁”征来的兵，把蒋家政权扫出大陆。从此，中国大地上，万方百族颂唱《东方红》二十七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懿舆盛哉，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二〇〇八年三月初稿

二〇一一年四月补充定稿

### “良知唤醒了内心”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地下组织——新青社，当时在中大柏溪分校（一年级学生），赵宏才是主要领导人。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复员南京，一九四七年，有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九四八年赵宏才任党总支委员。（参照穆广仁编写《中大新青社简史》，载《南京党史资料》第二期）。在中央大学，我同赵宏才同年级不同系，我读历史系，他读社会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认识，在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明白他的中共立场，他也意识到我的托派立场。这并没有妨碍我同他们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采取一致的行动，至少表面上是相互敬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一直拖延至“文革”，遭遇了二十一年非人的苦难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才得以走上正规。晚年死于癌症，生前写下了二十万字的自述《劫后余生的劫后余声》。去年，我看到了万余字的摘要，知道了他的苦难经历和他对苦难经历的审视和反思。在“江畔忏悔”小节中有一小段文字记叙了他与我的关系。

兹将赵宏才这一段忏悔文字全文抄录：

“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没有左倾症吗？在中央大学，有托派活动。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我把托派熊某（安东）和杜某（一飞）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帮凶。可是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我告诫同志们不跟他们合作，提高警惕。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托派了解我们的地下组织，却从来没有出卖我们。他们和我们地下组织同志同时被国

民党逮捕下牢，也没有出卖我们。解放后，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到了他俩，我还举证他们曾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破坏作用。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我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

读了这段文字，我要讲的是以下五点：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对全国托派“一网打尽”，在审讯员审问某个问题时，我意识到赵宏才参与了肃托工作，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想而已，可这一猜想压在心头，多少年来挥之不去。“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住了他俩”，竟证实了我的猜想，不仅参与了，还动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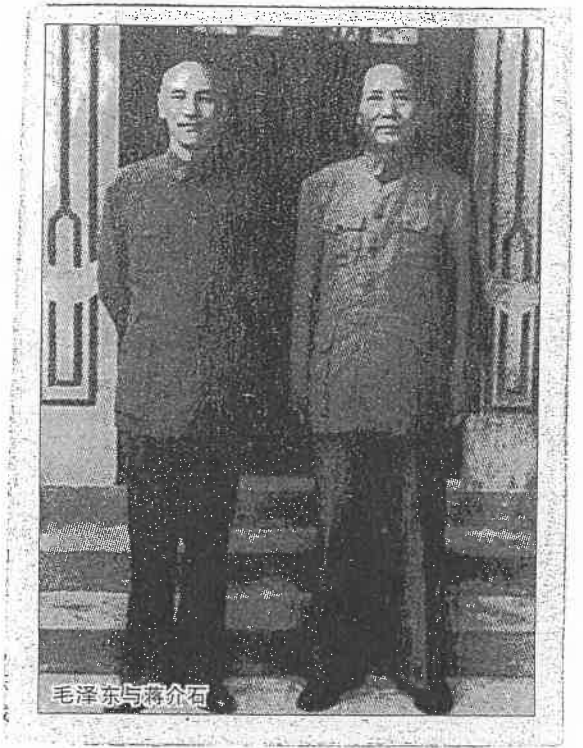
（二）托案承办人在一次审问我时，说过“曹惠白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曹惠白时，她说她也听到过这样的话。承办人员有什么根据做出这个结论的呢？“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赵宏才指的是曹惠白和曹先志吗？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曾参加过新青社。

（三）赵宏才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两次说到“没有出卖我们”，我不能不联想到，他既然参与了一九五二年的肃托工作，他又是做事很认真负责的人，他不会不去翻查档案（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和一九五二年以前被捕反动分子交待的）材料，想找到托派同国民党“勾结”的证据，那怕是蛛丝马迹的证据也好，他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因此，他连说两次“没有出卖我们”不是空泛泛的套话。

（四）“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这是一位忠诚共产党人的反思忏悔，良知唤醒了自己的内心，是自责，也是对“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说法的质疑！

（五）“这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用良知唤醒了自己的内心，才讲出了这么一句沉痛的反思。他曾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把托派说成是“特务”、“帮凶”、“起破坏作用”等，他曾参与了“肃托”的具体工作。国际风云幻变，他看到了苏联东欧的散架；他看到了斯大林偶像的崩塌，他看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对托派的定性作了修改，取消了“汉奸——托匪——反革命”诬蔑性的说法，他明白了他的“左倾症”的根源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部被誉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曾经是共产党干部人人必读的“圣经”。它对史实的歪曲和捏造的谎言，混乱了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思想认识，至今，它的影响还潜存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马长虹《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七期）

二〇一一年四月



毛泽东与蒋介石

## 八十五岁自述生命史（三）

8

### 参加上海托派活动始末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籍云龙由上海到南京看我，给我带来建党的纲领草案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路》即托洛茨基写的《过渡纲领》。籍云龙走后，过了几天，林松祺到中央大学找到我，告诉我：欧伯（彭述之）到南京了。随即跟林松祺到了欧伯住的地方，林松祺告辞回上海。欧伯告诉我，他是先到广州后到武汉再到南京的，他住的地方是与他私交甚笃的朋友，也姓彭，时在国防部任专员职，嘱我讲话时要注意点。

欧伯要我陪他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去看看。出中央大学后，我陪他从老虎桥监狱旁边走过，他同陈独秀曾在此关押五年，他说：“我们又开始了。”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建党了。走到金陵大学校门口，他说：“这里的建筑还是老样子。”北伐时期，他是第×军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占南京后，他曾在金陵大学的大礼堂发表演讲，听众挤满堂。讲起往事，他兴致高又无限感慨，我陪他走进空无一人的大礼堂坐了一会，他吸着烟斗沉默不语好长时间后，告诉

我，准备八月底或九月初召开建党大会，要我八月下旬一定到上海。

次日，我安排他同中央大学学生金万林、杜一飞和金陵大学学生杨同春、熊人望见面，他们陪欧伯到玄武湖和紫金山去玩，边走边谈了一天。回来后，欧伯告诉我他对这几个人的印象很好，都能把自己的见解说得清楚，我告诉他，杜的思想倾向少方，他问：“少方有人来吗？”我实告：“这里是门户开放的。”事实是这样的，就在欧伯来前不久，与籍云龙到南京差不多是同时，少数派的李培到南京看我，给我带了两部影印出版的《俄国革命史》。一九四八年春天，参加了少数派的范文华（六中同学）要到北方去，路过南京时逗留了一段时间，就住在我那里。

我讲了“门户开放”，看到欧件沉默不语，我向他讲：从四川到上海的七、八个人，有的参加了多数派，有的参加了少数派，但在我们七、八个同学之间，还是抱成一团的，谁也不会拉谁，彼此尊重各自的观点。

第三天，我安排赵慎（国防部图书馆职员）和李修梅（后勤部职员，是范文华在四川影响的一个工人）同欧伯见面，我陪他们两人同欧伯谈了一会话，然后我陪同欧伯到江宁师

范去看望范月秋。抗战时期，欧伯曾到靖江避难，范月秋是那时直接受欧伯思想影响的，她在江宁师范影响了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她们成立了一个读书会。

一对年轻的广东籍夫妇（同情者），从武汉赶到南京，当晚他们陪同欧伯回上海，要不，我还准备安排曹先志、曹惠白以及建国法商学院的胡振东、邱季隆等同他见面。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国民党政府逮捕了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八、九十名进步学生，其中有金陵大学的杨同春，中央大学的曹先志、曹惠白。杜一飞也是被逮捕的对象，他住楼下，在特务猛敲屋门时，他在同室同学的帮助下以后窗逃跑了。从此，他同我失去了联系。

南京大逮捕的第二天我到了上海。刘乃光安排我住到浙江北路一家门市是小百货店的三楼上，钱川同李丽华住在那里，他们住后间，我睡在做客室的前间。

每天早晨，都是刘乃光来带我到开会的去。

建党大会先是在海宁路大公小学里开了三天，担任保卫工作的郑铿（朴克）发现有情况，即迅速散会。以后两天改到八仙桥泰丰烟店楼上开会，店主人严燕宾是欧伯的老朋友又是同情者，会开完了，严燕宾在楼上办了两桌丰盛的酒席，



以示庆贺又有为他的店子掩人耳目之意。

参加大会的有：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尹宽、喻守一、籍云龙、刘乃光、郑铿、王国龙、杨博、刘毅、姜君羊、陆绩、丁毅、钱川、周仁生、章涛、熊安东、陈晓霞，等。

在讨论彭述之的政治报告时，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彭述之政治报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走上政权，这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住政权，无产阶级不能不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陆绩和姜君羊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政权的，彭述之、刘家良、喻守一都认为陆绩的讲法是少数派郑超麟的观点；陆绩认为彭述之的讲法是革命阶段论不是不断革命论，等等。

我的理论水平有限，当时对这些抽象概念的文字游戏式争论不感兴趣，没有发言。事后，刘毅向我讲，对我的不发言表态，欧伯有点不满意，大概我的“门户开放”引起了对我的误解，实际我认为彭述之在政治报告中阐述的思想，更

贴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纲》、《党章》，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选出了中央委员：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真渔、尹宽、喻守一、戴颜。后补委员：刘毅、郑铿、刘乃光（秘书）。常务委员：彭述之（书记），刘家良（组织），尹宽（宣传）。

当时，我对中国有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党，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知多少黄浦江水流入东海，历史老人在中国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个零分。

一九四八年底，为了避免遭受来自国共两方面的破坏或斩首，刚成立的革共中央迁搬到香港，决定在上海成立“江浙党团临委会”，领导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组织活动。临委会由钱川、丁毅、刘毅三人组成，后又调 王国龙、杨博、熊安东三人参加。

临委会的机关刊物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由周履铨负责刻腊版编印。

我是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由南京来上海参加工作的，分配我联系三个支部：大自鸣钟法商电车公司销票员盛××

为中心的“法电支部”，忻康里铁厂“工人支部”，番禺路“青工支部”，另外联系交大叶雅铤和某纱厂女工韩风英。

一月到五月上旬，“临委会”和各支部生活都正常进行。上海是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解放的，上海解放后，“临委会”停止开会两个月多，原因是“临委会”的六个人都要各自适应解放后的社会生活环境，各人联系的支部人员也有很大变动；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冲击了中国托派的一些理论观点。中国托派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苏联外交政策制约，不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等等。历史的现实是，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七年宣布土地改革，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战争，推倒了三座大山，夺取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和国民党必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回答各支部成员对中国共产党胜利所提出的问题，成了“临委”们的难题。

我联系的青工支部三个人有两个不知去向，法电支部只剩盛××一人，另二人回苏北家乡参加土地改革分地去了，忻康里支部也跑了一个人，去参军了。

九月间，召开过一次“临委会”，汇报了一下各人联系的支部人员情况，都有较大的变动，王国龙和钱川联系的一批温州中学生都被少数派拉过去了。十月再开一次会，决定把各支部人员重新编组，恢复机关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会议开了一天，准备停一天后再开一次，就在休会的那一天，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钱川、丁毅、刘毅、王国龙、被捕的还有周履锵、赵养性、沈云芳等。过了一个星期，他们被先后释放，释放时受到警告：不准再搞组织活动，不然就不再客气了。刘毅被释放后找到我，对我讲了上述情况。

从此，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瘫痪了。许多个人，大部在各自的工作单位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正始中学撤并始末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由南京来上海参加“临委会”工作，我的职业，事先已安排好，顶替林松祺在正始中学教书。为了避免嫌疑，林松祺托一位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出面，把我介绍到正始中学。

正始中学位于法华镇路，是杜月笙家族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办学为了扬名造势，有钱，学校规模建设得宏伟，一座四层的教学大楼，一座三层实验室大楼，六栋二层的宿舍楼，一栋供教师住，五栋供学生住，一个很广阔的大操场，学校有自备深井供水。

林松旗走前，告诉我，教国文的文超是中共党员，教童子军的是个国民党特务，要我注意。我住的房间与文超相邻，我初来乍到，知道我是中央大学学生，又是圣约翰大学教授介绍，他主动接近我，每天晚饭后，相约到附近的虹桥公墓一带散步，虹桥公墓是富人大官长眠之地，孙夫人的父母也埋葬在那里，整个陵园肃穆宁静。天天接触和谈话，知道他有个女朋友，剧专学生，两年前去了解放区，参加了二野的一个文工团，他只知道她的一点信息，他还是想念着她，等待着她。他向我讲了正始中学的一些情况，教童子军的和教

务处的一个教务员都是大上海青年服务队的队员，不要理睬他们，教务主任和事务主任以及财务是替杜家掌管这所学校的实权人物。

文超介绍我参加了上海市西区中小学教师联谊会，简称“教联”，无须说明就知道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参加“教联”的都是一些思想进步的中小学教师，都是喜欢唱：“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讲民主呀……”的青年人。文超告诉我，在正始中学教生物的戴老师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思想倾向进步，胆子小，要等一等看，暂不介绍他参加“教联”。教数学的徐老师和教英语的陈老师也倾向进步，他们都有了家室，也暂不介绍他们参加“教联”的活动，可常找他们谈谈。

四月南京和杭州先后解放，上海处于被包围的形势，一个国民党的军部驻进了正始中学那座四层教学大楼，指挥虹桥一线的作战，我们把住校的和大胆敢来上学的学生迁到那座三层的实验室大楼继续上课。

形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紧张，都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一天，文超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没说要走的理由，我也不便多问，我猜想他的走与他的女朋友有关，二野正进军江西。

文超走后，“教联”方面同我联系的，一次是姓章的，一次是姓于的。参加“教联”集会活动时认识她们的，她俩在联谊会上很活跃，还记得她们组合几个人在集会上放声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歌时的情景。

三个多月里，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教联”活动，参加托派“临委会”的活动，两种政治性活动，使我感到生活节奏快、紧张、刺激，也使我顶住了初遭失恋的苦痛和烦恼，没有沉沦。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首先从虹桥一线发起了进攻，半夜里，国民党军队败退下来，军部在嘈杂的汽车声中撤走了，次日早晨醒来，我从宿舍楼的窗口向外望去，看到许多军服不整齐又沾了泥土的解放军战士，半卧状态持枪休息。山东乡音一阵阵传来，多么熟悉，多么香甜，多么想到楼下同这些山东老乡聊一聊。

当天（二十六日），一个解放军的军部接管了四层的教学大楼，解放军战士把国民党军部遗留在大楼里的物资都搬了出来，堆放在校门旁附近的大操场边上，看样子，是等待运走。

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我在正始中学教职员宿舍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嬗变的历史瞬间。

我做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贪污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失败，感到由衷的高兴；想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它们在南京珠江路上惨酷地镇压学生，如今看到它们落得如此狼狈不堪，满心称快。

我做为一名中国托派成员，带着成见看中共的胜利，却产生不出胜利者的喜悦激情，有失落感。

六月，学校宣布提前放暑假，实际已有半个月没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解放军军部撤走后，刘晓率领的中共上海市党校的班子进驻了四层的教学大楼，不几天的功夫，他们在大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他们的学习与普通学校的学习不一样，他们先在大礼堂里听报告，然后分组在各个教室进行讨论。下午，各组成员都高举着红旗列队在大操场上集体活动，他们集拢了又分开，分开了又集拢，反复进行多次后，又集体在大操场一周一周地绕圈圈，一面还唱着歌曲，我猜想，他们在象征性的表演“来自五湖四海”和“万里长征”，等等。

解放军要在七月七日举行进城仪式，上海总工会号召并组织上海人民编成四路纵队与解放军并肩游行，可能是那时气象预报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根本不知道台风在上海附近登陆，开始时是风特大，刮得人够呛，继之是大雨瓢泼，冲



击得市民队伍溃不成军，四散躲雨，解放军的四路纵队仍然整整齐齐地在大雨中行进着。

上海解放后，“教联”就停止了单独活动，记得那时成立由章××（“教联”成员）为首的临时性指导小组，指导会员配合教育局的政令在各自的学校里进行工作。正始中学自文超走后，只我一个人是“教联”的，一天通知我到教育局中等教育司去。那时上海市教育局长是戴白涛，中等教育司是杭韦。中等教育司办公室负责人张弘接见了，她向我交待了一件任务：党校急于开学，来不及自建校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找到一所犹太学校，小了点，不适合他们利用，打算用来同正始中学调换，是暂时的，将来有了适合的校舍会迁走的，给我的任务是要我团结一部分进步老师和学生，动员全校师生同意暂换校舍。

很显然，她是根据“教联”的介绍，不知道我是托派，认为我是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信任我的。

我同她讲：“何必这样麻烦，你们下道命令不就行了吗？”我还向她解释：我到这个学校没有多少日子，资历太浅，团结动员的工作怕是做不好的。

她说：政府不好下命令的，这有个统战问题呀，杜月笙

现在在香港，何去何从，态度还不明朗，我们还要争取他的。

我一听，心里就发火了，同什么人都统战，就是不跟托派统战，我没有把话讲出来，只是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她还是很诚恳的态度劝我回学校试一试看，遇到什么困难，到时候再另想办法。

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是华侨，原在南洋教小学，抗日战争后期，她回到了祖国，投奔了中共在福建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抗战结束，国共和谈，中共在福建地区的武装力量被迁送到山东烟台。济南解放，她调到济南教育局工作，那时戴白涛是济南教育局长，上海解放后，她又被调到上海来工作。

看得出，是位热情投身革命，忠诚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不管我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有何成见，我还是为她的坦诚所感动，我回校按照她交待的办法试着办。

三位思想进步的戴老师、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没问题，听我的，我也找了几个仍住在学校里的学生谈谈，他们大都表示没有意见。很快，掌握实权的教务主任有了反应，他快速发聘书，三位思想进步老师都拿到了聘书，只有我没收到聘书，我被解聘了。

不仅如此，在教职员宿舍走廊的墙上和我的屋门上，都

有“打倒出卖学校的×××”，“驱除×××”的粉笔字。

我把衣物和书籍整理了一下，准备走人。

党校管后勤工作的姓马（飞海）的找到我屋里来，“教育局打来电话叫我转给你，请你去一下。”

在教育局中等教育司办公室见到司长杭韦和张弘。张弘先说“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听说了。”接着又劝慰了几句，我被解聘憋了一肚子气，这口气本想找张弘出一出，杭韦在场，我不好发作，我说“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就离开那里，叫我来有什么事？”

“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做出了另外的安排，由张弘同志同你仔细谈谈吧，我还要开个会。”杭韦讲完就离开了。

张弘告诉我：所谓情况有了变化，是已知杜月笙最近的动向，明显投向蒋方。所谓另外安排是指正始中学仍是杜家的财产，政府不动，学校停办，让党校借用。

我心里又要发火，早这么办不就得了，为了统战，弄得这么罗嗦！但我的火气又发不出来，她的年龄不比我大，她那爽朗的神态和干练的工作作风，使我吃惊，征服了我，还谈不上是爱慕，我确实对她有了好感。

“学校停办，老师、学生怎么办？”

“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呀。”

她告诉我：老师进行登记，学生也进行登记；老师可以填写两个志愿去的学校，政府根据情况安排他到任一志愿的学校去教书，学生志愿到那个学校就转到那个学校。这项登记工作交给我做，叫我自己不要登记。“工作结束了，我自然会安排你的工作。”这口气使我感到温慰。

她又告诉我：要我回到学校里找那三位进步老师，最好再找上几个学生，联合签名写一份要求停办这所学校的申请书，无故解聘人也是理由之一。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又憋不住要发火。

“这是项立案手续呀！”

为了出那口解聘我的气，我决定按照她的布置去做。回到学校，我就把申请报告写好了，要求停办这所学校的理由写了好几条，最后还写上与我当时的思想不相符的一句话：

“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前途计，请求停办这所误人子弟的学店”云云。天晓得！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什么内容？

三位进步老师听我的，都签了名。

报告送上去没几天，批准的文件直接寄达校办公室，并由校方转交我一纸指令，由我办理登记事宜。

校方主事的人和附合他们的人，审时度势，都悄悄离去了。包括三位进步老师共有五位老师进行了登记，他们都有

真才实学，他们都选择了较理想的市立中学，学生都转送到他们志愿的学校。

正始中学的撤并工作结束了，从打算调换校舍到决定学校停办，历时半个多月，任务完成了，解决了党校暂时找不到合适校舍的困难问题，张弘对党做了一件好事，而我却做了一件为人作嫁衣裳的苦差事！

张弘要派我到淮海路的一所市立中学教政治课，我不想教政治课，我推辞说：“我分送学生名单到奉化中学去时，蓝文瑞要我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张弘立即拨通电话，在电话里与蓝文瑞争执起来，张弘一再强调政治教员缺，好多学校都向她要人，蓝文瑞向她讲什么，我不知道。挂上电话后，张弘对我说：“你还是去老蓝那里吧，希望尽快把那个学校改造成市立中学。”

## 私立奉化中学——市立长宁中学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到私立奉化中学报到，这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学年。

私立奉化中学是蒋介石前妻毛夫人的侄儿利用抗战胜利后接受的一处有花园的敌伪房产改建起来的，位于长宁路华阳路口。是个行伍出身的人，办个学校，打出文化牌，在上海滩混混。自己不会办校，从天台县请来一位名士吴老先生全权主持学务，吴老先生一心想办出成绩，聘用知名教师和正宗大学毕业生来校任教，总务和财务操在毛氏私人手中。

中共地下党员蓝文瑞，复旦大学毕业，经人介绍给吴老先生，到奉化中学教生物课。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西区“教联”的负责人，在“教联”举办的联谊会上我同他认识的。与蓝文瑞到奉化中学同时，教美术的也是共产党员，据说在一次接头时失误被捕，牺牲了。上海解放前夕，毛夫人的侄儿逃台湾。上海解放后，吴老先生识时务，礼贤让位，蓝文瑞主持校政。实际上，在教员中，吴老先生还是有声望的，几个职员还是毛氏的关系，在解放的形势下，这些人只好看蓝文瑞的马头是瞻。

蓝文瑞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夫都是党员，他的父亲蓝公武

是当时政务院的政务委员，是老革命。

解放了，革命胜利了，社会地位改变了，进城干部和原在城市的地下党员，都意识到当家作主，心潮澎湃，为改造落后、贫穷、愚昧的旧社会，为建设自由、平等、文明的新社会而废寝忘食地整天忙碌着。我看到蓝文瑞天天到区里去开会，上午去，下午去，有时晚上还去开会，像是有好多工作忙不完的忙，他原来教的生物已请来一位女老师代课。我还看到区里的一位交通员，天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给他送通知公文，这些通知公文都是装在用旧报纸糊的袋子里，交通员向我讲，袋子是在空闲时间糊的，节约闹革命么，是位北方农村出身的工农干部。

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忙，才说通了张弘放我。他向我讲，在“教联”时，就对我印象好，知道我帮张弘撤并正始中学的事情后，他就更相信我能帮他的忙。我应当再替他增加一个理由：当时他不知道我是托派，只知道我是刚走出校门的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

他指派我担任初一到高三的全校地理课，同时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在大学我读的是历史系，对地理学和地质学也有兴趣，我有信心边学边教这门功课。在学校附近的愚园路上新开了一家国际书店，可以购买到苏联出版的有关地理教学用的图表（都是中文的），我充分利用这些大幅的图表辅

助教课，方便多了。那时正是一边倒向苏联，宣传苏联的时候，且苏联的出版物都带有宣传性，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张中国地理挂图就比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大四倍，虽然它把黄河入海画错了地方，但整个图挂在黑板上还是醒目的。

国际书店有大批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宣传招贴画，我弄来挂在校园里的墙上，三十多张一套的“列宁画传”挂在图书室的墙上，图书室里添置大批新出版的新文艺书和小人书，特别是小人书更受学生的喜爱。

老师和学生都误认我也是共产党员。蓝文瑞的党员身份是到一九五一年学校改为市立长宁中学同时宣布党小组建立时才公开的，从正始中学转来的四十多名学生早就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成了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

那时还是刚刚解放，社会上谣言很多，人心浮动，崇美恐美思想与疑苏反苏思想并存，受社会上的影响，在学生中，相信和拥护共产党的学生多靠拢我和蓝的一边，反之，有些学生与高中教国文的周老师等亲近，这样的学生在高三和高二都有。学生自然流露思想感情，老师们的思想情况复杂，大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会把自己伪装起来。蓝文瑞曾对我讲过，周老师邱老师等在解放前，思想表现反动。据我看来，奉化中学的某些老师都是思想问题，不像正始中学的某些老



师有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

学校附近的一家毛纺厂和一家棉纺厂的工会都要成立夜校扫盲班，要求学校帮他们解决师资问题。我和老蓝决定组织一部分高中学生去当小先生，思想进步的男女学生总是热情的，踊跃参加。每天晚上，我和老蓝分别陪学生到工厂去教识字课，受到了比他们年龄大的工人们的热情欢迎，学生们有了信心和兴趣。

一九五〇年，发动青年学生参军运动，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家长对孩子参军想不通，做这项思想工作是很吃力的。当时我是初二班主任，我班上没有，因为年龄不达标，调我帮高中的班主任做说服工作，我就遇上了个钉字户，高二班的一名学生一定要参军，他爸爸一定不要他参军，这位爸爸找到学校里来，由我接待，我先按照宣传提纲向他讲道理，他说，这些大道理都懂。我希望他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愿望，他要孩子尊重做父母的心愿。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敌对共产党，就是抱住一个传统的旧思想不放，认为当兵没出息，所谓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一场艰苦的磨嘴皮子的拉锯战，又一次为人作嫁衣裳的苦差事！

他的儿子坚决参军去了。

事后，我们把“光荣之家”的大红纸送到每位参军学生

家贴在大门口，只有这位反对儿子参军的爸爸拒绝贴在他的门上。没有想到，事隔半年之后，这位爸爸找邻居的学生家长捎话给学校，希望“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他家的门上。我组织了一群学生敲锣打鼓地把“光荣之家”送上门，他客气地请我到屋里坐，看到墙上有他儿子的几张军装照，部队寄来的证明文件，知道他家受到政府的拥军优属的照顾，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思想落后啊！”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两年间全国社会政治局势迅速地变化着，人的思想感情也随之起了变化，反对儿子当兵的爸爸相信他的儿子参军有前途了。

学校里成立了工会，教职员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了一个工会会员证的小红本本。选举杨念祖担任奉化中学的工会负责人。这位杨念祖老师到文革时遭了殃，他说江青的坏话被打成反革命，先判十年，他不服，又加刑十年，宣判大会是在市监狱里举行的，我在市监狱服刑，大会的广播中听到他的名字，我心为之一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我获得释放后曾去看望他，双手腕上留下了手铐的疤痕，他说被铐了十年。惨！

工会成立后不久，学校中共党支部公开宣布建立，三名党员：蓝文瑞、高三学生周久红和高二学生励汝年。这两名学生是党员我早就知道，我常看到他们三人在蓝的住室里开

小组会。

一些老师和学生看到我不是党员，感到奇怪。“老师，你不是共产党员呀？”接近我的学生带着满脸的稚气总这样问一声。我常向他讲社会主义是无剥削无贫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启发学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紧接着，私立奉化中学被批准改为市立长宁中学，教育局正式任命蓝文瑞为校长，全校师生皆大欢喜，在操场上庆祝一番，学生们竟把老蓝和我都抛上空中。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位中央大学的共产党员同学赵宏才在老蓝的办公室里，谈话很长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怀疑赵宏才是为我的托派问题来调查的，没有去同他打招呼。

我认为老蓝是从那时才知道我是托派的，但我注意到他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秋季开学，缺音乐教员和高中历史教员，他还同我商量，问我有没有熟悉的人，我把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的杨仁化和杨博的爱人赵宗智分别介绍给老蓝，他都接了。杨仁化是位无党派的普通同学，怎么认识她的已记不住了。赵宗智是山东大学学生，受杨博影响的托派成员，这一点我瞒了老蓝，她教高中历史课，一直教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为止。

一九五二年暑假，上海举行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全市是一个大队，又分成若干中队。蓝文瑞担任一个中队的队长，他已知道我是托派，我问他，“政治面目”一项我如何填写？他叫我不要填，这个问题“另行处理”。

他把另一所中学的十几位女老师同我编为一个学习小组，小组长是这所中学的校长，姓季，中共党员，解放前，参加“教联”活动时，我同她认识的。每个小组有学生代表一名，中队部还派一名华东革命大学的学员参加。

听了大队部的动员报告，又听了中队部对大队部动员报告精神的传达报告，又看了一部片名《思想问题》的电影片，这部影片内容很简单：几个青年人，各有一段不同的生活经历，因而成了历史问题，成了思想问题，经过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认清是非，划清界线，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干革命。

学习小组长综述动员报告的精神，讲解电影片的启示后，学员们先漫谈了两天，然后根据动员报告的精神要求，先分清什么是错误思想，什么是反动思想；而后再检查自己有哪些错误思想，有哪些反动思想。

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历史清白不等于历史清楚。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上没有问题，组织上也没有做结论，这种历史“清白”不等于历史清楚；有历史问题，组

织上做了结论才算是历史清楚。思想改造就是要每个人把自己的历史讲清楚，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后才把资产阶级思想划作反动思想），什么是帝国主义反动思想，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历史问题讲清楚，不管有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历史问题，甚至有血案历史问题，只要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交待清楚，一律当作思想问题处理，不追究政治责任，等等。

我在检查错误思想时，从手提包里拿了一包大前门香烟，我说：我出门时，包里带大前门，敬烟与朋友共，在家里我一个人时吸三炮台（比大前门贵的高档烟），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自私自利的，是虚伪的，是属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云云。几位女老师都笑起来了，其实她们并不一定是笑我，她们笑我把这种市民的小气大胆讲出来了，一位女老师当真事一样地帮助我，叫我把烟戒掉就好了。

查检反动思想时，我说美国有原子弹，我国抗美援朝，我担心对我国掷原子弹。我又拿出派克笔，认为是最好用的笔，我总结有恐美崇美思想，恐美崇美是帝国主义反动思想云云。

女老师们都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对我的思想检查提不出什么意见，小组长和那位革大学员对我提了几点意见，听得出是依照老蓝的安排。

思想改造的最后阶级是填写表格。政治面目一项，小组长填写了中共党员，一位女老师填写民盟，其他女老师和我都填写群众。如果把我同自己学校的老师编为一组，我填写群众，估计有些老师借了给我提意见的机会，会讲出对老蓝的不满。老蓝是解放前到这所学校的，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生活表现散漫甚至浪漫。一九五一年学校党组织公开之前，有些老师和几个高中学生还在他背后称呼蓝“咖喱”，上海话中这个词的意思我不懂，口气是轻视蔑视的。解放初那两年，他整天忙于校外的工作，我替他忙校里的工作，许多老师称赞我作风正派，这种话明摆着是反面批评老蓝的。把我编在别的小组，就避免了借给我提意见的机会产生些不必要的麻烦。我知道，有些老师肚皮里对老蓝的意见是很多的，这种不满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还是政治的原因，那就很难说清楚了。

把我编在另外一个小组，很明显也是让我过关，等待“另行处理”。至于“另行处理”的底细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网打尽”，我相信在那个日子之前老蓝是不可能知道的。

思想改造结束后，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学，我担任班主任的那班初三学生升到高一，我仍然跟班担任他们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是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的入读初中一年级

的，那时我就担任他们的班主任，跟到初三时，我发现对这班的每名学生都太熟悉了，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给这个班做班主任一直做到高三毕业，探索做班主任教育工作的经验，老蓝完全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我的地理课是从初一教到高三，<sup>我</sup>做班主任不受初中、高中的年级限制。

思想改造运动后，我发现思想改造是有成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彼此讲话谨慎了，动不动就发表议论的人少言寡语了，一些人对老蓝也变得尊敬和客气了。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监狱里从报纸上看到报导，电影演员石挥被打成右派，有人揭发他的反动言论之一，是他攻击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说把人改造成了“永远的微笑”。

## 八十五岁自述（四）

9

### 我被逮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饭后回到教员休息室同杨念祖打了几盘康乐球。蓝文瑞喊杨念祖去下象棋，我回到自己的写字桌看学生交来的周记。我是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初中三年级时，我也是他们的班主任。从初三时，我就规定他们每人自备一本练习簿，每星期日写一篇周记，星期一交来给我看。生活、学习家庭和学校的事情都可以写，同学之间有什么问题或对教课的教师以及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我明白告诉他们，要他们写周记的目的是帮助我把班主任的工作做好，他们听我的话，这件事情又新鲜，他们都乐于做。一年多来，他们的周记写得越来越好，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总是要处理的。有的是思想问题，我把我要对他（她）要说的话写在簿子上，周记成了我同学生们交心的工具，师生关系拉得更近。

党员校长蓝文瑞赞赏我的做法，他也正在阅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初期的几本探讨教育的书，他在求索新的育人道路。他同意我把这个班带到高三毕业后，再回到初中一年级带一个班到高



三毕业的计划。我打算经过二个、三个六年的轮回反复，熟悉孩子们在这一人生阶段的发育过程，摸索点中学教育的经验，我想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我正在批阅学生的周记，“是熊老师吧？”发现有两个人站在我身边。抬头看了一下，面孔陌生，一个是胖胖的大块头，年龄比我大，另一个瘦小年轻。“是的，有什么事？”“请到你屋里一下好吧？”（我的住室就在教员休息室的隔壁），他们随我进入睡觉的一间小室，关上门，“你被逮捕了。”胖子拿出逮捕证在我面前一晃。

我不感到意外，也不惊慌。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十多年前，我还不是托派时，就知道斯大林制造的几起莫斯科审判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右派、托洛茨基联合反苏案”。正是那些震惊世界的冤案才引起我的好奇，研究托洛茨基，读托洛茨基的书，信服托洛茨基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镇压托派的案件在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一出出地上演。

我既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中共政权下，不承认信

仰马列的社会主义是反革命，被逮捕是无法回避的事。

胖子留在我的住室内搜查，年轻人带我出来，嘱我不要讲话。蓝文瑞已站在我的书桌旁，看得出，他已事先知道今晚要发生的事情。我把几把钥匙交给他，又把钥匙圈上的一把小刀和指剪给了立在他身边的邓子爵老师。我默默地跟年轻人走出教员休息室，已是八点多钟，校园里静悄悄、空荡荡。出校门口时，看门的校工老王躺在床上还问了一声：“看电影去？”

走出校门口，马路对面有辆小汽车停在一家烟纸店门前，下午放学时我就看到它在那里，我走过去买香烟，女老板还抱怨这辆车不前不后地堵在她的小店门前，没想到这辆车子停在那里是等我的！

车子开了，年轻人拿出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是公事”，又说“刚才不铐是给你面子。”

车子一直开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院子里小汽车排成长队，我意识到被逮捕的人不少。车子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开进第二道铁门，开铐后下车。在聚光灯照耀下站了片刻，把我送上大楼的三楼，靠西头的一个房间，门上有个小小的方形洞口，洞口边挂着一个白漆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十八号”，从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十八号”就是我的番号。

进了门，门在我的背后哐啷一声关上，上了锁。世界留在门外，从此我失去了自由。

哨子声把我弄醒，天已大亮。室内的墙壁像是粉刷不久，雪白。房间大约有十五平方米，西墙上有两扇带铁棂的玻璃窗，窗台高过我的头，只能抬头向上看，蓝蓝的天空，缓缓浮动着的白云。

三年来为恋爱受挫折而烦恼、苦闷，心灵上的创伤难愈合。精力和时间全花在学校工作和孩子们身上，以图稀释精神上的苦痛。

铁门锁上了。爱与恨，都化成了绵绵无尽期的如烟往事。

## 受审与判决

被捕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突然听到大楼里有好多好多人唱起了《国际歌》，接着是责斥声，开门声，被拖拉者的呼叫声，喧嚣了一阵后，又突然寂静下来。

在共产党的班房里唱起《国际歌》，滑稽、幼稚，我感到悲伤、迷惘。

一九五三年元旦后的一天晚上，把我叫醒，带我下楼，送进一间预审室。气氛紧张，预审室外站着两列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我是从他们中间穿行的。审讯台后坐了两个人，中间的年纪大，看上去四十多岁，他右边是持笔的记录员，他左边是个胖胖的年轻人，在审讯台的左侧还有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站立着。

中间年纪较大的人问过我的姓名籍贯后，站立着的公安人员讲：“他是你们的承办人，我是公安局的。”他说话有点结巴，他继续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们的政策。你要老老实实在地交待罪行，争取宽大处理。”之后又补上一句“苏联格别乌的利害，你们是知道的。”中间坐着的承办人接着讲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你不要存幻想，你们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我们不要你的材料，我们要你的态度。

接着，左边胖胖的年轻人和公安人员又重复讲了些类似的话。公安人员还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中间坐着的承办人：“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看看你老实不老实。”一个问题是要我讲出在学校里发展了几个学生，用他的原话是把几个学生“拉下水”；另一个问题是要我讲一讲在南京同国民党高官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是如何勾结的”。

我一下被他问懵了，“拉下水”，“勾结”，这全是没有的事，我作了否定的回答。

承办人：“不要紧张，读过哲学书吗？客观存在是不能否定的。你不要以为你在学生中有威信，做得巧妙，我们会教育他们的，他们明白过来了，不会讲吗？”

我做了解释：一九四九年公安局破获临委会时，要我们不要再搞组织活动，我遵守了，我在学校里没有发展学生。学校里希望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生以为我是共产党老师才同我接近的，我鼓励他们参加青年团（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概是一九五三年以后才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公安人员：“你不要强辩，我会拿事实给你看！那就对你不利了。”

胖胖的年轻人：“你不要害怕。讲清你同国民党高官的‘勾

结’，对你是有利的，你可以立功。我们要从你身上证明‘托匪帮’同国民党的‘勾结’关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它的欺骗和毒害。”

公安人员：“我们培养你做典型！”

我顿时惧怕起来，是不是要复制莫斯科审判案？！莫斯科审判案都是无中生有的。

他们的信心十足，态度和蔼。最后叫我好好地想想，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患得患失，等等。

回到囚室时，值班人员吹响早晨起身哨子。

刚刚吃过早饭，又提我下去受审。

审讯台只坐了两个人，记录员还是原来那位，审讯员是个年轻人，瘦瘦的面孔绷得挺紧。对我怒视了好半天才发话：“我们要你考虑的问题想好没有？”

我迟迟没有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他。

是个性情暴躁的人，整个上午，训斥、责骂、拍桌子，就差一点没有下来打我。在他怒不可遏时，记录员跑下台来，把木椅扶手上一块横铁板狠狠地扣上，以示对我恐吓。审讯员一个劲地：

“说！快说！”这样地审讯持续到下午，他突然喊着我的名字：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回去好好考虑，如果你再是这样的话，

我先整你的态度，我关你五年再问你。”

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像是获得一个信息：不会是复制莫斯科审判案，如果复制的话，还用着关我五年？屈打成招就是了！从这句里我也听出，不会用刑审的。

吹哨子睡觉的时候，又提我下去受审。我决定实话实话，不再拖，免得关我五年。

台后坐的是初审时三人：记录员、承办人、胖的年轻人。那位公安人员不在。

胖的年轻人先开口：“我给你看三份材料。”

记录员拿着材料走下台来。

拿给我看的第一份材料，是写在几张报告纸上的，题目是《我交待》三个字，姓名签在题目下方。我看了头一页，他就从我手中取回了。

拿给我看的第二份材料，也是用报告纸写的，页数比第一份多，题目是《我控诉》，也签有姓名。我看到第三页时，他又从我手中收回了。

第三份材料是一张信纸，信首写了我的名字，信文只简单的几句话：“我们错了，我们应当把问题交待清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信尾有签名。

三份材料的字迹，我都认识的，都是熟人的字，不是仿写的。

三份材料收回后，承办人：“我们给你看材料，还是为了拯救你。比你老的，比你小的，你同辈的，都明白过来了，就只你顽固！”

我讲：“你们要我回答的两个问题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先把学生的问题讲清楚，我认为你们是根据斯佩瑶提供的材料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她随便问我，我开玩笑地回答了她[详记于“自述”（三）末节]，她信以为真了……”

我讲到这里，承办人忽地站起来，又低头在桌上写了点什么后，走了。

胖年轻人：“客观存在是不能否定的，现象反映本质。你把同国民党高官的关系说说看。”我注意到他没有用“勾结”两个字。

我说：“他没有去台湾，现在还在南京，去年春节我回南京过节时，还去看望他，同他的关系，说来话长，还是让我写一写吧。”

“那好，那好，要写得详细。”

我回到囚室不久，记录员就送来一札报告纸和水笔。

在这里，我简略地记下这个所谓“勾结”的故事。



所谓的高官，正好姓高。高传珠号敬斋。国民党第一批保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员，北伐时期回国，在蒋介石第一军做政治工作，以后一直在南京做官。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书记，抗战结束后，到济南任王耀武当主席的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我父亲同他是小同乡又是中学同学，是世交老友。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喊“高伯伯”。一九四四年我到重庆后曾去看望他，战时异地相逢格外亲，他和夫人都把我当子侄看待。一九四六年我随校复员南京后，常到他留在南京的家中帮他夫人买米买煤球等家务事。有一次他从济南回南京，说要约见几个中央大学的山东籍学生，看看有没有人跟他到济南工作。他要在家请客吃饭，要我帮他招待。在他约请的中大同学中，有三个是三青团头头，在历次学运中，我同他们站在对立面，相逢不相识。他们被约请，没有想到我会在高家。我利用机会，充分演出了小主人的角色，敬烟奉茶。我有意避开他们同高的交谈，吃饭时我同高太太及其子女们在一桌。饭后我再敬烟奉茶，他们告辞，我跟在高及夫人的后面送他们出门。从那以后，三个三青团头头与我相遇时，都主动颌首致意。官本位社会的奴才相。

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就听说他们三人中有人在南京被捕了。承办人要我交待“勾结”问题时，我就想到了在高家演小主

人的那出戏，因此，我才有恃无恐的同那位性情暴躁的年轻审讯员僵持了一个上午和下午。

报告纸写了十多张交出后，很长时期没有提审。

三月五日斯大林突死后，才又开始了频繁的提审，是那位性情暴躁的年轻人承审，关于学生“拉下水”问题，关于“勾结”问题，都没有再提及。

每次提审，这位年轻审讯员都是板上面孔，对我怒目而视。常常引用些诬陷托陈派的“材料”训斥我。有一次提审时他停下来，叫记录员把康生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次基匪徒》给我看，之后又拿来一本书，翻到鲁迅《给托洛茨基信》给我看。有一次提审时他愤怒地说：“温州托匪分子放火烧了一条街！”这位年轻审讯员深信不疑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对托派做的结论：“……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杀人凶手的匪帮，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当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结论给中国托派所做的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因此，他把我看做就是这样“可恶”伙中的骨干分子。

那位承办人也还审问过，不是在预审室，而是在一小房间里，一大沙发和一小沙发，两沙发间放一长条桌，让我坐小沙发，他

和胖胖的年轻人坐大沙发。不是提审的口气提些问题问我，在谈到我在重庆和南京中央大学活动的情况时，他突然插入一句：“曹惠白不是受到你的思想影响的话，她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啊！”我连声说：“是的，是的。受我影响的好几个人，原来都是倾向共产党的。”他们问我对自己的评价时，我说：“我也是从倾向共产党而转向托派的，我主观上是革命的。”承办人带有警告的口气说：“现在我是理解你们的，将来我们的青年人是不理解你们，也不会原谅你们的。”两个“不会”的话音很重，显示他们反托的信心十足。

历史无情！斯大林给托派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中共根据斯大林的话给中国托派做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现在改写：“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一九九一年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六页注九）。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下级根据上级的论断做出相应的结论，是政治组织原则问题。共产国际早在一九四三年就被斯大林解散，有无“错误论断”，也无法查考，中国托派就至今仍压在错误论断的谎言大山下。

一九五三年底，把整理好的审讯记录拿给我看，然后签字，对我的审讯结束。

一九五四年整整一年没有提审，一个人被禁闭在囚室里，除了吃喝拉睡，每天的日子寂静得可怕，囚室像一口棺材。窗台高过我的头，抬头透过玻璃窗望出去，只能看到天空浮动的白云，远处传来微弱的市井嘈杂声。常常想着我做班主任的那班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做他们班主任一直做高中一年级。他们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以及家庭情况，我都熟悉，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我教他们信仰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曾带他们去参加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万人大会。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时，我曾带他们去梅林厂参加揭发批判不法资本家的大会，回校后，他们天天模仿那个不法资本家在麦克风前向群众交待问题，哆哆嗦嗦地只会讲“水牛——黄牛”、“公鸡——母鸡”时的滑稽相。（抗美援朝时，梅林厂制造牛肉罐头和鸡肉罐头供应志愿军，资本家用水牛肉冒充黄牛肉，用公鸡肉冒充母鸡肉以获取高额利润，运动一来成了不法资本家被揭批）。我被逮捕了，学生们怎么想法，怎么看待我，无法想象。

在中学读书时，教国文的李老师讲解唐朝诗人骆宾王的《狱中咏蝉》，因为老师说是好诗而当好诗背诵熟记。自己被禁于囚室，命运未卜。“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sup>同诗人</sup>遭受诬谄被投入狱中的心绪和感受是相通的，但我比

骆宾王幸运，他不堪思念妻子而愁白了头，我无妻儿牵挂，不愁。

一九五四年夏，一位女工作人员开了我的囚室门，招手喊我跟她到一预审室，桌前一凳，叫我坐下，她到桌后坐下，不像是审讯。

她说：“我们关你半年，让你好好反省罪行。现在有什么思想？”

我无以答，也不知如何回答她所问。我无言地坐着，眼睛看着她前面的桌沿，我知道她居高临下地直视着我，僵持了很久。她说：“回去吧，回去再好好想想。”口气温和，她又把我送回囚室。

囚室门上有书本大小的一个方洞口，有小门，每天值班干部常打开小门，从洞向室望望。第二天早晨，小门打开了，洞口出现的是那个工作人员的面孔。她向室内望望后，从洞口送进一张报纸来，是七月一日的《解放日报》。过一天，送来七月二日的报，把一日的要走，从此我天天有了报纸看。

报纸正大力宣传过渡总路线，我顾不上思考这个问题，每天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命运问题，案子如何处理问题，为此，手里拿着报纸看，时不时地也会走神。

十月一日国庆节，午饭都吃过了，还没有送报来。我正在纳

闷，门开了，管理干部带我到那间预审室，一位带眼镜的干部坐在审讯桌后，叫我坐下，他问我：“看了三个月的报纸，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现在有什么思想？”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所问，无言地坐在那里。

僵持了很久，他说：“回去吧！再给我好好地想想！”语气重，带有训斥声。

第二天，没有人送报来，从此又没有了报纸看。

一九五五年元旦把我调到一个大房间，屋里早有几个犯人坐在那里。独居一室已两年，乍一进入多人的屋子，感到怯生生的。管理员和国庆节那位带眼镜的干部指定了我的座位后，关上门走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告诉我，那位带眼镜的是看守所的训导长，掌管犯人的思想情况，他又向我讲，他是旧警察，留用人员，做公安，镇反时候贡献不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等等。没等他讲完，房门上的监视小窗打开了，出现了管理员的面孔，把我喊过去，问我：“他在讲些什么？”我如实地述说了一遍，洞口又啪的一声关上了。做过中学老师的知识分子，我觉得人格上受了屈辱。

坐在旁边的旧警察喜欢唠叨，据他讲，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大案子的，一旦调到多人的大房间，就是结案等待判决。不几天，

一个人被调出，据说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态度顽固，声称要为党国尽忠。旧警察估计说：“看来这个人要被敲掉了！”以后又有一小青年调出，他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是几个结伙打群架的头头，没有政治头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管什么党，我们工人就是靠力气吃饭。”旧警察说“打群架在旧社会也是犯法，要被抓的。这个人至多是送去劳改。”有一天，这位旧警察被调出，他笑嘻嘻地拿好自己的东西，用筷子挑着他那条湿毛巾，走了。

五一节后的一天，叫我把东西拿好，跟管理员走到一楼，把东西放在一个小房间的地上，领我到一预审室。那位戴眼镜的训导长早已站在审讯台后。“现在对你宣判。”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

### 沪军法判（55）市字第 00 三四号

被告熊安东，又名熊永济、陈国瑞、路源，男，三十一岁，山东省惠民县人。

被告熊安东，一九四一年在四川参加托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后，积极在在在学生中散布托匪谬论，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为首组织托匪‘支部’，又在各大学积极活动，一九四八年出席

托匪‘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一九四九三月潜入本市，又充任托匪‘江浙党团临委会委员’，直接负责领导上海托匪活动。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十月‘江浙党团临委会’破获，该犯漏网拒不投案，又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为首纠集残余托匪建立‘中心小组’，并与托匪中央保持联系，搜集我国内军事政治情报等反革命活动，妄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五五年一月 日

“搜集我国内军事政治情报”、“妄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等语纯是莫须有的“推定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获无期徒刑，首先想到的是我永远见不到我的生母，还不如判死刑好。我才三十岁，不比六、七十岁的人，判无期比死刑更残酷。

一九六六年十月，郑超麟挨批斗时，政府安排我们托案小组的学习小组长和我，与郑超麟三人同住一室。大概是为了做郑超麟的思想工作，在囚室里，学习小组长对郑说：“批斗你，我体会是政府挽救你。”为了说明他这一体会，他讲了在判决前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四年，一位女干部找他谈话，问他对自己的罪行



有什么认识，他做了表态的回答。女干部说：“有这样的认识是好的，以后还要深入反省。”从那以后，每天他有了报纸看。以后，又有一位干部找他谈话，问他的思想情况，他又做了表态的回答，并称颂过渡总路线宣传。这位干部对他讲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们对你们的政策，是摧毁组织，挽救个人，改造你们的思想，无论罪大罪小，首先要认罪才能求到改造，认罪并不等于不受惩罚、判刑，刑期不是死的，监狱门的钥匙，是操在你们自己手里，要争取，等等。小组长又说：当听到判无期徒刑时，他心平气和，认为是罪有应得。联系判刑前，政府干部同他讲的话，他认为无期徒刑就是无定期，只要认罪，好好争取。小组长确实表现积极争取的。当时郑超麟对小组长讲这番体会的话，听得进或听不进，或有什么感受，我无法知道。但郑超麟在挨批斗的前一年，即一九六五年，写的《蓦山溪》词中有：“不见旧相知，竟低头，然  
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  
学习小组长和郑超麟同样关押二十七年。

## 入 监 服 刑

判决后，立即把我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

提篮桥监狱是租界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盖的，有八栋长方型的五层楼关押男犯，还有一栋女监，另外还有做劳改工厂的两栋楼，还有医院楼和伙房楼各一栋。

我被送进一号监，一号监是重刑犯，多数是无期犯，还有死缓犯和死刑待处决犯。

每层楼面有六十多个小监室，面积大约一米半宽二米长，每室关三人。初入监时与我同室的二人，一个叫杨广文，判无期，是闫锡山军队的文职军官。一个叫王国权，判十五年，是上海某大工厂的黄色工会理事长。解放前，民主人士在南京路的劝工大楼聚会，反动派调集各工厂的工会理事长冒充工人，冲散集会还打死了人，梁仁达被打死，是解放前的一桩血案。解放后，这些工会理事长凡是留在上海的，全部被抓捕，镇反时，凡无法证明那天不在场的都被镇压。王国权是一个足球队的主力队员，那天恰巧去无锡赛球，有球队证明，又有无锡地方报纸当天报导的球员名单证明，他留下一条命。他是个运动员型的人，头脑简单，为人正直，知道我是初判入监，处处都关照我。

入监后不久，监狱里召开了一次“认罪服法奖惩大会。”有

减刑的，有加刑的，还有两个早已判死刑，当场宣布立即拉出去执行的，会场气氛极具震慑感。宣判后，监狱长做了长时间的教育讲话，反复宣讲认罪服法、改恶从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语。

散会后，一号监监长指定我做犯人的学习小组长。五个小囚室是一个学习小组，平均十四、五人，回到囚室我问杨广文和王国权，当学习小组长如何当法？他们告诉我，这个小组的犯人有历史反革命，也有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文化程度都不高，前一个学习小组也是知识分子，同他们两人同住一囚室，在我入监前两天调走。文职军官杨广文向我讲：“调你来当小组长是给你一个争取的机会，要多向主管汇报思想，自己的和别人的都要汇报，对与不对，由主管判断，错了也可以得到政府干部的教育”等等。王国权向我讲：“你是知识分子，有文化，当学习小组长首先要把教育大课内容记牢，向小组传达。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发言，你都要记录下来，整理好，交给主管就行了。”

邻组的学习小组长姓孔，是东北人，山东口音，老乡见老乡，放风的时候，他走近我拉近乎：“你一来就派你当小组长不简单啊！是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多汇报，勤汇报，向政府交心……。”从此以后我注意到，只要有机会，他就去主管那里

汇报，尤其是在放风的时候，他常是同主管讲好半天。他向我讲：只有这样向政府表忠心才能获得减刑宽大，云云。

那时我年青，记性好，头一次大课我虽然没有做笔记，但大课内容我还能传达了一个上午。小组犯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这个新小组长，安静地听我讲，使我一下子忘却身为囚犯，好象回到了学校课堂的讲台。第二天上午学习时，小组的犯人都争先恐后地举手要求发言，我认真地记录。一轮发言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交上去，回到囚室，我问王国权：“明天上午学习怎么进行？”

“你把大课内容再讲解一遍就行。”我把大课内容重复传达一遍，又是一轮发言，我认真地记录，记录整理好再交上去。在整理记录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的发言同第一轮的发言几乎没有多少字句改变，他们都各自讲一遍认罪服法、改恶从善、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的套话。所谓认罪就是帽子戴得大，大到看不到人，都玩弄抽象认罪又具体否定的把戏，用剪刀杀妻判无期的一个犯人，未发言做出痛苦万分相，承认用剪刀杀死妻子是罪大恶极、万恶不赦的罪行。同时又说，如果妻子不同他争夺剪刀的话，他不会杀死他的妻子的，因为他们是很恩爱的，判他无期，他认为是对他宽大，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我要好好争取重新做人”云云。文职军官杨广文的发言，又有别出心裁的一套

言论，他说他不仅要认罪、服罪、悔罪、还要守罪。当我听到他的“守罪”一词一出口时，我立即想到节孝坊下那些可怜可悲的“守节”灵魂。他说他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的反动军官，他所在的部队败退时，败军如山倒、失控、士兵抢劫、强奸，把个小县城糟蹋得不像样子。他说他本人虽没有作坏事，但做为军官不能不为士兵的行为负责，判他无期徒刑是对他的宽大，所以他不仅要认罪、服罪、悔罪，还要守罪，彻底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云云。

一入监就指定我当学习小组长，就像把一个圈套套住我的脖子，我被投入“认罪”机器加工厂进行加工。在这些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人面前我不能讲不认罪的话，不能讲我是信仰社会主义而与共产党政见不同而判罪的真话，入监时已告戒我在犯人中不准暴露托派案情，在我表态发言中，我说我有罪，有“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幻想美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这些正是我被捕后受审时那位年轻的审讯员常挂在嘴巴上训拆我时的用语）。我也说：我要深刻领会大课教育精神，加深认罪服法，认真转变人生观和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等等。说大话、空话、假话和套话是无知、狂妄又思想贫乏的时代现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圈套中。

## 初尝劳动关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年中，我被编组到摇纱车和经纱车间劳动改造。

摇纱是用老式的手摇纺纱车把纱线绕到纱筒上供应经纱车间经盘头用，每天十小时摇下来，右肩、右胳膊、右手腕都酸痛肿胀，是项很辛苦的劳动，知识分子初尝劳动关，虽苦，咬咬牙不言苦。比起判无期徒刑，导致心灵上的伤痛，这肢体的苦还算得什么。

摇了三个多月纱，车间主管江队长调我到经纱车间劳动。经纱车间的产品是经纱盘头，是供应织造车间织毛巾被用的，经纱机由马达拖动，体力劳动不大，但技术要求高，责任心要强。三、四千根纱线，像瀑布流水一样地卷到经纱机的盘头上，眼睛要死盯着根根纱线，不能有一根断头，有断头立即关马达，把断头接上，不能搭在别根纱线上带进去，不然会给织造车间造成麻烦。我和一位经纱老师傅挡一部经纱机，我跟他学技术，这位老师傅原是一家针织厂的技术工人，因为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肃了进来。刑期不大，只判十二年，因有技术，没有编队去外地劳改农场，留在狱内劳动兼带徒弟。他沉默寡言，工作认真负责，我

们这部经纱机是部老爷机，转动不均匀，几千根纱线卷在盘头上不平整，会影响织毛巾被的质量，这位老师傅向主管提合理化建议，用报纸随纱线一道卷进去填平整。政府干部采用了这条合理化建议，需用的报纸是监狱办公楼里的旧报纸，有一、二年前的，也有二、三个月前的。我被捕三年多来，没有报纸看，不知天下大事。我和同车间同案的夏建勋在劳动的空隙间，偷偷地翻看旧报纸，报纸虽然零散不连续，还是知道了三年多来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当时引我注意的有下述三个问题：

（一）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为自己生产，劳动热情大，积极性提高了，全国农业呈现一派迅速发展的趋势。但是小块土的所有者，在自然灾害面前和自身的生产手段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报上有“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的说法。出卖土地、出卖劳动力的现象又发生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有了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报上说：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猛地建立起来了。

（二）从一九五三年宣传过渡总路线，到一九五五年底，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元旦，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各界民主人士，北京

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了。”

对于从一九五三年宣传总<sup>线</sup>路，到一九五五年底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原来宣传需要十五年）而转入社会主义道路，我是想不到的。我虽然已身为托派囚犯，看到报纸上的宣传报导，我还是高兴地喊：“好！”同案的夏建勋说：“早知道（中共）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就不干托派了，”这话反映了当时托派青年人的思想动态，听到社会主义，就错把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当做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了。

（三）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翻出了斯大林问题。我是从旧报纸上看到米高扬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引起注意，米高扬在发言中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罪错，使我感到惊讶的像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在斯大林在世时都已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尊崇斯大林为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高呼“乌拉”，称颂斯大林是他们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刚刚死去三年，这些斯大林事业的继承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揭批斯大林的罪错，使我联想到托洛茨基从二十年代开始抨击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和错误路线而演变成世界性的托派运动，联想到三年前被捕后，在审讯室那位年轻的审讯员把斯大



林导演的莫斯科审判案资料给我看，对我进行所谓教育，之后判处我无期徒刑。作为一个囚犯，在偶然的机会上，我偷看旧报纸，得知苏共二十大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心情很不平静，思想却很茫然。

旧报纸堆放得零乱，我还是尽可能多翻看，想多知道苏共二十大开会的信息。我和夏建勋始终没有找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天早饭后开工前，我又借了经盘头准备报纸偷看报纸，车间主管江队长突然走来喊我和夏建勋拿好自己的东西（吃水杯和毛巾等物），送我们回一号监。“做贼心虚”，是不是因为我们偷看报纸被人打了小报告？我很是忐忑不安。

回到一号监，一号监的主管又叫我把所有的东西拿好，送我到五号监的五楼，到了五号监五楼才知道是要把托派犯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缓了口气，知道与偷看报纸无关，我的心平静下来。

## 一九五六年的参观学习

10

分散到各劳改单位的托派犯人都集中到五号监五楼，大约四十多人，有些是我认识的，半数以上我都不认识，被捕前不曾见过。整个五楼楼面没有其他犯人，我们是两人住一小监室，照料我们的专职主管一位姓徐一位姓路，他们的管理较宽松，有了报纸看，当天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各两份给我们轮流看，我拿到手的报纸，都一字不漏地浏览一遍，想多知道些有关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报导。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把我们召集起来，监狱长向我们正式宣布，政府组织我们在上海地区参观，并且说：“组织你们参观，到外边去看看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的建设，其目的为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你们看看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托案承办单位负责人也讲了话，也说：“不是要一棍子把你们打死，我们要改造你们的思想。”他要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要用心地看，好好地听单位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做好笔记，参观回来后要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学习等语。

判了刑，又组织我们参观，确确实实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但听到讲话，我心头还是泛起了一种说不出瞒不住的情绪，判无期徒刑不是一棍子打死？

把我们四十多人分成三个小组学习了五天，漫谈和领会监狱长的讲话精神，我们都讲了些表态话，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参观教育的学习机会。

参观进行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参观一个单位，参观了重工业的电机制造厂、造船厂、柴油机器厂等，轻工业的纺织印染厂、造纸厂、新谊制药厂等，还参观了一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一所大学，工人新村，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商店等。

参观确实开扩了眼界和思路，大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是壮观的，平时在街上商店里看到的花花绿绿的花布，在纺织印染厂里看到了从棉花、棉条、纺纱、织布到印染的全部生产流程，对工业生产有了清晰概念。在重工业工厂的车间里一个个庞大的生产流程，看得令人兴奋，看到一部部组装完成的机床、车床落下生产线，这些机床、车床又成了新的生产力扩大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在资本家私人手里，为他增殖利润，是资本主义；收为国有或公私合营，所有制改变了，说是社会主义。“你们看看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搞社会主义”，“不是一棍子打死，是要改造你们的思想”，于是有了给犯人参观学习的“创举”。当时我最最想不到的是，十年后，在更加大搞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兴起了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那位向我们讲过“看看我们共产党是不是搞社会主义”话的监狱长，被监狱里的革命造反派打倒，打成走资派，

关押到一号监一楼一间小监室隔离审查，那时我正在一监五楼的油漆加工车间，为上海十二机床厂加工油漆“三五”牌螺丝刀的刀柄，我是劳动小组长，常到一楼送成品和取加工原材料，曾走过他被关押的小监室门前。同是沧桑沦落人，无言话洪荒。

在参观过程中，我注意到工厂车间里的工人都很勤奋认真地劳动。

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给我们作报告，报告的内容大都是说解放前在帝国主义经济和官僚经济挤压下，生产濒于破产，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造取得了那些显著成就等。报告听完后，允许我们提问题，我们中有的人就根据自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提些问题，如参观曹阳新村（那时是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即现在的曹阳一村）时，有人提出：“是不是劳动模范才能住工人新村？普通工人能不能住？比例占多少？”报告人如实回答，劳模占比例大些。又如在纺织印染厂，报告人在报告中说到厂里工人人数和职员人数，有人就提出：“脱产人数比例是不是大了一些？”报告人回答：“职员不是完全脱产的。”总之，我们不相信斯大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因之，对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学苏联模式搞的社会主义存有疑问。

参观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我相信组织起比单干好。同时我也存有疑问，没有拖拉机，没有电力，生产还是靠人力和畜力，

生产力能提高多少？这样能建成社会主义？

参观结束后，写好个人思想总结交上去，判五年、七年徒刑的离开市监狱，分别回到他们原来的劳改农场或劳改工地上去，据说他们将会提前释放或刑满留场当职工。判十二年以上的二十多人仍留在市监狱，我们仍然集中在一个楼面上，不参加劳动，每天读报或分成两个小组集体学习半天，其余时间自学。这时才听说，我们是寄押在市监狱的，我们的学习由承办单位掌管，监狱仅派两位专职干部照料我们的生活，除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又添了《人民文学》和《人民画报》两份月刊给我们看。姓徐的主管对我说过，他的家就住在福州路附近，如果想买书，他可以替我们去买，他大概是学生出身，有一定的文化和政策理解水平。

在一段时间里，我跟曹家骝自学俄文，我给我父亲写信，给我寄来了几本俄语读本和《俄华小辞典》。我搬着《俄华小辞典》读俄文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和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又组织我们留在市监狱的托派犯人到人民广场观看国庆游行，我们被安排在一家靠广场的旅馆三楼阳台上坐着观看，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旗帜招展。游行队伍通过主席台后，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这已是第六个国庆日，与一九

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那三个国庆日游行相比较，现在的队伍阵容更整齐、壮观、华丽。四年前我是在游行的队伍中，且是一个单位的游行组织者，现在我被打成人民的“敌人”被组织来观看人民的庆祝活动，“接受教育”，“转变立场、观点”，“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恍恍惚惚地看到化工学院的学生队伍缓缓地走了过来，清楚看到小俞的妹妹擎着“化工学院”横幅走在队伍前头而引起我的注意。我同俞益敏的妹妹互不相识，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我朋友家见过一面，我从朋友那里知道她是受托派少数派影响的一个中学生，她正在影响我朋友的妹妹，她们是中学同学。我看到她走在进行的队伍中，知道她幸免于被“一网打尽”的厄运，我推想我朋友的妹妹也不会遭受厄运，我为她们高兴。小俞也坐在阳台上观游行，认证我没有看错，是他的妹妹。化工学院队伍之后，是全市医院护士组成的白衣战士队伍，队伍肃穆感人；接着是千名红领巾方阵，小朋友们迈着碎步奋力行进着，稚嫩的童音呼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可爱的祖国花朵。指挥车驰来，用高音喇叭呼叫：“前面队伍走慢点，小朋友的步子小。”文艺界的彩排车队跟在小朋友队伍后缓缓地移动着……

眼前忘却身是囚，与人民同庆同欢。

## 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参观使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处理托派问题同苏联的做法不完全相同，具有中国特色。苏联斯大林对托派就是杀害，肉体消灭。中国共产党让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教育”我们转变思想，不要再怀疑或反对共产党。有两位比我小几岁的同案曾说：“早知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我就不干托派了。”这话中有说不出瞒不住的悔恨情绪。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尖锐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中国共产党于四月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当时我们托派都分别在劳改工场劳动，没有正式看到报纸，没有看到苏共二十大的文件，也没有看到中共的上述一文，直到六月，我才有了报纸看，《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的单行本，人手一册，发给我们看，要我们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文件“认真批罪”之谓也。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东欧发生了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长文。

学习这两篇论专政经验的文件，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袒护斯大林的立场上，把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辩解成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问题，特别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颂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列宁主义的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斗争中，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等等。

这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看法不同。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败坏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败坏了列宁的苏维埃制度，许多国际和国内问题上执行了一系列错误路线和政策，斯大林代表特权官僚层的利益，用格别乌制度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个人独裁专制。炮制莫斯科审判案，杀害了整代忠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我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看过），我只是从报纸上摘引的文章中，猜知“秘密报告”的要点。像赫鲁晓夫、米高扬，这些苏共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在世时，都赞颂斯大林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再生父母”，斯大林刚刚死了三年，他们就反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这就反证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到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是正确的。

对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面，《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直面反对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而是直面反



对铁托和南共其他领导人的言论，对他们发表的反斯大林的言论表示震怒和愤慨。因为铁托等人的言论不仅限于批判斯大林的黑暗面，并且指责斯大林问题是政治制度问题，说斯大林的党是官僚专政的化身。

我蹲在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件，对斯大林问题不能坦述真实思想，只能按照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调，讲套话，讲假话，不敢讲一句实话，在认罪机器加工厂的磨床上经受碾磨。

同案件的沈文铃和林华，他们都是原判五年徒刑的，一九五六年参观后，他们都调回他们原来劳改的场所，他们都可获得提前一年释放的，但在获知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信息后，他们在其他犯人面前讲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我才吃五年官司”一类的话，被其他犯人当作不认罪的黑材料，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出来，他两人以“污蔑伟大革命导师、不服从管教”等罪名各加刑十年。

## 狱中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关在市监狱的二十多名托派仍然集中在一个楼面，两人同住一室，不参加劳动，不布置任何学习课目，每天除了读报纸（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就是自学，似有目的又无计划地自学，消度狱中漫长岁月。我和温州人陈莽同住一监室，我仍旧自学俄语，背记俄文单词，陈莽天天有腔有韵地低声背诵古诗词，显示他在这方面很有功底。陈莽被判刑十五年，他性情善良，沉默寡言，旧知识分子气息重，他的女朋友是个山东姑娘，他们尚未结婚，我早就认识她，对她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知道她有个男朋友，但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就是陈莽，这么一说起来，我和陈莽拉近了距离。一九六四年，陈莽被编队去青海劳改农场，后来病死在青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获得释放回上海后，在一位老工人朋友家中得知这位山东姑娘一直在等着陈莽，不知陈莽病死，她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教小学直到退休，孤独一生。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不平常的，报上宣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宣讲知识分子问题，宣讲共产党整风问题，报纸上报导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请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

周恩来为了号召争鸣，跑到杭州说：“我是来拆城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股不正之风，使人民同共产党隔了一道城墙，共产党决心要拆掉这墙。

五月一日开始整风运动，报上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我关押在监狱里，好在天天有报纸看。

报纸上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文章，并且是在党报上，这是解放后头三年我在社会上时不曾见闻的事。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知识分子都是带着挨整的心情去学习，学着说共产党好不说共产党坏的话，所以有了“歌德派”这一名词（不是德国名人歌德，而是歌功颂德的“歌德派”）。

一九五七年正相反，五月报纸上出现了都是批评和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这类文章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大。有些党外人士，在解放前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他们大多数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和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希望破灭，他们不容于国民党的统治而遭受迫害，他们逃避到香港。共产党取得内战赢局，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投奔共产党。

一九五五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一九五六年进入

社会主义，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希望又幻灭，储安平的“党天下”进言，是句大实话，逆耳难听，却击中了斯大林模式、政治制度的要害。

一九五七年六月，风向大变。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一下子变成了反对右派斗争，在五月整风运动中鸣放了几声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大右派。

我们蹲在监狱里，没有牵扯到这场戏剧性的运动和斗争中，而一些早已获得宽大处理的托派，在这场戏剧性的运动和斗争中却遭到了厄运，托派加右派，双料反革命。

在反击右派斗争中，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内部矛盾，说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说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马克思、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中是阶级消亡了，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 一九五七年的参观学习

政府突然宣布再一次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

参观从八月十七日开始，十月中旬结束。

宣布这次参观学习的目的是：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还要认识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

这些目的要求，很明显地是针对我们被认定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人。

参加参观的托派：何资琛、曾猛、何子铮、谢公墨、李培、籍云龙、王国龙、周仁生、蒋振东、叶春华、黄鏗桐、喻守一、李永爵、陆绩、姜君羊、杨博、林华、沈文铃、俞一民、郑良、杜畏之、熊安东等二十余人。

先后在上海、北京、沈阳、抚顺、本溪、鞍山、武汉等七个地区，参观了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农业、水利、交通和科教等方面的建设成就。

上海一个星期的参观项目与一九五六年相似，只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并成了高级社。

北京一个星期参观的项目，工业不多，重点参观了官厅水库，

张各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南郊国营农场，观看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顺便游了天坛公园，张各庄高级社是由十多个初级社会合并成近万人的高级生产合作社。

北京的南郊国营农场，是个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农场，场长是位残疾退休军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办公，是接待室又是办公室，他介绍了农场的情况：这里本是供皇帝打猎的地方，现在改为畜牧兼生产蔬菜的农场，生产的奶、蛋、鱼、肉和蔬菜等专门供应中央党政各部门，基本满足需要。

在东北两个星期的参观项目是：煤矿、铁矿、钢铁厂、重型机械厂，还有一个满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抚顺的一所养老院。

东北的工矿企业规模都很大，无论是沈阳重型机械厂还是鞍钢公司的轧钢厂、钢管厂等，各单位的领导都介绍他们的厂在日本投降时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后，都是在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私援助下进行了扩建或改建后恢复生产的。

这些单位的领导人，都没有讲到在日本投降后，苏联拆走机器的事，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好问，因为这也可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苏宣传。

在武汉主要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钢，肉类加工厂，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武汉医学院等。

武汉参观的重头戏是武汉长江大桥，这座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大桥，完全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由苏联援助建造的。我们参观时，双层桥体已建成，尚未通车，我们从铁路桥面的这头走到另一头，乘电梯升到公路桥面，又从那头走回这头。站在公路桥上四望，武汉三镇近在眼底，天堑变通途，滚滚万里江水从桥下东流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情景壮观，难以忘却羁绊身。

武钢是新建的一座大型钢铁厂，建厂时，解放军开进了一个师，脱下军装换上工装，充当工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建厂的效率又快又好。

肉类加工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通过陆路和水路，猪们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被赶运到这里，经过消毒洗澡后，它们就川流不息地经一条特别的通道走向不归之路，被电击昏、挂架、放血、去毛、开膛、摘除内脏、砍头，然后劈成两片。沿着流水线观看了生产全过程，劈成两片的猪身，落在输送带上进入冷冻车间，然后冷冻火车就一列一列地驶向苏联，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扩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帮助建造长江大桥、建造大规模水库等等，我们支援老大哥有肉吃，也是应尽的一份国际主义义务。

“那么多猪头，那么多内脏怎么办哪？”我们好奇地问。“人

多力量大，咱们中国人口多吃量也大，还不够吃呢！”厂领导答。还告诉我们，猪脑和猪内脏器官里还能提炼出贵重药品。

在这次参观中，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工业、农业或科教企业，任何单位的领导讲话时都特别提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总之一句话，共产党领导人民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就是要对着干！右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上海、北京、沈阳参观分别都是刚刚由若干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的领导都细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说找到了“控穷根”的道路。农村里也有右派分子，他们是富农，吵闹着要退社，说社的领导不会管理或管不了这么大摊子，说高级社成了“高草社”等等。我们到地头上去走走看看，看到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田里没有看到高草，路边有青草，牛羊在那里啃食。

在北京参观时，领队的曹科长问我们有什么要求，何资琛提出：要求中央同志接见，曹科长看了何资琛两眼，没做回答。何资琛曾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中共的五大和六大，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毛泽东共事。“成则王，败则寇”，客船忘却身是囚，往事还如一梦中！

参观结束后，在武汉，曹科长在讲话中，对何资琛提的要求



作了答复：“还要求中央首长接见？我看还是需要继续劳动改造！”

十月中旬，乘“江新”轮从武汉回上海。

十一年前，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大学从重庆复员回南京，乘的就是这“江新”轮，在轮船上我用托洛茨基的观点同金万林谈论国共两党的内战问题，金万林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十一年后，我做为托派囚犯，接受共产党的参观教育举措后，乘“江新”轮回上海监狱继续服刑。

滚滚东流的江水依旧，两岸的景色依旧，物是人非，往事如烟。

## 继续劳动改造

12

由武汉回到上海市监狱后，我又到经纱车间劳动。

有一天，陪同我们出去参观的一位姓杨的科员到车间找我谈话，先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劳动情况，然后向我讲：明年还要参观规模还要大，我听了这话满心喜欢。

一九五八年初，杨科员又到车间找我谈话，告诉我：原来参观的计划取消了，嘱我好好地劳动，安心地改造，听了这话我感到茫然失望。

一九五八年初，对犯人进行了“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课教育。在杨科员找我谈话后不久，我被调到织毛巾被的车间劳动。

织毛巾被的机子还是几十年前的手工操作的木制机，比乡下农家的织布机大几倍，结构复杂一点，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幼年时，我在织布机上摆弄着，对这个车间的劳动不感到陌生。

技术指导员向我讲解了操作规程，叫我先在车间里看看别人如何操作，同时帮别人做些辅助性劳动，一个星期后，有一个犯人生病，他那部机子停下来，技术指导员叫我上机试一试。他站在旁边看着，我就脚蹬手拉，像模像样地操作起来，他说：“行，

大胆一点做”。

这位姓崔的指导员，从前是一家私营毛巾厂的技术工人，公私合营后，他被<sup>调</sup>到劳改工场刚刚建立的织造车间当技术指导员，人很忠厚，工作认真。在这个车间劳动的一个犯人也曾是那家私营厂的技术工人，不知什么原因，判了十二年徒刑，因为他有技术，就调到织造车间劳动。他们两人原来是朋友，如今虽然政治身份不同了，看得出，技术工人出身的技术指导员对那位成了犯人的技术工人还是默默的关照之情。

在这种木制机上劳动，只能一只脚落地支撑着整个身躯，另一只脚踏蹬板，是控制经纱盘头滚动的动力；右手拉杼，左手拉索，每拉一下索绳，管毛巾被上提花的龙头花板跳一格，同时梭子打个来回。人的四肢，有三肢在不停地运动着，一天十小时，就这样不断地、机械地运动着。三肢分别运动一次，织毛巾被的轻纱上增加了一根横的纬纱，一条毛巾被就是一根一根纬纱排列出来的。毛巾被上的花样，是龙头花板控制的经纱，在右手拉杆时刻出来的。这种提花技术是从织调厂移植来的，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

手工劳动速度同技巧成正比，也同疲劳成正比，三个月后，已能日织三条多一点，快赶上快手了。一天劳动下来，累得精疲

力竭，浑身酸痛，骨头像是散了架。但看到自己织出的一条条漂亮的提花毛巾被时，感到赏心悦目。哪年哪月我能有这么一条毛巾被呀？心情凄然！

毛巾被车间是全日制，三顿饭在车间吃，十小时劳动后还规定学习二小时，二小时的学习也仅限于听读报和收听广播。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通过报纸和广播知道大跃进就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亩产万斤粮放卫星。

为了赶美超英，发动全民大炼钢铁，甚至孙夫人在庭院里也砌了小高炉，都是我无法想象的事。监狱里关押的是犯人，不是人民，没有出现砌小高炉炼钢铁的事，至于监狱的管教干部有没有砌小高炉炼钢铁，我就知道了。

亩产万斤粮，竟放高产卫星，报上报导密植的麦田里的麦穗紧紧挤拢，上面放个鸡蛋都滚落不下去，我更是无想象了。对于这些无法想象的事情，当时谁也不敢说不相信，连毛泽东都表示，粮食多了吃不了不知怎么办而发愁呢。我只有根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说法，相信这些报导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参观时，看到由若干互助组合并成立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参观时，看到由若干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合并成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我看到了也相信了农业集产化比农民单干的优越发展前景，相信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是合并若干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起来的，农、林、牧、付、渔，工、农、商、学、兵、医卫，大而全兼而有之。报上宣讲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作法是“疯狂的奔驰”，是“危险的冒险”。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是“疯狂的奔驰”？是不是“危险的冒险”？我无法对比。对俄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我不了解。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看到的和知道的不少。解放后，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为自己生产，劳动热情大，我是理解的，亿万农民各自拥有小块土块单干，在自然灾害方面和自身生产手段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仍然摆脱不了两极分化的历史性悲剧重演。因此，当时我相信报上对农业合作的宣传，相信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亿万农民走人民公社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一九五九年初我又被调到针织工场劳动，在手套车间劳动了

半年，又在袜子车间劳动了一年零八个月。

织手套用的是手工摇动的铁机子，为了利用惯性省力气，摇动起来，上身就像扭秧歌一样，劳动强度比织毛巾被小了，但这项劳动很枯燥，摇出来的是一只只白纱线的工作手套，一天摇一大堆，要自己把正品和次品分开，正品交检收组，次品能修的修一修成正品，不能修的拆成纱线重摇。

十小时把精力都倾注到劳动上，一是忘却了一切烦恼，二是产量质量都上去了，我很少摇出次品。

修次品或拆次品都是得用吃饭后休息的那十几分钟。如次品多，在那十几分钟内处理不完，只好放在专供自己装原料的布袋里，慢慢处理。这种情况的人并不多。我初入狱时在一号监认识的那个喜欢汇报的姓孔的东北人，也在手套间劳动，他比我早几个月到这候车间的，该是个老手了，但我发现他的产量不高，次品不少，他交出的正品，检收组还会检出次品退给他。在饭后那十几分钟里，他同别人一样忙着处理次品，这并不妨碍他放下手中的活，到主管那里去汇报。他既不是学习小组长，也不是劳动小组长，我不明白他去汇报些什么。

这个车间只有两位主管，一位专职管教，一位是技术员。技术员本来是这种手摇机厂的保全工，管教主管姓朱，是从部队上

转业到劳改单位的，这两位主管对待犯人的态度挺好，从不训斥人。有一天午饭后，我没有次品处理，坐在机子旁休息，技术员走来，叫我到他们办公室的小房间里去一下，朱主管笑着问我：“昨天午饭后你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到橡皮间去过。”“做啥？”“我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一想不对头了，有人打我的小报告！我立即向两位主管讲了几句承认错误的话。朱主管仍然笑着说：“没有什么错，我们问一问，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技术员接着说：“你去吧。”我回到机子旁时，技术员吹了开工哨。

一共有两个橡皮间，同手套车间在一个楼面，相距不远，据说是专门对付胡闹的或撞墙头想自杀的犯人的。每间大约十多平方米，只有一扇木门，没有窗，内部墙壁、地板、木门背后都铺牢一层很厚实的橡胶，弹性很大，撞不死的。平常两个房间的门都是关着，反上锁，那一天，一间的房门半开着，吃好午饭我没有事做，就去那间橡皮房间仔细看了看，故意撞了一下墙，在地面上跳一跳，果然弹性很大。

我肯定是姓孔的汇报的，在犯人汇报时，政府干部都是表现出耐心听取的样子。这种现象，是把摘帽、减刑当作政治勒索手段的一种制度产物，这种制度是利用犯人在极度绝望的恐惧中产

生的脆弱心理，扭曲心灵、狂费心机地向政府干部做汇报，像信神的老婆婆时时向神灵祈福一样。

像姓孔的这类人物，我碰到还不只一个，他们为了争取宽大减刑而表现积极，自觉地养成了月汇报、周汇报，鸡毛蒜皮天天汇报的习性。

我肯定不是劳动小组长汇报的，他的机子靠近我的机子，他的劳动勤奋又扎实，很少有次品，他原是工人，因点历史问题，判刑十二年，这个车间成立时就调他来当劳动小组长，已经好几年了，文化程度不高，每星期写小组劳动情况汇报时，常找我帮他改正错别字。姓孔的次品多，他对姓孔的劳动有意见，他对姓孔的这个人也有意见，但他不说出来，而是从他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午饭后休息的那十几分钟里，他常去帮人处理次品，我没有见去帮姓孔的处理次品。

也不会是学习小组长汇报的，学习小组长是个典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自扫门前雪的老好人，小学文化程度，他同我们一样地劳动之外，在每天规定的学习时间，他负责读报，报纸不是全读，他只能把标题上有红笔圈划的读给我们听。读完，他立即把报纸折叠好送交到主管那里去。

托派犯人集中起来学习时，我们看报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分



散到劳改队劳动，劳改队的读报学习是有控制的。每天，报纸在分送各劳改队之前，就圈划好了，凡圈划的可以读，不圈划的不能读，这位学习小组长是个老实人，没有圈子划的，他看也不看的，我就坐在他近旁，有时免不了还要偷瞄瞄他手里展开着的报纸，只能瞄到未圈划的大标题，内容字太小，是瞄不到的。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上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详细情况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也许当时报纸上就没有详细报导，也许有报导，因属于犯人不应该知道而没有圈划出来读给犯人听。

事隔三十年后，我读了李锐等人写的书后，才知道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内情。

## 害水肿病回一号监

一九五九年七月把我从手套车间调到摇袜车间劳动，一直劳动到一九六一年初因害水肿病才调离了劳改队。

织袜车间与手套车间在一栋大楼里，不同楼面。织袜车间有五、六十部织袜机，半电动化，打袜头和袜跟时，还要手工操作，比起织毛巾被和摇手套，织袜劳动省力。

织袜车间分日夜两班制，早六点晚六点交接班，每两个星期有一个白天班休息，可以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整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我国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犯人日定量是六两米，两顿稀饭一顿干饭，菜里没有一点油水，像是盐水煮的，几个月没有荤菜。国庆节那天，菜里有了点小鱼小虾，管教干部向我讲：为了节日改善我们的伙食，监狱干部出动，到郊区的河浜里捕捞来的，还告诉我们：自然灾害，外边的人都没啥吃。

为了照顾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每天每人加一个猪肝色的“馒头”，不知是用什么植物的茎磨成粉蒸制的，我还是能吃得下的。人饿急了，什么东西都能吞进肚里去，如果菜是芋艿，芋艿皮也要嚼碎吞咽到肚里去，蚕豆皮就更不在话下，我还算是幸运的，

在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多少万人民连树皮草根都没得吃而活活饿死！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有些犯人因脚肿从车间调走，被调走的人都很不情愿，因为调回监房不劳动了就更吃不饱。一九六〇年底，我的脚面子有点肿，睡八小时后就能消下去，我以为不要紧，瞒着不报。一九六一年初，肿得厉害起来，睡八小时不仅消不下去，小腿肚也肿了，我被调离劳动工场，回到一号监。

一号监所有患水肿病的犯人都安排在同一楼面，每室住两人，允许白天可以躺下休息，每天晚上十一点钟被叫醒，喝一碗菜粥再睡，体现政府对病犯的照顾。

与我同住一室的名叫季苏，比我大十多岁。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时被揪出，叛徒罪，获刑十五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时期二十岁不到，入党，当交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悔过、释放，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陕西边远的山区当县长。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用了十根金条在四川北路顶下两开间的门面，开了绸布店，与地下党又结上头，做联络点。上海解放后，安排到市公安局坐机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一九五五年国家机关肃反运动中，他被整肃。他自称对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没有陷害同志；对于悔过，他说：“如

果不悔过，我的头早就没有了。”

他对一九五二年肃托的情况知道一点，对于原是共产党员，后又是托派的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也知道一些。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一九五三年我被初审时，那位站在审讯台上讲话有点口吃的公安干部名刘大勇，是当时公安局长杨帆的副手，对于这一点，到文化大革命时证实了，我看到监狱办公大楼上拉出了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叛徒杨帆的黑干将刘大勇！”

我同季苏同住了三个多月，一九六一年五一节前，他被转移到八号监，八号监是病犯监。我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医院楼距八号监不远，住进医院，就像普通病人一样，整天躺在病床上，打针、吃药。午饭和晚饭都有荤菜，一个煎蛋或一片肉或一块炸鱼等，早饭后还有一杯豆汁。两个多月的功夫，脚肿腿肿全消，我走上磅称，四十五公斤，被捕前我体重七十三公斤。

水肿消退后，把我转移到八号监住了三个星期，我又碰到季苏，他的水肿好了些，但没有全消退，他的爱人每月都来接济他，有规定可以送入的十个蛋，一个玻璃瓶装的肉类罐头，都是用高价买的。

他告诉我，看到好几个水肿病人抬出去了，同他同住过一个山西人，他眼看着他走了。我问他是不是姓杨的？他说：“是的，

是个旧军官，叫杨广文，你怎么认识他的？”“我初入狱时，同住过，是个积极要求改造的犯人。”季苏苦笑了一下，“他病成那副样子，还常写小汇报。”

这个时时刻刻都表现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犯人，带着他的“守罪论”，走完了人生。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前，我被调回一号监。

一九六二年开始，一号监的重刑犯人（实际都是判无期徒刑的），按规定不能离开一号监到任何劳改工场去劳动，只能在一号监内参加各项劳动，一号监内的劳动项目先后有：拆回丝，糊火柴盒，糊分装药物的小纸袋，糊供应商店包装商品的纸袋。那时，塑料袋尚未引进我国。一九六五年成立翻译组，让一部分会外文的知识犯人有有用武之地，之后，利用五楼楼面成立油漆车间，为十二机床厂加工油漆螺丝刀的木柄，我参加了各项劳动。

## 一九六四年参观与学习《九评》

一九六二年开始，报上常有自力更生的宣传。我好生奇怪，又觉得新鲜，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怎么又自力更生起来呢？记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发表长篇讲话，题目就是自力更生。

一九五七年，为了对我们这些托派犯人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特地组织我们去东北和武汉参观，在东北参观了许多重工业工矿企业，据介绍都是在苏联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下扩建或改建的，在武汉参观的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完全是苏联国际主义援助建造的，国际主义是个抽象名词，形象化的教育是最有说服力的。

还记得五十年代，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掀起了一阵国际主义的热潮，伏罗希洛夫不论走到哪里，北京、上海，到处是举着花环的孩子们，亲昵地呼叫着：“伏爷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位伏爷爷正是斯大林的铁杆战友，场面是做给赫鲁晓夫看的。

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了，赫鲁晓夫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意识形态背后，是物质利害需求的冲突。

于是有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和中共中央的回信《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这之前，中国还出过一本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我看过的。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关于赫鲁晓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在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评》。

就在《九评》发表的期间，把我们托派犯人又集中起来，分成两个小组学习《九评》。还把刘平梅（从广州）、周仁生（从浙江）、喻守一（从武汉）、林华（从广西）调来上海，参加学习。

这次集中起来的托派犯人，四个未判决的：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鏗桐，他们四个人是一个学习小组，八个判无期的蒋振东、藉云龙、王国龙、刘平梅、李培、叶春华、周仁生、熊安东；三个判十五年的沈文铃、林华、郑良；四个判十二年的陈莽、夏建勋、沈云芳、谢公墨。这十五个人是一个学习小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到二十日，组织我们在上海地区参观了五天，，上下午各参观一个项目，主要是几家重工业工厂，因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苏联不给图纸，不供应零部件，使

生产大受影响，有的甚至停产。

参观的重头戏是万顿水压机，江南造船厂一九六一年制造，这是自力更生的形象工程，一立方米的铁块，象揉面团一样地压轧，是大型发电机转子轴、大型轧钢机架、大炮筒管、导弹壳等锻造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

负责人讲解了制造这座庞然大物的过程，全靠自己的力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不供给技术资料，边造边学，先造一座一百吨的，行，放大十倍，造出座一千吨的，合乎设计要求，放大十倍，万吨的造成功了。修正主义还讥笑我们没有能力造出来，我们造出来了，他们又说我们是用黄金堆起来的，负责人气愤地说：“既算是用黄金堆起来的，你们有吗？”

参观结束了，正始学习《九评》。

《九评》全面批判了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批判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论点，批判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不经暴力革命实现的论点，批判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全丢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不仅复辟了资本主义，并且修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九评》的发表，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然地引起我们托派犯人的关注，且受到震憾。



建国后，一直宣传“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都进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帮助我国新建、扩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项大型工矿企业，帮助设计，供应头等装备，派专家帮助安装，帮助建设大型水库，建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还有低息或无息贷款等等。一九五七年还曾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到东北和武汉参观学习，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形象教育。

一九六四年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参观，进行自力更生的形象教育，学习《九评》和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信里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是通过贸易方式进行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对中国的贷款，主要是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大部分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占对苏联出口的相当份额，抗美援朝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的。

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的形象教育冲得无影无踪。

《九评》中的某些评论用语似曾相识。

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词句下修正了马克思列宁阐述的社会主义概念，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不是社会

主义，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也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延长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生前仍坚持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主要理由是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生产力不断社会化。

《九评》有篇《关于斯大林问题》，坚信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坚信斯大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赫鲁晓夫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修”得不像子，是赫鲁晓夫向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脸上抹黑，《九评》实际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冒充国际主义做的坏事，找赫鲁晓夫出气。

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修正主义，同《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两码事，不能因有些言词似是而非地当一码事，我们小组的学习发言都很谨慎，谁都怕一言不合《九评》旨意招来祸殃。大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一顶“拥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戴，不论学习那一《评》，结合这一《评》的内容，对准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狠批一通，这就叫做联系思想，所谓“拥赫迷修”的涵义是拥护赫鲁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面，盲信赫鲁晓夫回归列宁原则。《九评》中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揭露托派第四国际曾在苏共二十大后，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赫鲁晓夫给托洛

茨基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轰下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好像中共没有改变对苏联国家性质的看法，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好转。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郑超麟一人学习《九评》后写了八、九万字的心得体会上交政府，题目《干部主义论》。后来政府干部宣布说，郑超麟写的东西是放毒，警告郑超麟，不准在小组里扩散。人斗人的一九六六年十月，郑超麟还是挨了批斗。

在重庆的曹惠白学习《九评》后，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被怀疑误会，招到了厄运，从而戴帽、判刑、离婚、坐牢，申诉又被认为翻案。拖到文革，情况变得更糟，横遭毒打，九死一生。

大概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监狱当局根据中央一项命令的精神，规定一号监的无期徒刑犯不再到各劳改工场劳动，只能在一号监内参加糊纸袋和拆回丝等项劳动。

《九评》学习结束后，四个判十二年徒刑的陈莽、夏建勋、沈云芳、谢公墨都到期，前三个被迁送青海省的上海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劳动，谢公墨释放回家受管制。三个十五年的和八个无期的，还有四个没有判决仍然分作两个小组在一号监，上午学习，

下午折回丝劳动。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注意到一监新来了一位姓王的主管，有一次我听到一号监长称呼他“指导员”，我才知道这位王队长是指导员。作风简朴，没有官架子，别的主管总要有一张正规的写字台，写字台上还要有玻璃写字板，办公用品，一应俱全。这位王队长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张旧的学生课桌，所谓 K 字型桌，在一个角落里一放，是他办公的地方，上班自行带两个保温瓶上楼来了，不需要喊劳役犯去打水，上午学习时，他在楼面走一趟看看，下午劳动时，他在楼面上走一趟看看。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劳动时，他对我们小组将了一军。我是劳动小组长，我领来一大包回丝布，按小组人数分成若干堆，回丝布有大有小，有容易拆的，有难拆的，在分堆前，我先搅划一下，为了公允，每堆旁我在地上编上号码，我再用纸片写上相同的号，让大家抽签，抽到几号就取几号堆的。王队长看我分完了，笑了笑：“如果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抓阄是一大发明，你们都是知识分子，还来这一套！”几句话，说得我们这些自命为唯物论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尴尬。学习小组长思想敏捷反应快，立马上网上线做出自我批评，向王队长表态，接着把我也批评进去，说我“早就不应该这么做！”责任推到我头上，我沉默无言。从

此，我省事也省心思，回丝布领来了，随便分成若干堆，让每个人自取一堆，我取最后一堆。

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劳动，这位王队长走过来，站在郑超麟面前看了一会，面向着整个小组对我讲：“我看，你就捡几块好拆的给他拆拆，你们看，他的手……”的确，由于患风湿关节炎，郑超麟的十个手指头都弯曲得伸不直，我早就注意到了，拆回丝，他很吃力，别人都拆完好几堆了，他的一堆老是拆不完。我不会想出这个便通办法，我想出了也不会做，我做了就犯了大忌，同情一个反改造分子。

一九六四年底，在这位王指导员的主导下，一号监成立了翻译组，把一号监会外文的犯人集中起来翻译科学技术书，托派小组的郑超麟、喻守一、周仁生、王国龙等调去翻译组。

之后，王队长又与上海十二机床厂联系，把机床厂的油漆车间搬到一号监的五楼，这个油漆车间专门漆螺丝刀的刀柄。

市场上大小型号的“555”牌螺丝刀，是上海十二机床厂生产的，我们把木质柄漆好后，送去十二机床厂装配成螺丝刀，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漆好的刀柄上刨出六条槽，使用时不滑手。

油漆组人多，一号监除了参加翻译组的，其他凡是有劳动力的都放到油漆组劳动。有了翻译组和油漆组，我们的伙食定量增

加了，能吃饱，油漆组每天午饭菜里有荤。油漆散发的气体对人体有害，外边工厂里的油漆工人都是增发营养费的，所以十二机床厂愿意让出油漆车间。

油漆车间分三个组：老粉组、砂光组和油漆组。

木柄的毛胚是在浙江山区加工好了运来的。毛胚的废品很多，有时一麻袋里检出十分之一，正品先由老粉组涂上老粉，待干后，由砂光组在砂光车上砂光，之后由油漆组漆三道红漆再漆一道光漆，工序完成，装萝筐运出监狱送十二机床厂。

一九六五年元旦，专案组的李队长给我们托派犯人送来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每人一套。一卷和二卷，一九五二年我曾看过。我首先阅读了第四卷，这卷里包括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胜利四年间的政策、方针和评论文章。我读第四卷，初次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年内战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历程。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土地法大纲》，首先在已解放了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而国民党办不到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翻身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妇女和老人车轮滚滚送公粮，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历

90 (10) 11

次农民战争不完全相同，这次农民战争在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物质“分配导向”指引下爆发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军，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抽拉来的壮丁，陷入了土地革命的浪潮中，淹没和瓦解了军心而必然失败。

双印

(五) 译字.

秋中经石文章.



# 八十五岁自述（六）

13

## 释放证收回

一号监是重刑监，无期犯人都关押在这里，我在此已被关押二十年。监外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有白天和黑夜交替。监内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没有任何变化。

每天早晨哨声中起身，三人关一个小监室，内务整理得像部队一样，有角有楞。各楼层的夜班主管几乎是同时快速地开小监房门，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的撞击声，像一阵急风暴雨呼啸而过。初来乍到时，震得我头脑发胀，尝尽铁窗滋味。天长日久，听惯了，神经麻痹了，这阵金属撞击声，变得像一曲生命交响乐。小监室门开后，马桶拎到门外，楼面劳役犯把马桶拎到楼下，一阵倒马桶、刷马桶的声浪自楼下粪池边传来，有时因风向关系，还会飘来阵阵臭气。劳役犯把马桶送到每个小监室门口后，马桶拎回室内，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三人静坐室内，等劳役犯送水洗脸，每人一大号搪磁杯水。劳役犯收倒污水后，又送来早饭，饭装在铝盒里，每人一盒。饭毕，空盒收走，整个监房变得静悄悄的，等待日班主管来开门。

又是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的相互撞击声，一阵震耳欲聋

的交响乐。犯人都走出小监室，分组学习。学习到远处伙房方向传来饭盒装车响，此曲只应天上有，心情振奋。只等楼面主管：“回房间”！接着是一阵哐啷关门声，坐等吃午饭。饭后，自动劳动起来，把针织布的边角料拆成回丝。楼上楼下又是一阵开门的声响后，仍坐室内不动，一面拆回丝，一面等待分批下楼到两幢楼之间的院内放风半小时。放风回来，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继续劳动，等待吃晚饭。晚饭后，日班主管来点人帐、收封。所谓点人帐就是看看室有几个人，同铁门上的番号对一对；所谓收封，即将钥匙插进锁孔里旋上两圈——三道包险锁。一天到此结束，只等哨声睡觉。

明天，一切又重复一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吃过早饭后，该是开小监室门，放出犯人学习的时辰都过了，整个一号监都还静悄悄的。

托派犯人都关在一个楼面，楼面主管开了我们的小监室门后，没有再开其他监室的门就回他办公的前阳台去。

这个不寻常的动静引起我注意。

三个未判决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们已被关押二十年，尚未判决。

不久，两个改造表现积极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们都判无期，已服刑二十年。

像发生了什么变动，我陷入了胡思乱想。

不知过了多久，通知我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

走进一间办公室，先调走的郑超麟、喻守一、黄铿桐、王国龙、叶春华、周仁生、蒋振东等人都在那间办公室里，沉默地站在办公桌周边。

在一九九二年，郑超麟写的回忆中写道：“公安局有人来向我们宣布释放，而且给了释放证，我们都盖了手印，但承办单位立刻把所有释放证收去，因为我们不能回家……”（《史实与回忆》第二卷二二〇页）。

我不记得发释放证的情节。那天我最后到那间办公室的，或许在我到那间办公室之前，发释放证和收回的事情已结束了。既然又收回去，也就不必再给我了。

一位面孔陌生的干部，在我走进办公室时，向我招手叫到身边对我说：“你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啊，今后你还要好好地改造思想！”这位干部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接管我们的事务，一直管到九十年代退休的郁洪飞。

宣布我们分别去劳改工厂（南汇县周浦劳动玻璃厂）和劳改农场（青浦县青东农场），继续改造。

炼狱的路，何其修远！

## 劳改农场受管制

在办公室吃过一顿监狱给我们准备的午饭后，在众多干部的陪同下，乘上两部汽车离开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分别去青浦南汇。

汽车驰出监狱大门后，铁门在车后又重重地关上了。二十年的青春年华留在这两扇铁门里面。

汽车驰出喧嚣的市区后，在一条备战公路（路面特宽，把路两旁的护路树砍倒，就是一条起落战机的跑道）上奔驰着，车行路当中，两侧成了农家的打谷场和晒谷场。蓝蓝的天空下碧绿的田野，呼吸着新鲜空气，回归大自然，心旷神怡。远处农舍传来鸡鸣犬吠声，悠然引发无限乡愁，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欢乐。

汽车停在青东农场天圣庄甲一号门前。

这是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它的西面隔一条拖拉机土路是农场干部家属宿舍；它的北面是片水稻田；它的东面隔着一片水稻田是农场场部；它的南面是片桃树林，桃树林频临一条可航行机船的河浜，河上有一座可供小型拖拉机行驰的石桥；桥南是个自然村落——天圣庄。

这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共有十二间，每间约二十方米，每间朝北一窗，朝南一门一窗。平房朝北的大门开在第二间，东面的一

间供管教干部住，西面十间的门上都写了房号，一号是我们的学习室，二号到七号分住我们六个人，我住三号。八号放劳动工具和堆放杂物。九号和十号是十二中队的仓库，堆放蜂窝煤砖。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东西长约三十公尺，南北宽约十公尺。院内有一棵枣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梧桐树。入住后，我们自己动手移植了十棵葡萄，札了很大的棚架。

室内已放好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桌和方凳，都是新制作和油漆的。

农场派一位姓潘的干部专职负责我们的事务，是一位因残疾转业的军人，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政策性很强。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对我们的安置是按照中央文件规定。他举例说，这排平房顶高不达标，农场调了一百多劳教人员，用上几十个千斤顶，硬是把这排平房的屋顶抬升了一尺。我们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高于农场普通管教干部的月工资（平均四十五元），更高于刑满留场职工的月工资（十五元），而我们在农场的身份是戴帽的三类人员，可我们又不同农场的劳改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单独安置一个住的地方，规定不与任何人员随便交往。因此，这位潘队长认为，政府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并且是养老到底。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对我们这些人安置的种种措施看，潘队长的讲法并非

他个人想象，可能是有上级指示根据。

到农场的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屋门关了，电灯开着，在书桌前默默坐了良久。又把电灯息了，在室内来回踱步，思绪万千。昨天晚上，还关在监狱里躺在小监室的木地板床上，等待次日早晨开门时那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撞击时交响乐。今天晚上，我用我的手轻轻地关上屋门，又轻轻地开了屋门，走到院子里，抬头遥望满天闪烁的繁星，笑看人间。

到农场安顿下来后，由农场医院的医生给我们六个人全面检查了身体，有病的治病。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先做了内痔脱肛的手术治疗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拔光全口残牙，装配了一口义牙。多年来不能嚼咬的困难解除。

政府把叶春华的妻子曹家骢从安徽白芽岭农场调来青东农场，我们六个独居汉有一人有了家室，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大事。

对于没有成家的想找对象成家，政府的态度是：不反对，不支持。郑良积极找对象谋划成家，也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关心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妻子赵青音陪伴婆婆，携带儿媳抱住小孙女从温州来探亲，一家老少四代人团聚，更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

大事。

周仁生的母亲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对人对事都很达观。特地带来温州特产——老酒汗，送每人一瓶。此酒采用黄酒蒸馏而成，无色状如白酒。又亲手用老酒汗烹制油煎荷包蛋给每个人品尝，酒香蛋香，好吃。使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

早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一个署名赵青音的人负责同我通信联系，信上以姐姐自称。一九四七年秋，我从南京来上海，在周仁生的住处，经介绍彼此才认识的，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学生模样的少女，喜欢说笑。二十多年过去了，人大变样，沉默寡言。背负着托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家属双重身份，在劫难逃，“文革”初起时，经常拉出去挨批斗，折腾得心力交瘁，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理睬她。

与周仁生初相识时，他尚未结婚。现在看到他一家老小四代人团聚，为他高兴，也哀叹自己。

周仁生住四号，我住三号，紧相邻。回到屋里，想到自己，已过耳顺之年，无儿无女，一幅无依无靠的凄凉晚景，呈现心头，感到无限悲伤！

茫茫大地，何处是我家，何处有我亲人，无亘绝望。

## 回乡探母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天潘队长交我一封从山东乡下寄来的信。我们六人的信件，都是先由管教干部老泮收下，然后再分送我们手中。

“家里还有啥人？”我看信后，老潘问我。

“只有老母一人。”

“不能来么，该回去看看。”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温慰，也感到疑惑。安置农场时，对我们宣布家属可以来探望或同住，没有宣布我们可以回家探亲。何况我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啊！”

“能行吗？”我试问了一声。

“你可以打个申请报告。”

想不到，批准了。老潘通知我做好准备。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干部郁队长和贝科长到农场，向我宣布了路上和到家以后应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又宣布：“由潘队长陪你回去，没有别的意思。”解释说：因为我离开社会久了，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买票、转车、住宿等手续都由老潘办理方便，等等。

其实不解释我也明白，一个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人能够独自到社会上跑来跑去吗？“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



是他们的政治职责。

列车是在黎明时分到达济南站的。走出车站，即看到街上挂着横幅，墙上贴满了标语，满地是撕碎的标语纸屑，在晨风里翻滚着。两家“革命造反派”还在演真假孙大圣。

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的路上，一些年轻小伙子拉着地排车奔跑，有的拉着空车奔向市区，有的拉着装满了垃圾的车运向郊区。他们是为了生计而忙碌的农民，每天一大早趁在允许他们拉地排车进城的时间里，进城捡拾垃圾积肥。在化肥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北方的农民就有起早背着粪筐到村头地边转转，捡拾狗粪、人粪回来倒在猪圈里积肥的习惯，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种肥田方法。

做官的为了争权夺利忙于打派仗；种地农民为了盼丰收忙于捡拾垃圾积肥。

这就是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史。

从济南到我家一百八十里路，在离我家五里的公社所在地的集镇有汽车停靠站。老泮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我还要步行五里才能到家。

“近乡情更怯”，我怯的是分别整整四十年后，将要见到我娘，不知她已老成什么模样。分别时她三十五岁，陪着我走到村头，我走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村头望着，那时我十二岁。

“少小离家老大回”，唐朝诗人贺知章，在京城做官，告老回到家乡时的心情轻松愉悦。我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回来与老母见上一面还要生离死别地：“娘，我去也！”，凄惨！

看到我娘的一瞬间，几乎不敢相认，四十年间，时刻想念着她，三十五岁的面影变成了眼前苍老呆滞的面孔。我喊声：“娘”，扶她坐在坑沿上，相互对视了半天，都讲不出话来。沉默的对视，代替了语言无法表述的问候。

我三叔三婶陪坐在旁边，沉默无语地注视着我，像是在想什么。

屋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提着旱烟袋杆大踏步走进屋里。我三叔一面打招呼一面给我介绍：“刘大麦，是咱村支书。”我一听官衔，肃然起立，颌首致敬。彼有干部风度，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自行找了个小凳坐下，先塞满了一烟锅烟，用火柴点燃了，吧嗒吧嗒吸上两口，对我三叔说：“我从公社回来，知道安东回来了，嗯，嗯……。”

“要感谢毛主席、党中央伟大革命人道主义呀！”是對我说的，我敬听着。我猜想，他在公社里一定见到了老潘。

“回来能住多久哇？”

“批准一个星期。”

“那好，那好，能回来看看就好，嗯，嗯，忠孝不能两全哪！”

我想不到他嗯出了一句“忠孝不能两全”。回来看望老母是孝，那个“忠”从何说起呢？看样子他还有话要讲，我只好等他又吸上两口烟后，他说：“家里烧的，吃的都有哇？有困难向我讲。”

“不缺，不缺。”我三叔代我回答。我跟着说：“我这回来，政府补贴了二十斤全国粮票。”

他走后，我才知道，他小时候没有念书，当了干部后，才学了点文化。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每家出一个劳动力到黄河滩割草当饲料，这是头一天晚上通知的。我决定拿把镰刀跟着去。割草的时间很短，很快把几辆独轮车装满了，他们推着独轮车回去后，吃过早饭还要到大田里收割高粱。

我一个人留在黄河岸边呆了一会。泥浆一样的黄河水仍然是浪打浪地向东奔流不息，田野的景象同四十年前没有两样。只是刚才来割草的一群人，都还不到四十岁。他们，是人民公社社员，为生产队集体劳动。

回家的第三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鬼节，是给去世的人上坟的日子。我娘由我的堂弟用独轮车推着到十多里外去给我外祖母上坟，我没有跟着去。一因是，上海公安局干部贝科长要我注意的事项之一，要移风移俗；二因，我三叔也不主张我去，要

我注意政治影响，当时正在批林批孔，批孔孟之道。

我娘是想要我同去的，说舅舅很想念我。我说不去，也没有向她说明不去的理由。天下做母亲的都是无条件顺从儿子的心意的。我不去，她失望，但不勉强我。如今每想及此事，总感到痛苦、难过，欠了一笔心债！

没有跟娘去上坟，我跟三叔三婶还有生产队上的人，一同到河堤边湿地里去收割苧麻。生产队有一个搓绳小组，在我三叔的技术指导下生产各类粗细不同的的绳索，是生产队的一项副业。

在我临走前，我娘从木箱里拿出一条新棉被给我。是她亲手纺纱，亲手织布缝制的。织被面的纱线先染成深浅不同的靛青色，搭配经纱，被面织成古朴的小方格图案。被里布是淡靛青色。共缝制了两条，一条给我，一条给我弟弟。两条棉被在她的木箱里存放了三十多年，一直想亲自交到我们兄弟俩手里。等啊，盼啊，三十多年流水逝去，我的一条总算亲自交到手，我弟弟的一条没能亲手交，那时我弟弟当军代表在四川某高等院校支左，我娘去世后，弟媳回家带走的。

走的那天早晨，我娘由我侄女扶着站在屋门口看我走，无言地分别了。上一次分别，一别四十年。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 回乡葬母

第二次回乡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收到三叔打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

老潘在把电报拿给我之前，他已同上海干部通了电话，并已作出了决定。所以他说：“准备一下，下午走”。口气是肯定的，申请报告也不要打了。

半夜时分，车过蚌埠，广播里突然响起一阵哀乐后，传来了周恩来病逝的噩耗，整个车厢静肃下来，有悲恸的叹息声。

在济南换乘长途汽车，我在离家五里的集镇下车，老潘继续乘车七十里到惠民县城终点站下车，因为是冬天，公社招待所条件差，他要到县城找个条件好点的旅店住。约定好，他把住址通知公社转我，有事电话联系。

我三姑家就在集镇上，我先到三姑家，三姑一见到我就哭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把丧事办完了，你三叔才给你打电报的。”

“你娘的坟就在西坡地。”

西坡地就在我村的西边。几棵杨树，几个坟堆，一塚新的当然是我娘的坟。坟头上插的幡在寒风里飘动着。我立在坟头想大哭一场，哭不出。默默沉思娘的一生。在父权和夫权的社会里，

我娘命里注定是时代变迁的悲剧角色，成了“五四”时期兴起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新思潮祭坛上的牺牲，被丈夫遗弃。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两个儿子卷入了历史漩涡，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儿子坐牢，当了革命军人的小儿子转战南北。不知她在精神上、感情上如何受住了这反差的冲击？如今，期待与希望，不幸与痛苦都埋入了黄土，一切都安息。

## 辞 母 坟（一九七六，一）

西坡坟头风微微，  
漠漠落霞孤雁归。  
呆呆痴想空垂泪，  
堪恨难报三春晖。

## 思 母 坟（二〇〇六，一）

梦里孤坟夕阳微，  
寒风斜照墓草衰。  
冬去春来三十年，  
岁岁清明路难回。

## 徐州看望父亲

回上海路经徐州，下车去淮海大学看望父亲。陪行的干部老潘也要拜访他的几位转业到徐州地方上工作的老战友，他同我住进了徐州饭店。

同我父亲也有二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他与世纪同龄。他一生都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曾先后在山东、四川和南京等地的师范学校教书，南京解放后一度在市立二中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调无锡师范教书。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无锡师范迁徐州与徐州师范合并成立徐州师范学院（文革时期改称淮海大学），先后在体育系和生物系执教。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风暴骤起，他受到冲击，被送到农场劳动了一个时期后又接回学校，下放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职位，重上讲台执教，一直教到八十四岁病逝为止。

吃午饭时，有个人来通知他：“全校的会不开了，各院系自行安排”。人走后，父亲向我解释说：“是悼念周总理的会。”之后又带着忧虑的神情说：“一会说开，一会又说不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着沉默不语了。

那时，谈古论今或借古喻今的批孔孟之道、评法批儒、评《水



游》等运动，弄得国家政治气氛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对国家大事，人人除了信从二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的旨意，谁都不敢多讲一句话。我的身份使我自知不便多问什么。

吃晚饭的时候，一位邻居来串门，父亲把我介绍成是从山东乡下来的同乡人！我一阵心寒，感到惭愧，这是什么样的人间世道！我丝毫都不怪怨我父亲，我有点后悔不该不期而至地去看望他，那时他还是下放图书馆管理借阅图书的“劳教”人员。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解放军的团政委，去看望他时，他会感到光荣，得到些许安慰。我去看望他，使他伤心并且羞于见人！晚饭后，他陪同来串门的邻居下棋，我告辞回徐州饭店。

买了火车票回上海的前一天，老潘带我去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和纪念塔，他参加过淮海战役。馆和塔离徐州市区十公里，位于云龙山的南麓。那天是馆休日，对外不开放，老潘从皮包里拿出两张证件去值班室交涉，他的证件真管用，不仅获准了，值班员还找来一位休假的讲解员陪同。在几座建筑得宏伟的馆厅里，她对仅有的两个观众做了一路详尽的讲解，我就一路认真地听和一面仔细地观看。

硝烟弥漫的战场，飞机、大炮、坦克、火海、人海，尸骨遍

野，血染大地。一九四八年底，国共两党集结主力在徐州以北的碾庄地区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碾庄正北方就是台儿庄，整整十年前，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国军同入侵的日军在台儿庄进行过一场大会战。有谁能想到，斗换星移一度秋，徐州地区又是国共两党进行惨酷内战的战场，演出改朝换代的悲喜剧。

二千年来这一带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外族入侵，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走马灯式的历史画卷。成则王，败则寇，在徐州地区遗留下多少古（骨）迹！

停住我的胡思乱想，眼睛又跟着她的讲解棒观看。冒着炮火，推着独轮车送军粮老大爷们的图片，抬着担架奔跑的农妇们的图片，在这些放大的图片下摆放着独轮车和门板改制的担架实物。一张大型图片里摄录了土改后翻身农民敲锣打鼓参军的欢庆场面，参军的小伙子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喜洋洋、气昂昂地列队向前。观看这图片时，我的思绪又飞离了她的讲解棒，我想到的是国民党统制区保甲长们四处抽拉壮丁的情景。被拉来的农民像囚犯一样一队一队地押解到师管区受训，然后送上前线。想逃跑吗？在湖北郟阳我就亲眼看到两个逃丁被捉回后，枪毙在一条小河边的惨象！

热情的讲解员讲解翻身农民送子、送夫参军的动人故事时，她的情绪也激动奔放起来，她仿佛是那动人场面的参与者，她用她的情绪感染她的观众。她哪里想到，眼前仅有的这两名观众中，竟有一个是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历史与现实就是这么折磨人！在她表现出来的真挚与善良面前，我感到仿佛欺骗了她，感到无可奈何地惭愧！

淮海纪念塔建立在一个小山头上。老潘同我拾级而上，进入半人高的围墙后，看到塔下四周堆放了许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前两天（十五日）在这里举行过悼念活动。

看到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奋力地把一个个花圈抛到围墙外的山林里，还有一个不断地清扫地上的纸屑，顺手倒到墙外。

看到这景象，我纳闷：为什么不是烧掉而是乱扔山林里？这是对悼念活动的亵渎！

老潘喊我：“走！咱们回去。”

在下山的路上，老潘对我说：“回到上海，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不要讲给他们哪！”

一月十九日回到上海，回到青东农场。来去十二天。

## 学 习

14

一九七二年九月安置到农场时，政府干部宣布我们要在学习与劳动中继续改造思想。学习为主，劳动次之，以自学为主。还规定了我们每人自备必读书籍和报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友对派》。每人订《红旗》月刊，六个人合订《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是农场订给管教干部老潘的，转给我们看。

每月我们六人可以集体到青浦城镇购物一次，每年由老潘带领到上海市区购物一次。到青浦城镇我们总是先到新华书店看看。到上海市区，我们要先到福州路的几家书店转转，我们可以自由地选购各自喜欢和需要的书籍、报刊。周仁生预约订购《列宁全集》，他是读外语的，他在外文书店订阅英文和法文报刊，购置了《英汉大辞典》和《法华大辞典》等；刘平梅预约订购《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黄铿桐预约订购《列宁全集》，还买了《资本论》等书；叶春华买到《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等。为了适应农场生活环境，我购买了几本农业知识和蔬菜生产的书。

管教干部老潘看到我们每人都买了这么多书，为显示对我们关心尽职，叫我们自己动手做书架。顺口念上一句语录：“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林彪虽已葬身蒙古沙漠，人们还习惯于“语录不离口”。做书架的材料他想办法，去请示了场政委和付场长后，他带我和郑良到农场部的大院里锯倒一棵已成材的樟树和两棵柳树，我用劳动车拉树干到十二中队的锯木车间锯成板料和木条，到场部仓库借了全套木匠工具，我们六个竟然各自制作出了虽不像样都很实用的书架。在农村环境，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己动手，添置点家具，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除了参加集体学习和参加劳动，我们六人大都是各自呆在自己的屋里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到别人屋里串门。一则免得影响别人的自学，二则那已不是“千杯少”，“半句多”的古朴时代。人斗人的所谓阶级斗争，斗得人人神经紧张，斗得人与人之间无话真思想，无言表达真感情。象形文字“狱”字造得多么惟妙惟肖！我呆在自己屋里时，把门关上，在朝南窗下的书桌边坐下，泡上杯浓茶从右手墙边书架上取一本想看的书，潜心求索智慧，积累知识，自得其乐，陶然忘形忘机，也忘却集体学习会上那些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的枯燥表态发言和无事生非的口舌仗。

一号房间是我们集体学习室，室内有一张长方形台桌和几条板凳。每逢学习，各自捧着《红旗》月刊和笔记本围桌而坐，烟茶自备，态度彬彬然，气氛肃肃然。我大都是到一号室坐下来才

打开《红旗》翻看指定学习的“社论”或“专论”，把主要旨意写在笔记本上，备表态发言时引用。管教干部老潘有时端一杯茶来坐一会，以示对我们学习的重视。其实，我们学什么和怎么学，他是管不了的，他只是传达上海干部的布置，尽一点监督的作用。

主要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学习各大批判组署名的重要专论。现在我还能记住几个常发表重要专论的署名：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等。

我们安置农场时，“九一三”事件刚刚过去一年。批林整风运动，批林彪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继之，批林彪极右实质，极左怎么一下变成了极右？有了个“形左实右”的说法。揭发出林彪题写横幅：“悠悠万世，唯此唯大，克己复礼”，把林彪同孔孟之道绑在一道，批林整风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孔子，批孔孟之道又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历史被想像化，大捧法家，大批儒家。在儒法问题上谈古论今或借古喻今的文章越做越大；两千多年的中国史说成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秦始皇“焚出坑儒”说成是一场革命，是对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的革命专政，是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是新生地主阶级的自卫措施等等，云云。

杨荣国教授著文论证：“孔丘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

家。”我在学习这篇指定要学习的专论时，我说：“孔子是农业宗法制社会的思想家，怎么会成了奴隶制的思想家？”小组里立即有人指出我的思想不对头，因为杨荣国的论文收进了江青主编的并经毛泽东批转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小册子中，中共中央把它转发全国当作学习资料。当时我们人手一册。对钦定的学习资料上的文章产生疑义，那还了得！“反对党中央”，一顶帽子放在桌上了！我只有力争辩护，我没有反对党中央的思想，我还辩解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还是代表奴隶制，这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有不同观点的学术问题。”一向谨言慎语的黄铿桐规劝式地批评我：“人家冯友兰教授都写了批孔孟之道的论文，认为孔孟之道是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批判了他自己过去对孔子的评价。”言外之意是：你算老几，能比人家教授高明！示我不要再同无事生非者争论下去。

争论引起管教干部老潘的注意。晚上他到我的屋里来，对我讲了一段话：“你们争论的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以前我也听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现在又说是奴隶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认为你的讲法符合马列主义，你就坚持，不符合马列主义，你就要接受他们的批评。坚持错了，是不得了的！”

在“全面专政”的政治气氛里，不辩解、沉默、逆来顺受，

免得落个“是不得了的”结局

在“教育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鼓噪声中，日历翻进了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到一月十八日，我回山东乡下料理娘的葬事，又到徐州看望父亲，十九日回到上海。

十多天没有看报纸，回农场后，第一件事，我先找来《人民日报》，详细看了周恩来总理病逝后的有关报导。

报纸报导了遵照周恩来的遗愿，骨灰撒向祖国大地，没有送八宝山安放享人间烟火祭奠。我联想到一月十七日在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看到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乱扔山林的情景。不保留骨灰与花圈乱扔山林，这两桩事是不是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我这个人就是爱胡思乱想。

四月四日清明节，发生了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报导。管教干部老潘立即叫我们学习《人民日报》报导。我一时忘记了学习是表态，不是漫谈感想，我的发言中漏出了句“那里会有这么多反革命呢？”没想到这话被人抓住柄了，一顶“不相信《人民日报》报导”的帽子向我头上扣来！

在那个时代，从别人的话里找渣，抓别人的小辫子，上钢上



线，揭发批判，美其名叫“帮助”，正是表态发言的最佳方式。我怎么辩解都不行。争论得激烈了，提温加热地又揭发我一条：“你的书架上没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两书”，并且说是经过长期观察，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购买这两本书。因此，一顶“对斯大林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帽子，向我头上扣来！

斯大林是革命导师，“怀有刻骨仇恨”，那还了得！曾有两位原判五年徒刑的同案，林华和沈文铃，五十年代末分别以“诋毁革命导师”罪加刑十年，只因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讲了几句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被其他犯人揭发出来。

我确实没有买这两本书，没有想到授人以柄，成了被人揭发的好材料！扪心自问，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安置农场时，政府干部规定我们自备自学的书包括这两本书。在政府干部看来，这两本书对我们“认罪”的思想改造更有针对性。当时我的思想也过于简单，我不想把不想看的书买来放在书架上装璜门面，改不掉的犟脾气，在这一生中吃了不少亏！

我自行戴上一顶“犯了不服从管教的罪错”帽子，抵挡那顶“刻骨仇恨”帽子，并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惩罚和教育。反正我没有说过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说我“刻骨仇恨”是别人的主观推断，不足为凭。

学习会后，管教干部老潘找到他房间里谈话：“别人提的意见，应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明天小卖部（农场供应站，供应全农场油盐醋糖酒烟肥皂草纸等），有车去青浦（城镇）进货，你跟车去，帮他们装车，再到书店买那两本书回来。”

一九七六年七月半年思想改造小结时，在我的小结后面小组帮助意见项目中，除了一九七四年拖到一九七五年的那条旧帐，又加上两条：“不相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没有购置革命导师的书，是抗拒改造表现”。

斯大林的两本书虽然买回来放在书架上，我仍然担忧一九七六年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不知还要接受何等深度“帮助”！

一九七六年，是我国社会政治极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三月十一日，一颗巨型陨石坠落在吉林境内；四月四日清明节，发生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病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伤二十多万人；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病逝；十月六日，一举粉碎“四人帮”。

毛、朱、周的逝世与陨石坠落、地震等自然现象发生是巧合。当年《人民日报》曾回顾历史，查到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死的那一年，有一颗陨石坠落。造神运动造得我也糊涂起来，认为天

人感应之说也许有点道理。

毛泽东病逝，一举粉碎“四人帮”，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惊讶似乎淹埋了人们对唐山大地震产生的恐惧和悲痛。

管教干部老潘天天忙于农场场部听报告、开会学习，干部们在统一思想认识。一九七六年最后三个月我们的学习较宽松，每天老潘临去场部前总是关照我们一声。要我们在自己屋里看报自我学习。

那时我的思想情况是，自从我娘去世后，我心上已无牵无挂，安身立命背负着无期徒刑十字架在农场度余生。反托谎言大山压制下，看不到生命前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老潘关照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写好年终思想改造总结。

因为每年都要写半年思想改造小结和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有人还坚持月月写思想汇报），我早已练就了一份腹稿，只要根据需要，酌情修改或增舍些字句，就复制出一份。内容少不了讲些什么加深或进一步加深揭批托派罪行，什么加强重视或更加加强认罪守法，加紧改造思想，认真脱胎换骨等等。大话、空话、假话、咒语、誓言一大堆，批评自我批评八股调，永远唱不完。

又过了几天，老潘召集我们六人在学习室漫谈思想准备情

况。那天上海干部郁洪飞和贝科长都来了，听了我们每人的漫谈发言后，郁洪飞讲了话，主要大意有两点：一是要我们今后学习不要再搞形式主义；二是点名说我暴露思想，对“四人帮”有独立思考。

我一听就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两年多来小组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本来是思想认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说成是改造与反改造问题，给我乱扣帽子。

有了这位干部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没有人借了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我提出什么批判和“帮助”。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三次半年小结和两次年终总结时扣在我头上的那几顶帽子，一风吹。

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思想改造学习更宽松，每天上午在学习室集体读报，下午参加一些劳动。老潘从场部给我们弄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读报之余，我们就听半导体。

报纸上天天宣讲：“你办事，我放心”，宣传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后成为接班人的英明领袖华国锋。

收音机里天天播放一个小女孩歌唱：

“交城的山，

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山水水真正美——”美的字音拖得很长，很好听。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沉，听之，那美的山山水水令人确信而神往。

英明领袖是交城县人。

小组学习会上就有人唱赞颂：“英明领袖的姓名多好哇，是人民共和国斩‘妖’的宝剑哪！”

“妖”当然是指王江张姚“四人帮”而言。两年前，“四人帮”红极一时，《红旗》月刊上发表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赞颂者曾立马表态赞颂，说那两篇文章的“理论”分析是符合马列主义，并且表示要反复认真学习，加深领会，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云云。

政治天空。波诡云谲。我就如此这般地学习再学习，改造再改造，学会像念咒语一样地反复念诵“加深”、“加强”、“进一步加深”、“进一步加强”的套语在学习室的学习会上改造思想。

## 劳 动

在农场，我们六人不属于任何生产中队。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半封闭式的院子里，大门开着，我们不得随便外出，不能与农场的劳改人员交往，因此，规定我们六人不参加农场的大田劳动。

劳改农场，顾名思义就是用劳动改造人的处所，不劳动怎么能行呢？于是，安排我们做些可不与外人接触且力能胜任的劳动项目。如每天早晨到农场干部宿舍区，把地上的树叶和生活垃圾扫除干净；每周日农场招待所把替换下来的棉被、床单、枕套等物送到我们院子里来，由我们拆洗干净；还有定时到农场场部院子里去锄掉或拔掉路边和昏昏晃晃的杂草；每年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四个节假日，我们要到农场场部的干部食堂伙房里去帮忙做些辅助性的杂务劳动，如杀鸡杀鸭，剥鱼洗猪肠，净菜洗菜等等。

每年六月，抢三夏是农业生产最忙的时节，无论是农场还是农村公社到处都是一样的忙。农场的副场长曾用以下的话形容这时节的忙：“早上一片黄，下午一片黑，明天一片绿。”黄指的是成熟了的冬小麦，黑指的是收割冬小麦后耕翻的土地，绿指的是经过一夜灌水后田里又插上的早稻秧。

不这样抢时间，就会误了稻的生长期而造成减产。在那三抢

的十多天里，农场场部的各级干部大都抽调到各农业中队去帮助农业中队的干部督促和指挥在大田劳动的劳改人员。

负责我们事务的潘队长，虽是腿上受过伤的转业残废军人，走路还一拐一拐的，也不置身于这农忙之外。每年三夏还是领着我们到大田劳动十多天。收割冬小麦和插稻秧的劳动强度大，不要我们做。专门划出一块稻秧畦，让我们把秧苗起出来，供大田插秧用。另一项劳动是叫我们到田埂上去捡拾麦禾搬运后遗落在地上的麦穗。这两项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劳动，十多天下来，还是累得够呛。

我们居住的天圣庄甲一号那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北边，有一块低洼湿地，杂草丛生，蝇蚊孳生。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九七二年冬天在这块洼地的西、北、东三面开挖了一条长一百公尺，宽、深各一公尺的排水沟，挖沟的土方，填地垫高，沟边栽种柳条围成篱笆墙，经过一九七三年大半年的陆续平整，原来的低洼地变成了菜圃，育植了青菜、小白菜、茄子、辣椒等；还有黄瓜架、丝瓜棚；扁豆、豇豆爬上篱笆墙，自种自食，有田园生活乐趣。

每当集体学习结束后，我常携件工具，去到这块菜圃或锄草，或捉虫，或整修菜棵菜苗，或浇水，或静坐地边观赏蝶纷飞，蜂忙忙，借以调节在小组学习会上弄得疲惫了的脑神经，舒展一下心情。

## 插 曲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问题，一风吹。在劳改农场受管制的几个右派陆续离开农场。看到这些情况，听到这类消息，我们思想有波动，但谁都闭口不谈这类问题，避免授人以柄，说成是不安心改造。我和周仁生有时能敞开心扉谈一两句，有话老是闷在肚里不说来并不好受，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认为现在我已不是托派了。”我不假思索地顶他一句：“你不是托派了，为啥还关在这里？”我们相对一笑，这一笑，不言而喻交换了对右派一风吹的感受，但我们没有谈右派一风吹问题。

我牢牢记住那次我们两人的对话，是因为没过几天，一位刑满留场就业职工来找我和周仁生。他带了一张图纸，测量了我们住室的门和窗，问我们对门和窗的大小、式样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从他那里我们得知，农场得到了上级指示，要重新给我们六人建筑新房，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依旧是砖瓦平房，每人住房面积不小于二十方米，另有公用灶间、卫生间和浴室，还另有一大间是活动室。

准备盖房地点，离我们当时住处有一里多路。那地块的北边和西边隔着一个大养鱼池塘是（海军）部队农场的农田；地块南边紧靠一条行驰汽车和拖拉机的土路，土路南面是劳改农场的农



田；地块东边是片育树苗圃，供应城市绿化用树。站在这地块四望，视野内除了广阔平整的农田，看不到房舍。几年前，老潘带我去部队农场讨菊花苗时，曾走过这地块，挖养鱼池塘的土都堆放在这地块上，因此，它比周遭的农田稍高一点，与南边的土路持平。池塘周围的柳树，榆树都已树大成荫。

我一听说要在这地块上给我们盖新房住，满心喜欢。远离农场场部和农场干部家属宿舍区，生活将少受干扰而变得清静。第二天我就一个人跑到那地块仔细观察一番，设想在住房周围空地上种菜、栽果树等，紧靠池塘，浇地用水方便，池塘岸边树荫下乘凉休息。

我还陪同黄铿桐、周仁生、叶春华等人先后去那里观看多次，看到建筑队的劳改犯人已开始用劳动车运送砖瓦，我跑到十二中队木工车间，那里已放料开锯，准备做门和窗，我满怀激动不已，巴不得马上开工把房盖好，搬去住。

关于重新盖房，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管教干部老潘始终没有向我们讲。他不讲，我们也不好问，因为牵扯到对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有变动，我们没有问的权利，反正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九七八年底，听到消息，给我们盖新房的工作停下来了。

我跑到那地块去看看，果然看到几个劳改犯人（人们习惯称他们“小劳教”，因为他们年纪轻，都是判三年五年的刑事犯）在一个刑满留农场的职工看管和督促下一车一车地运走砖瓦，我怅然而返。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们被宣布“给予公民权”，离开了农场。  
王国龙、  
有家的回家，周仁生回温州，刘平梅回广州，林华回广西；无家可归的几个人，安置上海市区分配住房。

## 给予公民权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在周浦劳动工厂受管制的六个人——郑超麟、王国龙、蒋振东、喻守一、林华、李培和在青东农场受管制的六个人——周仁生、刘平梅、郑良、黄铿桐、叶春华、熊安东，共十二名托派重刑犯人，集中到青东农场的小礼堂，参加了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给予公民权的仪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从高级人民法院干部手中接到《裁定书》。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裁定书

熊安东，男，五十八岁，山东省惠民县人。

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逮捕。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二十年的监禁关押，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为由，“宽大释放”而不放，又送到农场严加管制七年后，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决定给予公民权”，才结束了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算起的二十七年关押管制，回到社会上，成了个无家无业公民。

是因为“反革命罪”，“有悔改表现”而“宽大释放”，不是平反。平反是没有罪才平反，那时候说托派无罪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托派的反革命定性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直排本）的一六二页“注三〇”为基调的。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政治书籍，《辞海》、《辞典》中有关托洛茨基、托派等条目，都是照抄“注三〇”的，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注”。在这个“注三〇”里引用了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现实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那时代，苏联和中国，虽然还没有发明出“最高指示”这个名词，但斯大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更具有权威性。所以在这个“注三〇”里

也对中国托派作了个定性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托派被认为是反革命，托派分子被判反革命罪，正是这个“注三0”所说的那些没有理由的理由。

在二十七年的关押管制中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接受“注三0”的定性结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如果做到自觉地说自己是“托匪”，经常写思想汇报并揭批“托匪”罪行，那就是改造积极分子了。一九六五年，郑超麟填写一首词《蓦山溪》中，给这号人做了素描画像：“不见旧相知，竟低头，然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整十三年。他那里会想到，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风暴骤起；在批斗会上，那“竟低头，然然可可”的“旧相知”，竟像是出自内心地怀着一种义愤的样子用手捺他低头承认是反革命，他才明白了：“原来，犯人要表现积极，争取宽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参看《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第二一九页和四三二页。）

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给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几起莫斯科审判案平反，证明了加给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那些吓人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那些审判案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制造的冤假错案。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一六八页“注三三”，修改了第一版时第一卷一六二页的“注三〇”。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辞海》、《辞典》等也相应地做了修改。在第二版第一卷一六八页的“注三三”中，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定性讲话不加任何说明撤销了，对中国托派定性的那一句话也撤销了，对撤销的原因做了说明：“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二七〇页“注十八”和第二卷五一六页“注九”）。

原来如此！说托派是汉奸，说托派是反革命，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国托派一网打尽，打成反革命罪，关押管制二十七年，竟是一场错误论断的闹剧！

凝眸被吞噬的韶华，伤心一笑。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